



宋斐如文集



卷五



宋斐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四七）是我國台灣省台南人。即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畢業，具有熱烈的民族情懷和愛國主義激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西渡大陸，入北京大學就讀，與負有盛名的《台灣民報》，或自辦雜誌，投入文化啟蒙運動。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以發表在東京的《台灣民報》的文章《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開始了他短暫卻厚實的、以文筆啟蒙與鬥爭的生涯。一九三五年，他到日本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修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帝全面侵華之寸前，毅然回到祖國中國，以他深厚的日本語文能力，得以多讀戰中日文資料，並以其精到的社會科學訓練，展開深刻的抗戰研究、日本敵情研究和台灣研究，對於我國抗日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對於光復台灣，對於將台灣同胞從日帝殖民桎梏中解放出來，做出了很大貢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戰敗投降，台灣復歸於祖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宋斐如先生回台，很快投入光復後台灣政治、社會和思想、心理的去殖民化重建工作，呼喚省內外同胞的團結與「溶合」，不遺餘力。不幸，回台後堅決站到人民群眾一邊的宋斐如先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台灣民眾因國民黨接收集團的惡政而嘩變後的鎮壓行非法逮捕，很快就仆倒在國民黨法西斯刑場。英年而壯烈犧牲，得年僅四十五歲。嗚呼！

—— 陳映真



定價：250 元

宋斐如文集 卷五

第六輯 其他·附錄

深圳台盟 主 編

楊 益 群 執行主編（特邀）

宋斐如文集 卷五／第六輯・其他／附錄

著者 宋斐如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十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九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五八五四四四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初版 二〇〇六年三月廿五日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二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40-2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民政府立法院

為

查汪逆明書事，本院身員宋斐如君在香港
辦理抗戰宣傳，現由港來渝，携帶一行
書件，其中含有文書籍及參考材料，保
信高抗，宣傳之目，茲特准予證明，仰該逆軍
務機關查照，嚴明執行，以利抗戰宣傳，此致

粵桂滇黔川昭遠

中華民國



宋斐如

十六日

1939年宋斐如前往各地宣傳，立法院所開具證明



軍用證明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 為

發給證明書事 茲有本會設計委員朱長如

因公 往福建

經由川黔桂湘閩粵等省沿途各地

經核准自本月拾伍日起至本月末各日

有效期間特此證明

中華民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戰地黨政委員會
設計委員朱長如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證明書



台灣光復後宋斐如（前左三）蒞臨台灣省立台北商業職業學校珠算比賽大會。



1946年12月8日宋斐如（前右八）台灣省台北第二女子中學週年紀念大會。



宋斐如與第一位夫人在北京。傅琳彬（1931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1939年在北京病逝）。



1946年，宋斐如（前右三）區嚴華（前右一）夫婦與高山族同胞在一起。

目錄

宋斐如文集 卷五

第六輯 其他

日本金解禁與中國（一九三〇年一月）／3

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九三〇年十月）／5

中俄復交問題（一九三二年七月）／12

東方民族運動與中國西北開發——帝國主義侵略的新轉變

與東方民族運動的新階段（一九三二年七月）／16

世界經濟現狀及其將來（一九三四年六月）／50

計劃經濟之理論的檢討（一九三五年一月）／75

抗戰以來日本問題書籍總評（一九三八年七月）／94

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一九三九年四月）／103

各國勞動力統制政策（一九四四年一月）／105

附錄：有關記載、憶念、評論、年表

悼宋斐如／李純青／127

- 懷念二烈士宋斐如、區嚴華同志／陳文彬／128
- 傑出的思想家 偉大的愛國者／楊益群／129
- 馮玉祥與宋斐如相處的日記摘錄／馮玉祥／146
- 追憶父親宋斐如／宋 亮／171
- 沉屍之冤何日申／何 標／181
- 憶宋斐如先生／戴青田／184
- 訪宋斐如副處長／丁文治／185
- 憶台灣民主戰士宋斐如先生／戴青田／189
- 宋斐如殉難經過／宋洪濤 劉昌智口述／192
- 宋斐如著作年表／梁汝雄 張雅芳／195
- 宋斐如生平簡介／翁曉波 梁汝雄／233
- 後 記／編者／241

第六輯

其他

日本金解禁與中國

「金解禁」已成日本政界和財界的中心問題，自大正十年（即民十）以來，一般人士即頗重視。迄至民政黨內閣成立，特別聲明將以解決金解禁問題，為其中心政策，於是朝野之士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更加尖銳化，議論紛紛，頗有「山雨欲來風滿城」的氣象。

溯自大正六年（即民六）九月，日本頒布現金輸出的禁止令以來，日本的經濟界即發生種種的變化：自貨幣制度的實質說，日本直是由「金本位制」一跌而至於「紙本位制」；而對外匯價暴落至現金輸送點以下。匯兌市價暴落的結果，影響入超國家的日本，每年在貿易上蒙受巨額的虧損。重以其他禁止現金出口的各國，也都先後解除了禁令，於是促成了日本金解禁的事實。

日本實行金解禁之後，將必於其內外經濟界，發生種種的影響。至少（一）對外匯價的騰貴，（二）利息的升高，（三）現金的流出，（四）物價的跌落等事實的發生，總必是決定之數。在這些項變化之中，影響中國經濟最大的，算是（一）對外匯價的騰貴和（四）物價的跌落。這二項事實影響中國蒙受很大的虧損。中國因為日金匯價的騰貴所蒙受的虧損，可以由三方面來講。第一，中國每年由日本輸入的入超貨金，約在四千五百萬中元以上，第二，中國每年必須攤還甲午和庚子的賠款，並須付清各種借款的母息。這些都是依照日金為本位換算的。第三，中國留日學生數目，在數千或萬人以上；每年匯日的學資，也不失為一筆巨款。現在日金匯價比去年高出三分之一有奇，此後中國每年所多付的金錢，所蒙受的虧損，實非小可！

日本本來也是一個入超的國家，此後必因金解禁而現金流出，而國內通幣收縮；其

結果必致引起貨幣價值騰貴，而物價跌落，於是阻止外貨的輸入，而促進內貨的輸出。因日本阻止外貨的輸入，英美德各國貨物之入日本者，必轉而擁至中國市場。日本促進內貨的輸出，其所增加輸出品大部分，也必擁至中國市場。其結果，列強對於中國市場的爭奪更加尖銳化，而中國民眾的負擔也必額外加重。

日本金解禁後，必將影響中國蒙受巨大虧損，雖如上述，但中國所以受虧的最大原因，即在中國幣制採用（銀本位制）。現在採用銀本位制的國家，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在這種以金為本位的世界經濟漩渦中，獨自採用銀本位，一切的對外計算都以金為標準，蒙受大虧自是意中事。希望高談建設的要人們，對於此點多加留意！

原載一九三〇年一月《新東方》第一卷創刊號

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

敘述台灣事情，或討論台灣問題的書籍，不算不多。只就中文說，就有署名漢人君的《台灣革命史》、彭子明君的《台灣近世史》，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台灣》等種。然而，前二種小冊子之過於淺薄簡單，且類於「記帳式」的敘述固無庸言，即較為詳細的後者，還是依然不出此套，缺欠科學的解剖。至若日文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棟，舉不勝舉了。不過，關於台灣的日文著作之中，除去二、三種比較可觀者外，也依然大多不是過於陳舊，就是純粹的統計材料；不是局部的解釋，便是帶著民族差別的有色眼鏡的，缺欠整個的科學的說法，不大合於我們理解整個的現代台灣之用。

在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研究台灣問題最適用的書籍，現在可以舉出下列四種來。其一，是連雅堂所著《台灣通史》；其二，是伊能嘉矩所著《台灣文化志》（此名是他的遺稿的出版者規定的，本人有意題為《清國治下的台灣》）；其三，山川均所著《台灣民眾的悲哀》（此書已由新亞洲書局翻譯出版，並附有書後一長篇）；其四，就是這裡所要介紹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台灣通史》是從文化方面敘述台灣歷史的一部漢文佳作。《台灣文化志》，雖題為文化志，但其所敘述的範圍包括很廣，舉凡歷史、地理、經濟、政治、宗教、教育、人種、民種、學藝等等，莫不網羅在內，共有三卷，篇幅達三千頁，實是一種解剖日本統治前的台灣問題的大作。《台灣民眾的悲哀》，雖是一本小冊子，但卻握著台灣問題

的真髓，從經濟、政治及教育三方面，敘述日本對台灣民眾的壓迫、榨取和愚化，簡明而扼要，其措辭之勇氣和立論之公平，且在這裡所要介紹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之上。然因篇幅有限，這三種書的細詳介紹和批評，只能俟諸後日，本期只就〈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作專件的介紹。

二

本書的要點，在於解剖日本統治後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自其時間性說，實在可與解剖日本統治前的台灣的〈台灣文化志〉，合成姊妹作。正如著者在其序文中所說的，「本書是以經濟為中心的台灣社會發展的科學的分析」，本書的確不是歷史事實的敘述，而是歷史問題的解剖和說明。著者鑒於殖民地台灣的特殊情形（即「日本對台灣的經濟上的要求，就是決定各種台灣統治政策的原因」之謂），所以特別注重經濟的發展，解剖經濟發展的部分，竟占至全書八〇%以上的篇幅。

全書的內容，由〈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灣糖業帝國主義〉之兩篇組成。第一篇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共分五章：一是日本的領有台灣，二是台灣的資本主義化，三是教育問題，四是政治問題，五是民族運動。在本篇占最重要的台灣資本主義化一章，重分為五節：土地問題、權度及貨幣制度、資本家型的企業、財政與資本主義，及階級關係。第二篇的〈台灣糖業帝國主義〉，也分為四章：其一，糖業與殖民地，其二，台灣糖業的獎勵，其三，台灣糖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四，台灣糖業的將來。在此篇最占重要的第三章，台灣糖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裡分為十節：即新式工場的勝利，混合企業形態，地域的發展，糖業聯合會，販賣及金融，卡笛兒內部的爭霸，糖業帝國主義，利潤的源泉地，蔗農，及農民組合。

在日本領有台灣的章下，敘述台灣的發見，各國與台灣的關係，及列強對台灣的爭奪，以至中國割台灣歸日本統治截止。其敘述中含有這樣的意思：最初發見台灣者雖是西班牙，但是日本之與台灣發生關係卻在西班牙之先；日本之得台灣不是無價的白得；台灣不為日本所領有，也必入於其他列強之手。第二章的台灣的資本主義化，是本書最有精彩的部分，所以它的內容，等到後面再來作詳細的介紹，這裡暫為擱置。第三章的教育問題，敘述台灣殖民教育及其他的教育施設。第四章的政治問題，敘述台灣的各種殖民政治的施行。這二章，或許是由於教育問題是著者的外行，和著者之身充官立大學的教授對於不合理的苛政不便多說或不便說得透徹的原故吧，總覺得言之不詳且多含混，不像山川均氏在其《台灣民眾的悲哀》裡所說的那麼痛快淋漓。第五章的民族運動敘述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著者對於初期的台灣的暴力革命，視為沒有多大意義，所以述得很簡單。至後期的近代式的合法的民族或民眾解放運動，始由經濟方面應用科學的方法解剖它。這一部分雖在其對於民眾黨的軟化未加指摘是個對日本政府客氣的小缺點，但是大體上還可以說是公允。

現在且就本書最精彩的部分，即第二章的台灣資本主義化，依照上面的約束，作個簡單的補述。就整個說，本章是在敘述或解剖：日本採用人工的手術，將舊時封建式的台灣，割治整理成為資本主義型的台灣，並且培育扶助它的健全生長，至於在日本帝國主義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無論要那一個封建式的地方資本主義化，第一須先確定生產工具的私有權。而土地是生產工具最重要者，所以這種工作就先自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始。日本之把台灣資本主義化，也不出此例第一步，先實行土地調查林野調查，林野整理，以確定土地的所有權。然後依照殖民的目的，在可能的範圍內將台人舊時的土地所有權，奪與日本人。要某一封建式的地方資本主義化，第二步就是統一度量衡的單位及貨幣的標準。日本對於台灣

也是如此，並且依照日本內地延長主義，逐漸將台灣的度量衡的單位及貨幣制度，統一於日本內地的制度之下。這二種事實，是著者在本章第一、二兩節解剖出來的結果。第三節資本家型的企業，敘述日本最先利用關稅政策驅逐外國資本，於是日本資本就在台灣發展起來了。日本資本在台的發展，不久就進至獨占的階段，現在且可以向外進出了。第四節敘述財政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日本政府為著財政上收入的增加而確定種種的所有權，並因政府經營事業，其結果促急了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的生長，自又增加財政上的收入，財政與資本主義化二者，實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台灣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土地和資本自必兼併或集中，而社會階級也就漸次分集於二大集團，即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地主與佃農或農業勞工的對立。不過，因為台灣是個殖民地的原故，所以它的階級的對立，大體上可以說是以民族的形態表現的。大資本家自然是日本人，即擁有廣大土地的制糖會社又何嘗不是日本人？這一點是台灣階級關係的特殊性。本章的最後（即第六節）解剖台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著者在本書中列舉四項，是有助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第一次，資本的移動，投日本資本於台灣，再吸收台灣民間的資金轉投於日本內地及外國。第二項，商品的移動，銷納日本內地的製成品，供給食料和原料。第三節，人口的移動，即消納日本內地的移民，以解決日本內地因資本缺乏和經濟關係而起的人口問題。第四項是財政的價值。日本內地的政府，雖然不直接由台灣得到什麼歲收，但是台灣產業發展的結果，所有利潤的大部落入日人資本家的錢袋裡，而日本政府徵收日人資本家的租稅，日本政府也算間接得到台灣的財政上的幫助。

三

砂糖製造業是台灣產業的最主要者，所以著者就在本書第二編專論日本統治後台灣

糖業的發展。台灣地方栽種甘蔗最適宜，糖業本就有無限的希望。只因機器工業不發達的原故，日本統治前的糖業雖不失為台民重要收入的來源，但其製造的規模並不很大。日本經營台灣殖民地，第一就先注意到這一點。所以規定種種的獎勵辦法，極力使其發展成為新式的製造工業。其結果，舊式的「糖廠」日漸衰落，而新式的機器的製造工場起而代之。到現在舊糖廠既已絕跡。新式的製糖業日漸發達，向橫縱兩方面膨脹擴大。上自蔗園的經營以運輸、販賣等等，莫不聯繫在一起，儼然形成了 *Koncern* 的形態。又為避免同業間的競爭起見，採用著糖業地域制度，將台灣全部劃成幾個地域，分割給各個製糖會社獨占。各個製糖會社在其所管轄區域內，不但有權禁止製糖原料的外運，即使用甘蔗於別途，它也可以加以禁止。台灣糖業不但資本雄厚，足以買收或壓倒其他的產業（例如改水田為蔗園），其背後且有政治的權威，可用以強制農民栽種甘蔗，以半沒收的形式收買甘蔗（例如甘蔗的重量及價格，皆由製糖會社自己一手決定）。台灣糖業帝國主義者，容或指此而言吧！但是壓力之下必有反抗，所以台灣糖業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區域內的蔗農，就有農民組合的組織；蔗農與製糖會社的爭議，也就由此滋生不已了。本書不設勞動組合的專項討論，而設蔗農與農民組合二節，可見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殖民地，農民運動是比勞動運動占更大的重要性的，這也是本書特到的長處。蔗糖優於甜菜糖，再以地質和氣候的適宜，台灣糖業將來的發展，是未可限量的。不過，台灣糖業發展所招來的福利，不但台民不沾潤一些，且有反受其害的傾向，這是我們討論台灣產業問題所不能忽過的。舊糖廠儘是台灣人所經營的，現在已全為新式製糖會社所撲滅。台灣人所經營的新式製糖會社，只有林本源製糖會社和新興製糖會社二處。林本源製糖自始即在日本人實權管理之下，至昭和二年合並於鹽水港製糖，名實完全歸隸於日人資本家。新興製糖，名雖為陳中和氏一家所經營，但其經營實權仍握於台灣銀行系的日人資本家手裡。此外，糖業發達的結果，水田改成蔗園，而台民在農業經營上，及

米商經營上蒙受很大的損失。要而言之，台灣糖業發達所造出的福利，盡為日人資本家所獨占，而台民倒因此而蒙不利。這一點是殖民地產業發展所帶來的特質，是我們研究所有殖民地的經濟情形不可忽略的，而本書著者也未輕易放過。

以上大體介紹過本書的長處，但是本書也有兩點短處，略述於下：

四

(一) 體裁的不合適，本書題名雖為〈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但是實際上，〈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只是一篇之名目而已；而〈台灣糖業帝國主義〉自成一篇，與之平等齊立。約占全書之半的篇幅且又極其重要的〈台灣資本主義化〉，只占章的地位，而與「日本」的領有「台灣」及言之不詳的「教育問題」、「政治問題」等章並立。這些是本書形式上的缺點。著者曾經聲明過「本書第一篇載於〈國家學會雜誌〉第四十二卷第五號至第九號；第二篇載於〈經濟學論集〉第七卷第一號；將此二稿加以修補而成本書。」所以體裁之不能完全合適是難免的。

(二) 立論的一、二點缺陷。著者是日本人，又是身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日本人，關於日本殖民地的討論，自然難免有些不敢放言的地方。例如他在日本領有台灣的章裡，表露著：台灣原是中國的殖民地，日本領有了台灣，無異由中國取得一塊本與中國毫無關係的土地。並謂日本與台灣發生關係在中國與台灣發生關係之先。其實根據史籍，中國與台灣發生關係，遠在隋朝。中國之經營台灣並未視之為殖民地（經營榨取的泉源），尤其後來獨立為一省，更可想見。這或許是由於著者囿於所參考書籍的原故吧！

總之：本書是一種新鮮材料，解剖方法合於科學的良好作品。雖有微小的缺點，如能加以修改，實是一部研究現代台灣最合宜的著作。我們已經採用編譯的方法，著手於

移植的工作。我們打算在體裁方面，分為第一篇緒論（將日本的領有台灣，台灣的教育問題，台灣的政治問題，及台灣的民族運動包括於此篇），第二篇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第三篇台灣糖業帝國主義。並且參以自己的意思，為備上面我們所指摘兩個缺點的參照起見，順為附加這幾句。但是我們還是很誠意地，推薦《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於熱心研究台灣問題者。

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原著者矢內原忠雄，一九二九年版，岩波書店發行。

原載一九三〇年十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期

中俄復交問題

中俄兩國的恢復邦交，醞釀已久，九·一八事變以後中俄復交的傳說甚囂塵上。但是這個醞釀雖經最近政府當局的切實討究，結果卻也不過是「只打雷而不下雨」。他方面，一般民眾的輿論則大都主張恢復邦交，各報的論說可以證明。當此遠東和平岌岌可危而太平洋形勢直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我們認為中俄復交，無論自東方民眾解放上說，抑自中國本身的利害關係說，都有充分的必要性。不自感情的、主觀的見解，而自利害的、客觀的立場，試剖述於下。

(一) 就政治上而論

現在的國際情勢，是以諸帝國主義的對立——如日與美，美與法，法與英，英與日等對立——為前景，而以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蘇俄的對立為後景，當中又來一個諸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對抗。在這種國際情勢之下，蘇俄的向背和愛憎對於任何國家或民族的利害，都有很大的影響。只就中國言，中國能與蘇俄提攜，則東可以抵制日本之橫行，西可以預防英法等國之野心。最近美國之猛進企圖與俄復交，用意在於聯俄以抗法日。

(二) 就國防上而論

蘇俄的鐵道環繞於中國的北部，自東北以至西北，蘇俄皆敷設鐵道網，無論至哪一段上都可以不幾小時而深入中國境地，並且，蘇俄的大部分軍備皆集中於邊境，虎視眈眈，既可以自守，更可以攻入。而中國本國的國防設備，目下實在談不到。在這種情勢

之下。中國若與蘇俄復交而訂互不侵犯條約，則自消極方面言，可以避免蘇俄的進侵；自積極方面言，可以集中國防力量於西南及東北等方面，以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俄能更進一步而締結攻守同盟，則中國國防的效力必更大。

(三) 就經濟上而論

中國邊境線的大部分，皆與蘇俄銜接，中俄人民不斷地交往。人民交往則「通有無」而貿易關係繁雜。中俄的貿易關係不但在未絕交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即在絕交以後中俄民間的貿易關係，事實上並未因為政治上絕交而消滅。北滿、外蒙、新疆等地的貿易關係有增無減。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不如痛痛快快地與蘇俄恢復政治上形式上的邦交，以促進兩國的貿易。再考，中國現在正為求自由獨立而進行反帝國主義，其結果必將引起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欲迴避這種危險，除一方面與蘇俄復交，一方面自謀經濟獨立之外，別無他法。

(四) 就被壓迫民族解放立場上而論

現階段世界情勢的轉變愈益橫斷化：諸帝國主義之以均衡的瓜分和協同的共管形式，來統制弱小民族，也帶來充分的必然性，現在已顯露這種趨勢的頭角。此時，被壓迫民族企圖解放，勢非以協同的勢力抵抗協同的勢力不可，聯結可以協作的勢力以造就整個反帝的營壘，實有十二分的必要性。蘇俄雖然曾因某帝國主義之曠使利用而與中國發生不幸的戰爭，但是這個不幸的衝突之為帝國主義分化被壓迫民族反抗勢力的事實，現在已被證明。自大體上言，蘇俄尚能平等待遇諸弱小民族，自動放棄特殊權益等等，至少，蘇俄可以為諸弱小的朋友，她也希望著與諸弱小為友。再自利害關係上言，蘇俄與諸弱小有反帝國主義的共同立場，有同被帝國主義壓迫進攻的危險性，二者更有協作的必要

和可能。在此諸弱小營壘——即縮小言之中國營壘——與帝國主義營壘對立的情勢之下，蘇俄的向背實有舉足輕重的可能。

根據上述各點，中國為被壓迫民族解放打算，為自國的利害關係打算，非與蘇俄恢復邦交不可。否則，不但沒有上述復交後的各種益處，並且可以發生相反的損失。蘇俄現在經濟建設尚未完成，國基尚未鞏固，國防力和進攻力之充分，更談不到。同時，又處在諸帝國主義積極準備進攻的威脅之下。此時，介於世界資本主義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營壘之間的弱小民族營壘，若不與蘇俄合作，她為自己利害打算，必將與利害衝突比較不劇烈的某一資本主義國家提攜（俄人最近的輿論，與美復交之意向可以證明）。此時，即使蘇俄不助桀為虐，某帝國主義也可減輕一大敵而積極利用金元來統制中國。其時，帝國主義統制中國的局面成就，中國即欲不亡，不可得也。

最後，再來檢討中國何以與蘇俄絕交？何以不敢和蘇俄復交？唯一的原因，就是怕蘇俄「赤化中國」，怕中國社會因此而共產化。但是這種考慮完全是一種杞憂，並且是一種膚淺的見解。正如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議員Cutting用Rack氏所說的，「革命不是能從旅行者的箱囊中帶進來的。革命是不能進口的，革命是由內部產生的」。中國之能否赤化和共產化，完全由中國之政治的、社會的關係來決定的。一切的革命和社會變動皆以本地方經濟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缺陷為酵母。我們相信，信奉辯證法唯物論的社會主義的蘇俄，豈真全憑主觀，不顧事實，故意搗亂東方，使世界革命永陷於沉迷嗎？Cutting說得好，「誰相信幾個第三國際機關能推翻美國人民信仰已經根深蒂固的他們的政府和制度呢？」他更說得好，「災難和失望是革命的真正產母！過去兩年（美國）經濟和政治的破產，使美國國民中產生了許多共產主義者，這些共產主義者從未與外人的煽惑接觸過……」（以上引言皆載於美國《Thanation》雜誌五月號上）。最近美國對俄的輿論，上下概是如此。原為敵人畏赤俄如蛇蝎的美國人，爭取資本主義世界營壘領導

權的美國，尚且這樣積極企圖與俄復交，而與俄處在利害關係許多相同的中國，反畏首畏尾，疑慮不定，這真是令人大惑不解！

原載一九三二年七月《新東方》第三卷第七期

東方民族運動與中國西北開發

——帝國主義侵略的新轉變與

東方民族運動的新階段

一、引言

資本主義發展至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就完全依靠本國內無產階級之極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眾之剝削，來維持他的存續，延長他的殘喘。因此，帝國主義本國各種矛盾與無產階級膏血的涸竭互為因果醞釀成功的大恐慌，對於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眾之加緊，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這種大恐慌，即對於帝國主義者剝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眾的方式，也有使它改變的影響。他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體系當中，近年來又發生一種新的、尖銳的矛盾現象，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整個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營壘的對立。在這兩個營壘對立的當中，偏又插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另一個營壘，間隔於其間。於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將來的變化如何，對於這兩個對立營壘的勝負，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帝國主義者自然更要加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統制。在這種情勢之下，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侵略方式，必然地發生一番新的變化。

然則，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的變化如何？恐怕不外乎由從前的「爭奪的」、「獨占的」方式向「互惠的」、「共管的」，方式的一種轉變。雖然，他們當中總免不了多少因分贓不均，而衝突仇視的危險性。在這帝國主義者將以整個陣營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進攻的當兒，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陣營介在資本主義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營壘

當中的這個時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也必發生新的變化，並且應當有新的變化始可。這種新的變化就是現階段民族運動的新意義。一方面，民族解放的涵義是大多數窮苦民眾的解放，他方面，民族運動的方式是反帝國主義的方式。

但在進行這種新意義的民族運動的時候，前面必定遇到險惡的難關，本即以整個的營壘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展開的勢力雄厚的帝國主義內部，必定愈加團結堅固。此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就越有團結一致的必要，而其團結方法的研究，就具有極大的重要性。近來漸為國人所注意的中國西北的開發，就是具有這種重要性的方法之一種。

如果我們略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營壘加以考察，我們發見中國是東方民族革命運動現階段最重要而又是最危險的堡壘。中國前途的變化如何，對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前途，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頗有舉足輕重的情勢。而中國今日處處宰割於帝國主義，沿海一帶皆成了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九·一八事變發生而富冠全國的東北又淪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現在除西北一片未經開墾的土地而外，幾乎沒有一塊乾淨土。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開發西北未始不是挽救目前中國危局，因而堅固被壓迫民族整個解放營壘的一個好方法。

我們並且相信開發西北的結果，對於整個被壓迫民族的鬥爭策略上，必定有很大的裨助。嚴格地說來，所有東方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上，要有真正的有力的把握，非從無隔閡的真正聯繫上下手不可；而這種聯繫非俟中國的西北開發後不能成功。因為現在在整個東方被壓迫民族的營壘裡面，存有地理的問題，交通的問題，產業的問題，宗教的問題，習慣的問題，情感的問題，等等，潛伏其間，而這些種問題都可以由西北開發的成功而消滅它們的間隔性。於此，我們充分明悉開發西北的重要性；同時，開發西北的前程也在我們心目之中；而其詳細的得失和各種關係，似乎有俟我們一度檢討和

剖述的必要。因此，撰作本文，特就「東方民族運動與中國西北開發的關係」略加討論。

二、帝國主義侵略新變化的檢討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專靠本國無產階級的極度榨取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剝削之兩管「補血針」來延長他們的殘喘。現在，自一九二九年秋季世界恐慌的風浪刮遍諸帝國主義的領域以來，他們所賴以苟延殘喘的補血針之一管失掉了效用。其結果，帝國主義自然集全精力於剝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另一補血針上。同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新矛盾，資本主義整個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的對立，更使帝國主義者加緊殖民地統制。帝國主義侵略方式的變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一) 世界恐慌的風浪

一九二九年秋季以來的世界大恐慌，一般人皆認為是空前的、特殊的恐慌。其理由則在於此次的世界恐慌具有它的特質。關於世界恐慌的特質，學者之間雖有各種不同的見解，但據我的考察，至少有下列各種。而這種種的特質賦予帝國主義改變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的動機，所以剖述於下：

1. 此次恐慌發生於產業合理化實行之後

產業合理化運動，原為振作沒落第三期資本主義的不景氣市況，為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深化而進行的。其進行的手段就是極度提高生產能率，節省生產本費，使商品物美而價廉，因而促使市況活躍起來。德倡於前，英美法意各國皆效尤於後。最初雖亦獲得多少成績，可惜這種微小的成績，竟因同業者競爭之激烈而曇花一現，不能繼續下去。不久生產極度過剩，失業工人驟增，以及工廠、商店、銀行相繼歇業倒閉等相反的

現象發生出來，而經濟恐慌入於空前的危態中。

2. 此次大恐慌的演進是慢性的

從前的經濟恐慌，大都帶有急性的性質。惟其如是，恐慌達到飽和點即便呈現好景氣的曙光，而恢復良好的狀態。只此次世界大恐慌，無論在農業生產部門，在工業生產部門，抑在金融經濟部門，都是緩慢演進下來的。這是由於金融資本家的統制，也就是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但是金融資本家的統制毫無效果，適足以增長恐慌的前進。

3. 此次大恐慌普及於所有的經濟部門

以前的經濟恐慌大都限於一、二經濟部門，例如金融恐慌、商業恐慌、農業恐慌等等，或只限於某種經濟部門的某種生產，例如農產裡頭之大豆生產過剩，或麥粉之需供不調，又如礦產裡頭之煤產供給涸竭，等等。在這種部門經濟的恐慌發生時，大都得由別種經濟部門調節過來，而恐慌即歸於消滅。但是此次恐慌則普及於整個的經濟界，致使由限制生產發生的過剩資本和失業工人，無法移至別的經濟部門去。因而同業者之間的競爭愈趨激烈，而恐慌不知將伊於胡底了。

4. 此次大恐慌普及於全世界

本來商品和資本都是流動的東西，商品趨向需要多供給少而價格高昂的地方流轉，資本趨向求過於供而利潤率高的地方流轉。所以，在甲地某種商品過剩或其購買力薄弱而乙丙等地方同種商品的需要大購買力大的時候，該種商品可由甲地移轉於乙丙等地，而恐慌不至於持久。資本也然。但是此次大恐慌則除蘇俄而外（蘇俄雖是世界恐慌風浪中的獨自繁榮的孤島，可惜它是供給量特別大的國家，只有將商品向外傾銷而不能消納外來的普通商品），各地莫不沐浴於恐慌的風浪中。並且，蘇俄的市場又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壘壘所固封，不能分減世界恐慌的多少分量。

5. 此次大恐慌中金融恐慌最後到來

此項與上列第二項有密切的關係。現在是金融資本獨霸的時代，當恐慌發生的初期，雖然小企業吞併於大企業，而金融資本家則不但不受影響，並且可以利用金錢的魔力，得漁人之利。即在恐慌的風浪增大的時候，它尚可以利用轉嫁的方法逍遙於恐慌圈外。但是「樹倒猴悲」，等到恐慌的風浪刮遍工商農各界的時候，金融資本家也就難免恐慌的光顧了。

6. 此次大恐慌特別深湛

這次大恐慌的深度是從前任何恐慌所沒有的。生產指數是經濟景氣的寒暑表，且就大恐慌前後的生產指數比較看，即可了然。據伐爾卡《世界經濟年報》一九三一年第三季統計，世界生產指數，以一九二八年為基數，一九二五年為八八·六，一九二六年為八九·九，一九二七年為九五·七，一九二八年為一〇〇，一九二九年為一〇七·八，一九三〇年則降至九三·九，一九三一年更降至八〇·八，與恐慌之第一年度比較約降二七%，即連歐戰後最不景氣之一九二五年還不如。其結果，重要國家的破產數目驟增，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二九年比較，美國增加四二八九，英增加一二九，德增加二五六九，法增加九八〇。失業數目之大更無庸言。

7. 此次大恐慌期間特別長

若假定美國交易所的大動亂為此次恐慌的起點，則大恐慌為開始於一九二九年秋初（其實二、三國家早在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期恐慌即已發生），那末，現在已經是恐慌的第四年度了，實額期間也已超過三年，這樣長期間的大恐慌幾乎可以說是空前的。並且，現在尚無恢復好況的希望，似乎恐慌沒達到最深的程度，證明此種事實的指標：(1) 金融恐慌愈益尖銳化；(2) 生產指數猶在減退的途上；(3) 最近雖因各國的膨脹政策而物價稍見

騰貴，但不久即又跌落。

此次的世界大恐慌，因有上列各種特質，所以帝國主義者們不能在她們自己的領土內求出解決的方法來。只靠她們本國無產階級的榨取，已經不足以維持她們的壽命。於是，移轉銳利的視線至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頭來，企圖半殖民地的占領或再分割。不過，在這時候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必然地要有一番變化。

(二)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

最近，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當中，發生了一個新的、決定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整個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營壘的對立情勢。這種對立情勢之尖銳化，不但是決定未來世界史的根本要素，即對於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方式之變化，也有密切的關係。

社會主義蘇俄的鬥爭理論如何姑置不論，但是他實行建設的結果，至少給與世界一般人，下列三種印證：

1. 國民經濟的確可以採用有計劃的，有統制的，預算的經濟組織來實行，並且可以實行得更有利益——國民全體的利益。由此類推，更廣大的世界經濟也可以依照同樣的經濟組織，實行得更於全體人類有益。

2. 景氣循環說所主張的不可避免的恐慌，實在可以運用人為的、制度的統制而消滅它，至少可以減輕它的猖獗。因為這次世界大恐慌皆發生而且普及於經濟組織無計劃的，無統制的，無政府生產的資本主義國家，若經濟組織有統制的蘇俄，則獨享其為「世界大恐慌中的繁榮孤島」的榮譽。

3. 由農民和勞工及服務於他們的智識分子的力量，居然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矛盾，挽救日趨淪陷的經濟危機。從前自由放任經濟學者，對於人為的，有統制的，有

計劃的經濟施設之成功皆不置信，對於不學無術的工農的同種施設之成功，更不用說。不幸，蘇俄竟以現實的證明列於他們之前。

上列三種事實給與所有的帝國主義者莫大的威脅：第一，這三種事實能曠使帝國主義本國內受到極度榨取的無產階級，增強反抗統治階級的自負心；第二，同種事實也可以促使帝國主義統制下，剝削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眾，索性與蘇俄共同奮鬥，以排脫帝國主義的侵略，根本解決一切的問題。因此，諸帝國主義者眼看社會主義蘇俄經濟建設之逐漸成功，根基漸次鞏固，不禁戰慄起來。由於這種恐怖而竭力企圖及早摧毀之。同時，並且可以占領世界六分之一的商品和資本的大市場，一舉兩得。

然而，蘇俄這個國家土廣民眾，又在地理上占著優勢，實在不容輕視。此項促使帝國主義向蘇俄採用共同進攻的方式，並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侵略，改變從前的方式。因為帝國主義整個營壘與社會主義蘇俄的營壘當中，有殖民地的營壘介在其間，殖民地革命的動向如何，對於上列二個營壘的勝負，是決定的要素。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侵略方式，必有改變的必要和必然性。

(三) 帝國主義侵略之變化

諸帝國主義內困於沒落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大恐慌，外迫於社會主義蘇俄建設成功及向殖民地進出的威脅，既不能在其本國內求得解救危機的方法，又不能輕易撲滅勁敵的蘇俄，唯一的方法只有再分割世界殖民地，以鞏固他們的營壘。對於完全殖民地化的地方，加緊剝削和壓迫；對於半殖民地，企圖使之完全殖民地化。但是現在，要實行這種企圖，從前的爭奪方法，已經不能沿用。帝國主義者若採用爭奪的方法，以占領殖民地，結果必定引起他們內部的衝突，而終須訴諸武力。而世界現在的情勢，束縛他們在自己夥伴的內部用武。主要的原因有二：一因本國恐慌使其無能力化；二因帝國主義

夥伴須鞏固自己的營壘以進攻共敵蘇俄。

然則諸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究竟怎樣轉變？他們只有在協定或諒解之下，來實行這種侵略。其具體的方法，當不外下列二種：

- (1) 平衡的瓜分；
- (2) 共同的管理。

諸帝國主義在協定或諒解之下企圖瓜分殖民地的實例，可於他們侵略中國的事實中求得之。英國統制西藏、西康，法國勢力侵入雲南、貴州等地；美國經濟勢力膨脹於中國各地，日本獨霸東北，儼然朝鮮第二，這樣。帝國主義者皆相安不憂。並且這種趨勢，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更愈鮮明。日本帝國主義專以暴力侵占了東三省，而其它的諸帝國主義並沒有有效的制裁方法。現在執世界之牛耳的美國帝國主義所極力主張的，不過是「門戶開放」、「機會均霑」的舊套；現在被羨為最繁榮的法國帝國主義，反與日本締結秘密條約，公然供給日本以侵略的利器；帝國主義先進的英國與日本之間，也有倫敦日英協定的締結。

諸帝國主義企圖共管殖民地的事例，也無庸徵引遠例，只於中國求之即足。諸帝國主義共管中國的企圖，雖然老早已露出頭角，但其有效的實行則顯露於大恐慌發生以後。最近，曾有國際聯盟向中國共同投資的醞釀，未及完全實行而引起日本強占東三省的事變。這是由國際共管引出均霑的演變，蓋因上述借款投資當中，日本是被除外的，所以日本借侵占東北以相抵制。因此，其他的帝國主義對於日本的行動，也只有緘默，或放些空炮。最近雖有國聯提議共管東北的消息，預料日本不會承諾。不過，由國聯出名借款投資於中國而取得共管的實權的計劃，現在似乎又在醞釀中。

但是上列二種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有無實現的可能性？據我看來，諸帝國主義進

行這二種侵略的時候，雖然不免有衝突的危險性，但是現在的世界情勢卻在指示它的很大的可能性。從前，此二種侵略方式之所以不能充分實行，一來因為那時候諸帝國主義尚有餘力角鬥，二來因為他們的公敵蘇俄尚未產生，長成。現在，這二種事項處處皆自諸帝國主義本身的利益打算，督促帝國主義實行該種方式的侵略。瓜分已逐漸進行，香港、台灣、朝鮮、琉球、外蒙古、東北及西藏等地，事實上現在已非我有，西康及新疆滇黔的邊陲等地，均已危險萬分。共同的管理，諸帝國主義捨名取實，由部分的共管，例如鐵路的共管，郵政的共管，礦產的共管，警權的共同執行，以及某特殊地方的共管，等等，往前推進，最終達到「整個」的共管，無論任何人諒都不敢說句「不可能」吧！此次，國聯調查之歷遊中國各地，名義上雖說是為解決中日問題而來的，但其骨子裡若說絕對沒有含蓄「共管中國的預備工作」的意味，我們實在不敢堅信。

要而言之，在協同或諒解之下實行平衡瓜分及共同管理的侵略方式，確是現階段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新方式。這種變化是唯物辯證法的變化。

三、東方民族運動的新階段

諸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方式，既然發生了新的變化，那末，反抗諸帝國主義，企圖排脫他們的侵略的殖民地革命運動，自然不能沒有新的轉變，並且應有新的轉變始可。於是，現階段的民族運動具備了新的意義。民族革命採用新的鬥爭方式，也是必然的趨向，並且是民族運動策略上的必要。

(一) 民族運動現階段的意義

民族運動是由實質上，名義上受到別民族的政治支配及經濟剝削的民族發動的；它

的目的在於排脫別的民族或諸民族的支配而獲得自由獨立。進行這種運動的民族，普通稱為「民族」，即英文之 Nationality，而其所依據的指導原理，就稱為「民族主義」(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前者與國民(Nation)對稱，後者與國民主義(Nationalism)對稱。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截然兩樣。前者為純然被支配、被壓迫的民族企圖解放獨立的指導原理；而後者則為在一國內占著優勝地位的民族，一方面對於國內諸弱小民族施行壓迫及同化政策，他方面對其他的民族或國家表示敵對性以充實其獨立民族國家的生存表現欲的指導原理。根據民族主義指導原理的民族運動，目的極其純潔，除排脫別的民族或國家的政治支配和經濟剝削而外，殆無其他的目的。

若就世界的實情加以考察，則上述的意義更可了然。現在諸帝國主義國內莫不包括複數的民族，其中獨有一個特別優強的民族，處在支配國內諸弱小的地位，而其他的民族皆處被支配的地位，例如日本帝國內大和民族是支配的民族，而朝鮮、台灣、琉球、蝦夷諸弱小則為被支配的民族。又如大英帝國內盎克洛薩克森民族是支配的民族，而愛爾蘭、澳洲、印度、加拿大、紐西蘭等地諸弱小民族，都是被支配的民族。大和民族及盎格洛薩克森等民族的國際政治活動的指導原理，應是國民主義；而朝鮮、台灣、愛爾蘭、印度等民族政治活動的指導原理，就是民族主義。此外，法國、美國、意國等，也可以類推而得同樣的結論。

處在別民族政治支配下及經濟剝削下的被壓迫民族，企圖自由獨立，本來在理論上是沒有不合的；並且這種民族鬥爭在集團鬥爭或社會群鬥爭的歷史上，的確占著相當的過程。最近的歷史上，也有根據典型的民族主義以從事於民族鬥爭而得到成功者。例如日本之排脫歐美諸先進帝國主義的統制而獨立，美國（美國的構成雖然不只限於一個民族，但其複數民族在政治上融成一個單位，而同處於被統制的地位）之脫離歐洲的羈絆而獨自建設成為單一國家，就是典型民族鬥爭成功的事例。日美不但排脫了他民族或諸

民族的支配，並且一躍而入於支配別民族的帝國主義之林，這可以說是民族鬥爭成功的極致。

然而，每一歷史事實之成就皆有相當的客觀條件為其前提，有適宜的環境為之培植。典型的民族主義鬥爭之所以成功，實由於資本主義初期的客觀條件有以促成之。現在到了資本主義的沒落時期，一切的客觀條件以及國際情形，已經有了激烈的變化。若就本文前節所剖述的推論之，世界的經濟豹變，促使國際政治趨於「橫斷」的情勢：一方面諸帝國主義者聯繫而成一壓迫的營壘，被壓迫的諸民族也有聯結一氣的傾向；他方面諸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群眾之國際聯繫，及諸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聯結集團如國際聯盟之類，也漸有具體化的趨勢。自從社會主義蘇俄成立之後，世界政治的橫斷情勢，越發明顯。

在這種國際情勢已經豹變的新階段，民族鬥爭的指導原理，當然而且必然地，要發生新的轉變。孫中山先生之於民族主義之外，並且發揮民生主義，認為民生主義是目的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是手段，對於民族解放運動偏重於農工的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建設，或者可以認為此種新轉變的先驅吧！中國革命之所以僅僅推倒了滿洲政府而不能脫離諸帝國主義的統制，致使中國的民族鬥爭止步於百步之五步內，原因即在於實際鬥爭上不能運用適應新階段的指導原理。民族主義固未完全成功，民生主義更談不到，其反撥作用適足以造成二十多年來的「民死狀態」。

現階段的民族運動的指導原理，必須以大多數勞苦群眾的利益為前提，所謂民族解放云云，主要的也就是勞苦群眾的解放。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原則上實注意此點，後繼者苟能於其實行方法上改革光大之，相信中國革命雖不完全成功也相差不遠。這項道理本很明顯，只自皮相言之，占一民族的大多數分子是勞苦群眾；外族所支配所剝削的對象，實質上也只是這勞苦群眾。因此，也就只有對於外族的支配和剝削感覺切膚之痛的他們，如能自本身的利害關係，掙扎起來，苦鬥起來。印度民族革命過去失敗於對

於印度勞苦群眾不深切理解的漂動份子之作為，此次淞滬十九路軍及民眾的抗日完全代表中國革命下級群眾的民意而獲得不少的民族榮譽，等等事實，都是此種新轉變的現實楔機。東北在二小時中喪失了重要的城鎮，而日軍占領已將九個月的現在，猶有多數的義勇軍繼續苦鬥著；印度民族運動由於放棄漂動的態度而漸有生氣，這種種事實尤其是尖銳的佐證。

談民族運動的同志，對於民族解放現階段的新意義，不能不深加玩味！

(二) 團結反帝之必要性及其必然性

國際情勢的激變促使民族解放現階段發生新的意義。現代的民族解放已經不是過去那樣籠統龐然的解放，而帶上實質性了。並且有許多事實在我們面前證明：此後的民族革命非有此種實質性的解放運動不能成功。這種主旨的新變化，自然造就鬥爭方式轉變的動機。

他方面，又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帝國主義現階段內外的新情勢，改變了他們侵略殖民地的方式，尤其是半殖民地的方式，放棄從前的爭奪互鬥的方式，而改取互惠的瓜分及合作的共管二種方式。這種新的侵略方式，將必加重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壓迫和剝削，使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力逐漸消沉，以保障帝國主義統制之成功。在這種情勢之下，企圖排脫外族的支配而自由獨立的民族鬥爭運動，必然地會採取新的鬥爭方式。

自主觀上來說，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思達到目的則已，否則，勢須採用新的鬥爭方式。

然則民族奮爭的方式是什麼？原則上有二點：①應該——並且必然地——擴大鬥爭的陣營，凡同情援助民族解放者皆儘量容納聯繫之；②充實鬥爭營壘的內容，淨化鬥爭

的同志，凡對於真正民族解放認識不清楚而漂動不定的分子，全部排出。由此原則出發可以推論出三方面的開展方向來：

1. 團結被壓迫民族及弱小民族的革命同志

諸被壓迫民族如中國、朝鮮、台灣、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阿拉伯、敘利亞、巴力斯坦、美索波達美亞、埃及、緬甸、安南、印度、俾路支、澳大利亞，以及南洋各地，等等民族，同處於帝國主義統制之下，本來即有一致團結的必要和可能性。關於此點，作者的朋友曾經站在聯絡某帝國主義以抵制某帝國主義的立場加以反對。據說，現在中國有聯英的必要，若與印度攜手則失英國之歡心。但是許多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即不與印度攜手，英帝國也不會作出有利於中國的事情。將來的趨勢更必如此。

2. 接受蘇俄善意的幫助及合作

蘇俄現在的社會制度，雖與諸弱小民族的不完全一樣，諸弱小民族將來的變化是否向此方面進行，雖然可以暫置不論，但自蘇俄與資本主義整個營壘之對立，及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營壘之對立推論看，蘇俄與諸被壓迫民族的利害是一致的。自這一點說來，被壓迫民族與蘇俄的提攜是有益的。或許很多人考慮到社會制度不同有被赤化的危險性，但這完全是中國外交家的無智。請看最近俄美關係的轉變如何？世仇的日本，且有與之諒解之用意（據最近報載）。中國不敢與蘇俄接近，大滿洲國卻在準備派遣駐蘇俄的領事呢！

3. 接受帝國主義國內無產群眾的幫助及合作

諸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一方面剝削殖民地，一方面也榨取本國內或本民族的無產群眾。因此，他們的無產群眾也反對他們。在這一點被壓迫民族可以和帝國主義國內的有覺悟的無產群眾合作。關於此點，或許有人以橫斷情勢之空虛反對我們的主張。例如最

近日本一部分無產階級的導師，贊成日本之侵略滿蒙。但是這種潮流是種逆潮，正如日本無產階級的有見識導師山均川氏所言，「此種狂舞將必止息於應該止息的地點」。並且，贊成的反面還有反對的存在。不過，贊成的是「顯在」的潮流，而反對的卻是種「潛在」的勢力吧了。

聯結上列三種勢力，以與帝國主義鬥爭，以向帝國主義的統治階級進攻，必定是將來世界政治變動的新趨勢，這種新趨勢已漸具體化。橫斷情勢之成熟，資本主義營壘的聯結，帝國主義國內勞農群眾運動之國際化，蘇俄營壘尖對整個資本主義營壘之布置，諸帝國主義侵略壓迫諸弱小民族之共同行動化，這些事實都在指示：被壓迫民族及弱小民族之革命運動共同化的必然性——不，上列三種勢力之聯結一致，以進行「反帝國主義」的工作，是現在與未來世界社會建動的趨向。

自主觀上言，上列三種勢力必須一致聯結，以作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倘不適成國際的新形勢，採取一致反帝的方式，而各自為政，甚至自相軋轢，反帝的目的不但不能達到，結果也必因力量之薄弱而終歸失敗。最近康藏兩地之爭，印回兩民族之鬥，都給予英帝國主義得漁人之利的最好機會，日本帝國主義之侵占東北，未始非中俄內訌有以引誘之。贊成日本侵略東北的日本無產群眾，結果必定沒有好歸宿。

(三) 團結反帝國主義的反響

諸帝國主義所壓迫，榨取，以至進攻的諸主體，因其利害相同而團結一致進行反帝國主義，雖是國際情勢新轉變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但是諸帝國主義者對於反帝諸勢力之如此作為，必不輕易放過。他們將必採取更有效的辦法，以堅固帝國主義的營壘，而保障她們對諸弱小的統制。諸帝國主義的更有效的辦法，據我的考察，至少也有下列幾種：

1. 分化反帝的陣營

團結始有力量原則，帝國主義者非常明白，所以一方面在自己的夥伴企圖團結，而他方面對於反帝國陣營採用分化政策，這種分化政策的第一步，就是阻礙本國無產群眾之與蘇俄接近聯絡；第二步就是固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讓蘇俄染指而使二種反帝勢力不能聯絡一起。同時，並且阻止本國無產階級援助被壓迫民族。這二種政策，諸帝國主義早已施行，並且獲得相當的效果。分化政策的第三步驟，就是分化諸弱小的聯結。這種聯結只是最近新東方運動的新趨勢，雖未臻成熟的時期而帝國主義的膽已粉碎了。例如充當諸弱小喉舌的《新東方》雜誌，乍出而風靡一時時，諸帝國主義即竭力加以摧殘，並阻止它和諸弱小的民眾會面，日本、朝鮮、台灣、安南、緬甸、印度以及南洋各地，皆禁止入口。

2. 加倍壓迫諸弱小

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之成功，是諸帝國主義的致命傷。因此，他們竭力講求摧殘的方法，運用警察軍隊的高壓手段，經濟上的極度剝削政策，及教育上的愚民政策，以期達到目的。日本素來對朝鮮及台灣的壓迫，最近英國軍警之於印度及緬甸，法國軍隊之於安南，等等，莫不是這種高壓政策之具體化。諸帝國主義對於被壓迫民族單獨的，薄弱的反抗，尚且如此大作，對於諸弱小之互助團結，手段必更惡辣。例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朝鮮農民因同情中國而擋阻日本進軍時，即遭幾近「洗鄉」的剿伐。

3. 自軍事上封鎖諸弱小民族

世界現在的被壓迫民族大部分集中於亞洲大陸，並且地理上互相聯繫著，本來是可以利用陸地的交通互通氣息的，只因陸地交通之不發達，彼此之來往幾乎皆依靠水路。所以，越是靠近海口的地方，其重要性越大。諸帝國主義也頗重視，被壓迫民族一旦有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帝國主義者勢必運用他們的雄厚海軍力加以極度的壓迫，實行封鎖

政策。其時，諸弱小民族自己既無海軍可以抵抗，陸地交通又不發達，不能聯結一氣，那末，結果就只有為帝國主義所分別征服了。

4. 共同統制半殖民地

在帝國主義發展的現階段，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諸帝國主義對於尚未完全殖民地化的諸民族的統制。舊殖民地的再分割及其商品資本市場的爭奪，等等糾紛，固然也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諸帝國主義的視線，現在幾乎完全集中到半殖民地的統制上頭。現在世界上尚有帝國主義侵略剝削的可能性的地方，只有中國和蘇俄這二塊肥地，他們正切望著由這二塊地方的剝削，來緩和他們的沒落。但是，蘇俄現在根基已漸鞏固，且有漸次發展的趨勢，諸帝國主義又雖然正在企圖共同的征服，而其成功極其渺茫。只有中國這一塊肥肉置在諸帝國主義的刀俎之上。中國一方面在東方諸被壓迫民族當中占著最重要的地位，他方面中國最近的民族運動具有最濃厚的反帝色彩。因此，諸帝國主義要統制整個東方被壓迫民族，必先統制中國。而其統制的方法必以「共同的方式」出之。蓋因諸帝國主義爭奪的不利及反帝諸勢力的雄大，使他們不得不如此。

5. 自經濟上封鎖諸弱小

帝國主義壓迫諸弱小民族的有效辦法固然很多，但最厲害的應推經濟的封鎖。諸弱小民族的經濟發展皆極落後，各部門產業的生產皆極幼稚。即有多少現代型的產業，也都是帝國主義國內統治階級的經營，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幾乎可以說沒有。自從近年來獨占形勢銳化以來，諸弱小本民族資本的經營，尤其是慘落，慘敗。因此，經濟大權操於帝國主義手中，工業製品大部分由帝國主義輸入，甚至連食料品也須仰給於他們，充當生產工器的製品，更不用說了。此外，企業資本、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等等，也皆總仰重於帝國主義。稍稍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如此，現代企業非常落後的半殖民地尤其如此，中國就是一個典型的實例。處在這種事事依人的經濟情狀之下的諸弱小民族，一

且因急激反抗帝國主義而開始戰爭時，諸帝國主義必定採用絕斷製品、生產工具、技術人才、企業資本，甚至如食料品，等等的供給源泉，以制諸弱小的經濟於死命。此種絕斷自積極方面看來，似乎可以激發民族產業的發展，但這不是一時馬上可以做到的，在戰爭期中尤其談不到。

諸弱小民族及被壓迫民族之聯結一致反抗帝國主義，固然是民族運動現階段的必要，同時又是必然性。而諸帝國主義之採用上列有效的方法以保障他們對於殖民地之統制，也是帝國主義侵略現階段的必然性，並且這種辦法對於他們實有非常的必要。到這時候，諸弱小民族如欲保持其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之有效，必須講求更具體的、根本的計劃。據我的意思，這種計劃的原則有二：其一為開闢諸弱小民族及同情援助勢力之緊束聯結的途徑；其二為完成諸弱小的獨立經濟之完成。實現這二種原則的方法，自地理關係言，自經濟關係言，自交通關係言，甚至自文化關係言，開發中國的西北部實在是目前的第一道路線。開發西北的結果，至少可以尖對著上述諸帝國主義統制諸弱小民族更有效的各種辦法，而收穫①鞏固反帝國主義的陣營，②破壞諸帝國主義對諸弱小分別的軍事封鎖，③紊亂諸帝國主義共同統制半殖民地的步驟，④避免諸帝國主義自經濟上封鎖諸弱小的危險，⑤減輕帝國主義的加倍壓迫。

四、開發西北的重要性

(一) 開發西北的意義

我們主張開發西北，應當先道明一個開發西北的理由，換言之，說明開發西北的意義是什麼？開發西北的意義，或許因人而異，因為主張者的見解及所屬集團的利害關係而其意義可以有種種的不同。歸納起來，大約可得下列幾種：

1. 開發西北可以消納中國本部的過剩人口

此說著重於中國本部的人口問題的解決，謂中國連年內戰不絕，其主要原因即在中國本部的人口密度太高。又因「四萬萬三千萬人民窮蹙擁於內地十八省者，殆四萬萬有奇」，「所以困處內地，生計局促，生機遂不能日益萎縮也」，「吾國人口，自一九世紀中葉，號稱四萬萬（道光二十二年十八省人口四一三，〇二一，四五二）當時占全世界總人口三分之一，二十世紀之初，僅占四分之一矣，今則四分之一不足，或有謂並五分之一亦不足者……」。因此，「謀吾族之生長發育，必須經營西北」（帶引號的句子，皆引自劉鎮華氏著《開發西北計劃書》）。

2. 開發西北可調劑中國人民的經濟

主張此說的理由就是「吾國長城內為農業民族繁孳之區，長城外為游牧漁獵（唐努烏梁海今仍專以漁獵為生）民族棲身之所，歷數千年，未嘗多變，故游牧漁獵者生活日益猛獩，而農業者體軀日益孱弱，長此不更，國固不振，種亦日替」（同上計劃書六頁）。因此主張開發西北而獲下列三種利益：（a）移內地農業人民，墾種西北荒地，可以使吾塞外之同胞，日沾濡於布帛黍粟之化而改進其猛獩之生活；（b）大規模改進牧畜事業，振興毛革製造，輸入內地，俾吾農業人民，得以肉乳濟粟米，呢筆濟布帛，一改其飲食服用單調之遺習，庶吾國族體魄乃日進於強健；（c）國內原料及製造品，有大量之交換，可以撻破吾民族數千年來呆定之經濟狀態，驟呈活潑氣象，因此促其進步之速率）（同上）。

3. 開發西北可以獲得中國經濟上的重要原料

主張此說者意謂現代生產上的天然原料最重要的，是煤、鐵、洋油三種，「此三者之礦量，不足敷其國族之需用，在經濟上不得為獨立國也」，又「依最近地質學家之調

查，吾國除煤礦一項，已發見者約供百年之用，可無問題外，油、鐵兩項，均覺缺少。……，「因此之故，更進而主張：『鐵油兩礦內地之蘊藏，既如此其少，則邊區之探尋，實為今日最急之務』。恰好，『由延安迤西至玉門關一帶，到處有油苗發見，玉門附近，又有油泉湧出，將來可望其有大量蓋藏。天山南路，南北山勢雄峻，英吉沙爾，既有鐵產，或冀其為板狀大層（中國內地即有多少鐵礦，也皆非板狀大層，不足供大規模之採治——作者附引），要之西北五省居全國面積十分之三，萬山重疊，礦藏稱富……』（同書八頁）。

4. 開發西北可以鞏固中國的國防

主張上列各種意義者更謂：「今就西北對境外之關係觀察，愈覺西北之經營，其時機尤為迫切」。可見開發西北的國防意義，在一部分人眼中是最重要的。但是，這一部分人之所謂國防者是什麼？「中國西北東北，俱鄰蘇聯，介中國本部與歐俄本部之間，南起崑崙，北盡冰洋，東西廣延數千里，面積約七百萬方英里，其中除遼吉兩省，漢人久已繁孳，黑熱察綏四省，漢人逐漸移殖外，其餘在中國境內者，如外蒙、呼倫貝爾、青海、寧夏、新疆；在蘇俄境內者，如西伯利亞、土庫門、烏斯伯克等地，皆烏拉阿爾泰族各部落漁獵游牧之所。此地區依現在中國與蘇聯國界言之，在中國境內者，約二百萬方英里，在蘇聯境內者，約五百萬方英里」。而「烏拉阿爾泰族部問題者，數百年過去歷史所附予中俄兩國間之最大問題，亦即此東西廣延七百萬方英里土地誰屬之大問題也，使中國對西北各區，早已經營，著有成效，而俄國革命後長久混亂，則不但吾境內之新疆、蒙古，可保無虞，即境外之喀薩克、土庫門等等，俱將向化來歸，則蘇聯境內數百萬方英里之土地，將連帶而隸中華民國之版圖」。但是不幸之至，「今俄國對西伯利亞及中亞各地，經營不遺餘力，所有烏拉阿爾泰各民族多歸牢籠，不但外蒙獨立，急切無法收回，恐新疆各部纏回，亦險象環生，岌岌可危。使此部族者，果皆叛我投俄以

去，則我境內數百萬方英里之土地，亦將連帶而為蘇聯之領土……」。

5. 開發西北則西北民眾的膏血將為本部人民所吮吸

以上所述四種開發西北的意義，只是中國本部人民或官方所想出的意義。但在西北的人民方面，或許另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見解和估價呢！據久遊西北各地者的觀察，現在西北的一般民眾——大多是回族——對於漢族之移殖，極不歡迎，回族對於漢族採取敵視厭惡的態度。其主要的原因在於西北方面的人民，由於他們數十年來的經驗，恐怕中國本部的漢族，又要大批地，大規模地到那裡去大肆欺壓和剝削。這或者是西北民眾一時難免的畏懼，也就是他們顧慮自己利益的一種本部人民的漢族西北開發觀。

上列前三種意義實在不能認為開發西北的意義，而只是達到根本的、正確的意義的條件吧了；如果必欲認為意義，也不過是非重要的、非根本的意義而已。尤其可笑者，所謂開發西北的國防意義，只限於北方防禦蘇俄，而西邊英法帝國主義的侵略，康藏、滇桂之岌岌可危，主張者則裝聾不知；主張者以「遼吉兩省，漢人久已繁孳，黑熱察綏四省漢人逐漸移殖」之故而高枕甜夢之滿蒙，竟至不入「蘇俄之領土」而反為主張者素所裝聾不敢正聽正視的帝國主義夥伴的日本所侵占。只有第四種意義，在西北開發辦法未完全施行以前，暫可充作未證實的意義。其實，西北人民或者太過於杞人憂天，中國本部人民或官方之開發西北，未必包藏這種禍心，一方面固然為著本部的利益，他方面亦為著西北民眾的利益，開發的結果，果能保住利益不外溢，那末，雙方皆得均霑利益，是可預言的，最可怕者恐將為了帝國主義者而架橋已耳。

然則我們所認為真正的根本的開發西北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根據我們在本文上篇所展開的問題——世界情勢儼然形成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二大營壘，其間又夾著殖民地的營壘；同時反帝國主義立場相同的諸勢力有聯結一致的必要問題——我們

認為開發西北的最根本的意義，就是開拓聯結反帝諸勢力的道路，增強中國反帝的勢力（這種勢力不是俗流的西北開發論者的辦法所可以造成的），因而增強殖民地反帝的勢力，乃至增強整個反帝營壘的勢力，希冀借此以達成殖民地的革命，根本解決中國問題。

（二）西北地理境界之商榷

開發西北的根本意義既然決定，西北的地理境界是應該決定的第二點。西北的地理境界，也如開發西北意義之有種種不同的主張，而有種種不同的境界。更切要言之，西北的地理境界之決定，依存於開發西北的意義，有何種意義則有何種境界。茲先介紹一般開發西北論者的境界於下：

《開發西北計劃書》的著者，規定西北的地理境界如下：

- 一、以新疆全省包括天山南北路及新附之塔城、阿爾泰兩道，為本案經營之最終一段；
- 二、以甘肅西北部（蘭州以西）及寧夏、青海為本案經營之中堅部分；
- 三、以甘肅東南部及陝西省為本案經營之基礎。

約言之，本案所謂西北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以河南省及陝西關中道已經繁庶之區域為出發之根據地，以現正積極進行之隴海路為進行之第一徑途，經甘肅而漸次經營寧夏、青海、新疆之邊區也（上引書二頁）。

根據上開境界，西邊的西藏、西康，北邊的內外蒙古，吉林、黑龍江，未包括在內可知。

又據《開發西北計劃書》著者劉鎮華氏所創辦的西北研究社成立大會關於西北境界的討論，聽說解釋西北為「西與北」。若依此種解釋，則西北的境界不只限於上列範圍，是自明的道理。西邊的西藏、西康，北邊的內外蒙古、黑龍江、遼、吉皆應包括在裡頭。

我們對於西北的地理境界，贊成後者的範圍，約略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西康、西藏、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省。在這範圍內分成下列三區：

- 一、北區包括綏遠、察哈爾、熱河、遼寧、吉林、黑龍江、外蒙古。
- 二、中區包括陝西、甘肅、寧夏、青海、西康。
- 三、西區包括西藏及新疆二大區域。

在上列三區的開發當中列出先後來，則應以中區為根據地，為基礎，所以也是西北開發的第一線，出發點；由此中區開發的完成，西北基礎的穩固，再分向北區及西區推進。必須如此始得完成開發西北的真正的、根本的意義。因為只完成劉氏所定境界的西北（約等於我們所定境界的中區）的開發，還不能達成我們所期待聯絡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乃至反帝國主義諸勢力的目的。若西區北區的開發完成之後，則不但可以圖謀抵禦，排去英帝國主義在西藏等地的勢力，並且可以和印度、緬甸等地的殖民地革命勢力，以及阿富汗、俾路支、波斯、美索不達美亞、敘利亞、阿拉伯、埃及等中東近東被壓迫民族聯結起來，蘇俄的反帝勢力也可以經由新疆而聯成一系。北區西北的開發完成之後，又可以藉孫中山先生學生所主張聯絡平等待我的民族的蘇俄勢力與我聯結之嚴密成功，抵抗東邊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這與蘇俄聯絡的意義上，尚有經濟的助力和必要因素存在（關於此點，後面詳論）。

（三）西北在中國的地位與中國在東方民族運動上的地位

然則包括上節所列地理境界的西北，對於東方民族運動，乃至東方殖民地解放，究有何種作用？此項應分兩方面來講：第一，西北在中國的地位如何；第二，中國在東方民族運動上的地位如何？將此兩方面的問題分析連貫起來，即可了然於西北對於東方民

族運動的作用，或效用。

西北在中國的地位，可由一、面積廣大；二、現代資源豐富；三、各稱民族雜處；四、地連蘇俄；五、可以聯通中東近東，五點表現出來。茲分述於下：

1. 面積廣大

中國土地的全部面積，約有四三〇萬方英里，而中國本部十八省總面積約為一五三萬方英里，約占全國總面積八分之三，其餘八分之五，約當二五三萬方英里的廣大面積，幾乎可說是西北的土地。換言之，西北土地面積二倍於中國本部的面積以上（統計數目字據大西齋著《支那的現狀》四頁）。

2. 現代資源的豐富

現代資源的豐薄決定其國家或其地方的經濟的興廢。現代資源之中最重要者，有煤、鐵、煤油、電力、棉花、羊毛以及一般農林產。而西北對於這些現代資源，不但應有盡有，並且產量及埋藏也很豐富，西北的北區東部，素以農業區、天然森林區，及露天煤區負盛名於世，煤、棉花、木材及一般農產皆甚豐富（參閱拙作《日本侵占下之東三省農產》，載本刊二周年紀念特刊）。西北的北部、西部及中部則以牧畜聞名，羊毛、駝毛的產量很豐富。中區及西區萬山重疊，各種礦藏，到處皆有，鐵及煤油的出產有無窮的希望。山高之處必有瀑流，電力之製造也是大有希望的產業。

3. 各族雜處

西北各處皆各族雜處，北區有滿、蒙、漢三族；中區有回、漢二族；西區有藏、回、漢三族，混然周旋於其間。固然異族雜處的地方，時常發生民族的鬥爭，因而愈使社會問題重大化。但是這種民族的糾紛，如能調劑過來，使認清公共的敵人，消滅弱小的自相殘殺，則於人類社會造福不小。開發西北實負有這種使命，不但可以融化中國境內的

民族糾紛，並且可以由此融化而造就中東及近東各弱小民族的融合。因此，各族雜處之點適成了開發西北重要性之一。

4. 地連蘇俄

關於西北地連蘇俄的重要性，有政治的及經濟的二種意義。政治的意義就是：蘇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乃平等待我的民族之一，且在反帝國主義的立場上，與被壓迫民族（中國在內）的利害相同，所以開發西北可以造成與蘇俄聯接的捷徑。經濟的意義就是：中國以及其他被壓迫民族實行反帝國主義的結果，必為諸帝國主義所封鎖，而經濟上發生窒礙，其時的出路只有向北聯絡蘇俄，蘇俄年來經濟的發達，必能拯救中國經濟被封鎖後的種種危機，例如工業製品、生產工具、技術人才，以及資本等等來源的斷絕。

5. 可以聯通中東近東

西北的西區與印度、阿富汗及中亞各地為鄰。開發西北的結果，中國反帝的勢力可與這些地方的勢力聯成一片。更可由此進而聯結安南、緬甸、波斯、美索波達美亞、土耳其、阿拉伯、敘利亞、埃及等地的勢力，而造成東方反帝的整個勢力。西北自地理上及民族關係上言，可以完成這種使命。因此，這一點也是開發西北的重要性之一。

只剖述西北在中國的地位，及其與各方面的關係，尚不足以證明西北開發在東方民族運動上所占的重要性。必須更進而究明中國在東方民族運動上的地位，而後西北開發對於東方民族的作用，如能完全畢露出來。中國在東方民族運動上所占的地位，可以由①面積的廣大；②人口的眾多；③富源之充足；④文化之高；⑤充當諸帝國主義的續命湯；等項表現出來。茲分述於下：

① 面積的廣大

中國國土占亞洲四分之一，北自寒帶，南至熱帶，其面積只中國本部十八省，即已

有一，五三二，〇〇〇多方英里，再加算東三省的三六三，〇〇〇多方英里，蒙古的一，三六七，〇〇〇多方英里，新疆的五五〇，三〇〇多方英里，及西藏的四六三，〇〇〇多方英里，共有四，二七七，〇〇〇多方英里。除蘇俄的領土而外，東方被壓迫諸民族的土地的大部分，皆在中國的國略之內，並且所占的土地均比其他任何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土地肥沃。這一地帶的前途如何，影響整個東方民族運動甚巨，可想而知。（數目據上引大西齋的上引著作，四頁）

② 人口的眾多

中國人口的數目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中國的人口總數，為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人，約占亞細人口總數九九，七〇〇萬人二分之一；即自世界總人口一八〇，四七〇萬人看來，也占四分之一弱。亞洲任何部分的人口，和中國人口的這個大數目比較，皆微之又微。這個巨大人口的中國的民族運動如果成功，對於世界政治固然有極大的影響，對於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必有更大的影響。因此，中國人口眾多之點，在東方民族運動上所占地位的重要，也可想見（數目據《經濟學全集》第三十四卷《世界經濟統計圖表》第一表《世界四面積及人口》）。

③ 富源的充足

中國的富源，無論在礦業方面，農林業方面，抑在畜牧方面，漁業方面，皆應有盡有，產量及藏量且極豐富，或前途的發展希望無限。礦產方面有煤、鐵、鹽、錫、煤油、洋灰、曹達、金等，即就現已開發者而言，一九二五年，中國主要礦產的總額合算，已有三二，四八七百萬多元。農業方面，現有耕地面積已有九二，七六二，〇〇〇多日畝（每日畝等於十七·六四中畝），十五倍於最近占領滿洲的日本的耕地面積。主要農產有米、麥、豆類、生絲、棉花、桐油、小米、高粱，等等。占對外貿易品的重要地位的，

有生絲（一千七、八百萬元）、豆類豆油（各七、八千萬元乃至一億元）、棉花（六千萬元）、桐油（二千五百萬元）等等。林業以東三省的天然森林為第一位，木材的產量可以供給世界之用。漁業方面，漁場的面積約在二十七萬方海里以上，即在現在漁產極幼稚的狀態之下，每年的產額尚在二億元以上。畜業盛於西北，前途有望。擁有如此富足的資源的中國，對於東方民族運動，負有重大的責任。（數目字據上引大西齋的著作二二九頁至二三五頁）

④ 文化之高

中國現在雖是一個弱國，產業雖然落後，而數千年的文化依然存在可觀。其文化程度自某種意義看來，並不在西歐之下，與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比較，則仍占第一把交椅。現在所成問題者，只是不知順風轉舵，儘量地接受新潮流，以應付世界整個危機的逼迫而已。文化程度之高足以領導東方諸被壓迫民族，足以匹敵歐美列強（東方的日本更不消說）的中國，對於東方民族運動前途的影響，只視中國一般民眾，尤其是有覺悟分子的努力和運用為斷。

⑤ 充當帝國主義的續命湯

諸帝國主義爭逐於中國疆土已有長久歷史，但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普及蘇俄的繁榮孤島以外的世界以來，諸帝國主義更切望得中國這塊肥肉而後已。並且，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方式，漸有改爭奪為協作的傾向，諸帝國主義的焦急可以想見，而中國的危機也愈迫切。具有①②③④各項條件的中國，倘若果為諸帝國主義所吞併，或受實質上的統制，則諸帝國主義可以得暫時穩定，而東方諸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前途，必受到巨大的打擊。反之，中國民族若能爭氣，各方面的企圖得法，因而得將爭逐於中國的諸帝國主義勢力排擊出去，則諸帝國主義失去巨大的依據而根基動搖，而東方民族運動

得到極大的助力，乃至成功的因素。因此，在中國為帝國主義的爭逐場之點，與東方民族運動的前途，有密切的關係。

五、開發西北的前程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西北在中國目下的地位，及開發西北對於東方民族運動的幫助了。扼要言之，中國目前的情勢，似非完成正當的西北開發則不容易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中國問題未得相當程度的解決或解決希望以前，東方民族的整個運動，必定失掉推動的助力，乃至原動力。開發西北的重要性，自東方民族運動的立場上言，即在於此點。

然則西北開發完成後，可以發生何種效用？換言之，我們所期待於西北開發的前程，是什麼？根據上面所討論過開發西北的真正意義，我們所期待於西北開發者，約有下列五項：

- (一) 開關諸弱小團結的路線；
 - (二) 與同情弱小者提攜；
 - (三) 融化諸弱小的感情；
 - (四) 提高落後民族的文化；
 - (五) 完成中國的獨立經濟。
- 逐項簡略分論於下：

(一) 開關諸弱小團結的路線

現在東方的諸弱小民族，皆受到帝國主義的統制。安南、敘利亞及北非的摩洛哥、

突尼斯，都是法國的殖民地，專聽法國壓迫、榨取，為所欲為。印度、緬甸、新加坡等，為英國的殖民地，固然專聽英國壓迫、榨取，為所欲為，而尼不爾、不丹、阿富汗、波斯、俾路支、美索波達美亞、巴力斯坦、埃及，及阿拉伯半島的漢志王國，也莫受到英國的統制，儼然英國的勢力範圍。美國占住南洋的菲律賓濱，近來也漸向中東方面推進他的勢力，波斯及阿富汗方面的洋油油田，已為美國資本所染指。日本帝國主義則獨占遠東的部分，如朝鮮、台灣及南洋幾個小地方，都是他的殖民地，最近尚且向滿蒙伸張他的魔手，華北一帶也在他垂涎之下。中國境界內的各部分，大多成了諸帝國主義分割或共管的形勢，西藏統制於英，香港早割於英，雲南及貴州為法國的勢力範圍，長江一帶原為英國的勢力範圍，近來則漸有轉入美國勢力範圍的傾向。他如外蒙及新疆也漸離中國。東方弱小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在這種情勢之下，反帝國主義的利害雖相共而形勢則四分五裂，既成帝國主義的順民者不用說，即企圖抗拒者也因孤掌難鳴而結果無成。但其所造成這樣分裂孤立的形勢的最大原因，在於交通不便，感情本多隔閡，聯絡更無從下手。若西北的開發成功，必可第一步開闢中國境內的聯絡線，第二步向西推進，打通聯絡中東及近東各地的反帝國主義勢力。

(二) 與同情弱小者提攜

孫中山先生為解放弱小民族的被壓迫而提倡聯絡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在東方諸民族之中，他所認為平等待我的民族就是蘇俄。即就現在的情勢看來，利害關係相同並且有充分力量幫助東方諸弱小民族的民族，也只有蘇俄一國。蘇俄自其本身的利害關係設想，也非幫助被壓迫民族以抵抗帝國主義不可。再者，近年來蘇俄經濟的發達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恐慌背道而馳，竟駕諸帝國主義的繁榮而上焉。不但現在已有農產品和製造品，可以和諸帝國主義的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使諸帝國主義對蘇俄的投賣戰慄，並且

在最近的將來，預定由自己製造生產工具——各種生產機器——以自給，並供給他國之用。這樣一來，對於被壓迫民族因反帝而被封鎖時的接濟，必將有很大的助力。即對於平時的經濟開發，也有莫大的意義。因此，聯絡蘇俄是目前被壓迫民族企求解放的途徑之一。而開發西北成功，正可以由外蒙古、黑龍江及新疆，以開闢聯俄的康莊大路。

(三) 融化諸弱小的感情

東方諸被壓迫民族，或因交通的隔絕，或因宗教人情的不同，或因諸帝國主義的奸猾離間，而時常互相仇視，並且常有互相殘殺的事情發生。積如早年外高加索三共和國(The Federal Republic of Trans-Caucasia)，包括佐治亞、亞塞爾揮然及亞美尼亞，現已成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的互鬥，阿富汗民族與北印度民族的對立。去年來印度境內回印兩民族的凶鬥，最近西藏與西康兩地人民的互殘，以及普遍而且持久的回漢、回印、藏回等等帶宗教種族色彩的不幸事件，差不多是東方諸民族間的家常便飯。這些不幸事件的發生，固然差不多每次都有帝國主義的魔手在背後指揮暗算，但是帝國主義這種暗算之所以能奏效，原因即在於諸弱小民族平時的隔閡，及因看目前的利益而各自為政。要補救這種缺陷因而融化諸弱小的感情，開發中國的西北，也是重要辦法之一。因為開發西北依賴中國統一的政權容易辦到，西北開發成功則至少可以融化回漢藏三族的感情和利害，由此三族的融洽而向中東及近東推進，東方諸弱小的整個融洽可望成功，而帝國主義的離間陰謀歸於無效。

(四) 提高落後民族的文化

現在處於諸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東方諸民族，都有悠長的歷史和光大的文化。只因近世以來隔絕於交通的不便而或者封閉關門而過孤陋寡聞的生活，或者在最狹隘的範圍

內繼續著民族的鬥爭，致使在東方的範圍內，對內即無團結一致互相推進的動力，對外又少與亞洲以外的地方摩擦而接受較高文化的機會。在這種情勢之下，東方諸民族的文化，遂被情景相反而日漸發展的歐洲諸民族，駕而上之。現在，歐美的物質文明，較之東方的任何地方皆遠勝多之。不但物質文明如此，即精神文明也較東方高明得多。這一點，除非是讚禮「東方文明」及提倡「東方主義」的人們，如日本的室伏高信、中國的梁漱溟之輩外，都要承認這種事實。但是這些文化落後的東方諸民族，尤其是被壓迫民族之中，與歐美來往最繁，關係最切，因而吸收歐美文化的成分最多的，應該推崇中國，尤其是中國本部。因此，開發西北之後，第一步可以輸入中國本部的比較進步的文化於中國的西北部，第二步尚可進而推廣於中東及近東各民族之間。文化落後的諸民族，得此機會可以提高本地方的文化而改進社會。關於開發西北對於提高文化之點，蘇俄文物制度之影響及傳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點。因為開發西北的西區與北區的結果，可以與蘇俄密接而直接輸入蘇俄的文化，尤其是經濟建設的部分。

(五) 完成中國的獨立經濟

中國現在的經濟發達是落後的。中國的地理環境及向外發展的無需要，延長了封建社會階段的長度。就是現在，這種封建社會的殘跡還很明顯地存在。他方面，歐洲則因殖民地的開拓及其消費品的需要刺激，而發明了各種機器，發見種種動力，因而很迅速地由封建社會過度到資本主義社會，更長驅而入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先到者為君」，中國這句陳語說得好，歐美各國既然君臨於世界，統制了世界各地的落後民族——殘留在封建社會中及古代社會中的諸民族，中國也不出此例外。中國，現在不但經濟落後不發達，並且因為受制於諸帝國主義，即欲發達也不容易。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現在處處受到諸帝國主義的掣肘，甚且處處仰賴於諸帝國主義。幾乎可以說，中國一旦離開帝

國主義，則現代的經濟生活無法繼續。我們瞧吧！中國的生產工具——機械及器具，固然仰賴於諸帝國主義，即日長的生活必需品也莫不仰給於外國，甚至於糧食問題，「農為國本」的中國，現在也須倚重美國的麵粉、西貢及仰光的米、古巴及台灣的糖……來解決。此外，生產上的技術人才及產業資本，等等，也皆非有帝國主義的幫助，不能為力。在這種情勢之下，東方一旦有事，尤其是在中國及其他諸被壓迫民族積極反帝國主義的場合之下，諸帝國主義對中國採用經濟封鎖政策時，中國經濟只有陷入危機而中國人民坐而待饑斃。此時，中國若有聰明的政府和覺悟的民眾，在合理的辦法之下開發了西北，先開拓交通，發達重工業，使經濟發達的基礎穩固；繼而發展輕工業及食糧工業，則西北的經濟發達完成，而中國的獨立經濟確立。其時，諸帝國主義即欲借中國海口的封鎖及占領沿海各國的勢力範圍，以執行破壞中國經濟獨立的工作，中國也可以不至束手無策。何況西北的北區及西區的開發完成，則可以直接聯通蘇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及糧食的來源，可由蘇俄代替帝國主義而挫折他們毒辣的封鎖政策。中東及近東諸民族，若能聯成一氣，中國的獨立經濟更可鞏固。在中國沿海殆皆成了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而發展民族的獨立經濟不容易的今日，尤其是在東北四省已被日本帝國主義征服，日本並且採用排擠本地住民而加重中國關內的人口問題，社會問題的嚴重性的今日，借西北開發之完成以奠定中國獨立經濟的基礎，實有千百倍的重要性及千百倍的效用。

六、結論——開發西北的政治問題

根據本論文所剖述，在帝國主義侵略的現階段，反帝國主義的諸勢力，尤其是東方的被壓迫諸民族，有團結一致以進行反帝工作的必要；在開拓反帝諸勢力團結的途徑上，中國西北的開發有非常的重要性；而開發西北的前程極其光明，有希望。我們在理論上

所得到的結論，是這樣。

然而人類社會的事實，往往出乎理論上的結論之外，有時並且發生相反的結果。在我們所討論的範圍內，儘管我們所檢討的西北開發，對於東方民族運動及中國殖民地革命，有多麼大的重要性，開發西北的前程是多麼大的光明，如果我們的政府或民眾，弄錯了西北開發的方針及辦法，西北開發的結果也會於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無補，對於中國革命造成惡劣的影響，也未可知。例如開發西北的意義果如西北民眾所畏懼的，是開拓榨取西北民眾的膏血的途徑，那末，開發西北不但對於東方民族運動及中國革命無補，並且反能造成東方民族的糾紛，而延長東方諸民族的殖民地命運。又如開發西北的國防意義，若只限於防禦北方的蘇俄，而將英國在西藏、西康的侵略及構煽，法國在雲南、貴州南部的進攻，日本在西北北區東部強占，以及美國正在企圖取得西北開發的優先權乃至經濟政治的支配權，等等事實忘卻於九霄雲外，則開發西北的結果不能幫助東方民族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成功，並且反能使諸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地位日益膨脹，由中國沿海及本部侵進西北的內地，其結果中國全部受帝國主義所統制，實質上完全殖民地化，而斷絕最大殖民地革命勢力的來源，而東方民族的解放，愈益離去事實，延宕至不可捉摸的將來。

開發西北結果的好壞，完全視乎西北開發執行者的中國政府及中國民眾的立場及辦法而定。談到這裡，問題已經展開到「經濟建設與政治的關係」上頭來。政治雖是建設在經濟的基礎上，但是新的經濟建設須俟政治的勢力來開拓途徑。要有合理的經濟建設，須先有革命的政治。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政治要革命的，經濟要和平的」（大意如此），其深意當不出此範圍之外。這種事實充滿著歷史的篇幅，日本的明治維新、法國的大革命、蘇俄的大革命……莫不含有開拓經濟建設礎石的政治革命。

我們如果找出和開發西北相類似的最近事例，則我們可以舉出蘇俄發展西伯利亞東

部的計劃來。這個計劃自經濟建設的理論檢討看，實在和開發西北的真正意義，約略相同，甚至很多地方是密合的。例如蘇俄為謀蘇俄國內各部平均發展而開發西伯利亞，中國也為謀平均發展而企圖開發西北。又如蘇俄的「移民實邊」的用意，中國之西北的開發也含有「移民實邊」的用意。又如蘇俄為發展西伯利亞各種產業以與歐俄的經濟互相倚重，中國之開發西北也為發展西北的各種產業以為完成中國獨立經濟的基石。甚至如蘇俄為完成及推進他們所標榜的社會主義革命而計劃開發西伯利亞，中國也為進行及完成我們所標榜的「殖民地革命」而計劃西北的開發。這兩種經濟建設，實有很多地方密合的意義存在。所以，蘇俄開發西伯利亞的計劃，我們實有借鑒的必要及利益。具體的、詳盡的計劃，因限於篇幅不能儘量介紹，現在只就蘇俄開發西伯利亞東部的意義、辦法，及他們所期待的結果，概括地介紹於下，以備注意此問題者，尤其執行西北開發的政府及民眾，用作參考（原文錄自六月九日《大公報》）。

（伯力十七日電）據頃間視察西伯利亞東部美記者訊，此次視察結果，得悉西伯利亞東部並無失業、饑饉等事。在近十年來，此間受蘇俄漠視，但頃已發現蓬勃蘇醒氣象。蘇俄當局集中全力於建設歐俄與西西伯利亞，以致對此東部廣大區域，不能分神，在此濱臨阿穆爾之大都會與其南方四百英里之海參崴，市街雖不修整，建築雖不圻漆，衛生雖不講求，一切文明設備雖均付缺如，但此種情形，目前已成過去，此為在五千里外之莫斯科無金錢與精力注意此邊遠地方時代之情形。查現時此間建築雖少，工業亦未擴充，但凡此一切已在著手革新、蘇俄擬於一九三二年内，在東部有偉大的努力，增加生產，建築工廠住房，增添政府與合作農場，令農人均加入集產制，此為本年內擬做之事，不過此僅為來年偉大第二（個）五年計劃發端之序幕，此為一種聳人耳目

之夢想，但縱令有一部分成功，亦將予遠東西伯利亞退化的無智識農民以一種新生命也、查第二（個）五年計劃大綱，包括（一）立時施行強迫教育，（二）增加漁業、木材、煤礦、石油、農業等生產三倍半，（三）增加人口一倍，（四）建築鐵道二五〇〇英里，自庫頁島對面太平洋岸至貝加爾湖北岸，然後折向西南與中亞細亞相通，開發煤鐵各礦暨木材，（五）在煤鐵礦附近建設新城市，設製煉工廠，規定能出鐵七十萬噸，鋼二十萬噸，（六）另設工廠，製造農場、修路及開礦用之機器，（七）此外有電力廠、煉糖廠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終了時，須令蘇俄各部分能得平均發展。據擔任計劃本省發展之俄員談稱，縱令在一年期內，亦須有長足進步。據該記者觀察，蘇俄仰仗各處人民之熱忱，以及專家手中之鉛筆，將能設計一新新之世界云。

原載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月《新東方》第三卷第七、八期

世界經濟現狀及其將來

一、站在恐慌第六年度的門口

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人，現在又在經濟恐慌的風浪暴烈翻捲的情勢之下迎接了一九三四年。若從一九二九年度算起，今年已經是恐慌的第六年度了。站在這個恐慌第六年度的門口，資本主義世界一般人的胸中，又都照例充滿著「憂喜交集」的情緒。喜的是因為恐慌已經繼續了四個整年以上的長期，所以推測經濟繁榮或許可以到來。憂的是因為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當中，找不出一種可以造成繁榮的事實。只有布爾喬亞及其御用學者，照例，極力放送著「經濟繁榮將要到來」的空氣罷了。

一九三四年究竟是否經濟繁榮到來的年度？要預測一九三四年世界經濟的動向，須對於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有精密的分析及正確的把握。一九三三年曾經給與布爾喬亞及其御用的經濟學者，以最大的期待。他們都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歡天喜地地預言：恐慌已經過去了，繁榮即將來臨。

然而全部過完了一九三三年的經濟事實，卻打掉了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期待完全成了幻想。他們的幻想或許在一時的「假景氣」的迷霧中得到了極其微小的欺騙的安慰。但是，真實的幻想卻依然是幻想！

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的經過如何？抽象地說來，春季的情形，比之一九三二年冬季的情形還壞，是不消說的，即比之世界大恐慌爆發以來最深化的時期一九三二年夏季的情形也更加深化。二、三月以後，占世界經濟五〇%以上的比重的美國，竟又爆發了全國的金融大恐慌；它的信用制度的根本動搖，震撼了全世界的貨幣及信用制度，切斷了

世界經濟的聯繫。六、七月間，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最大掙扎所反映的世界經濟會議，又在一切國民的面前，證明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及協調的空前的失敗，並且警告說：此後各國的經濟對立更要大規模化，尖銳化！世界經濟會議流產後，各國皆急速地奔向各自的前途：通告退出關稅停戰協定啦，連續提高關稅啦，連續厲行傾銷啦，更加進行經濟部落克（Economic Bloc）的大聯結啦，更加大規模地擴充軍備，發展軍事工業啦，……莫不急向經濟的國家主義的方向邁進，莫不忙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英日國際貿易戰的激烈化及到處傾銷的日貨之受到世界的排斥，也是證明世界經濟的協調無望的雄辯的事實。

總而言之，世界經濟正在各國急向經濟國家主義的方向猛進，整個的世界經濟急向部落克經濟解體的情勢之下，送走了一九三三年，迎來了一九三四年。

二、春季恐慌的深化

世界經濟大恐慌發展到一九三〇年秋後，即展開了一個新階段，就是金融大恐慌的加入。這個金融大恐慌在一九三一年引出了幾種大問題：胡佛延付問題，德奧金融恐慌問題，秋後更迫得英國及鎊系各國不得不放棄金本位，禁止現金出口；而侵占東三省引起世界經濟界大恐怖的日本，也終於步著英國的後塵放棄了金本位。於此，世界經濟的聯絡線碎斷，而世界經濟更加分裂紊亂。一九三二年夏季，遂致發現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以來未曾有的深度。其後，雖然因為美國胡佛的各種救濟政策，造成了一時的所謂「胡佛景氣」；又因洛桑協定的成立，德國賠款減至三十億馬克，緩和德國的經濟危機至某程度；因為這二種事實，遂招來了七、八月間微小的投機市場的好轉。但是這個投機的景氣到十月以後即呈逆轉，一般的希望依然變成泡影。根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調查，若

以一九二八年為基數，則一九三〇年以後的生產及貿易的指數如下：一九三〇年，九〇·五，九〇·三；一九三一年，七七·九，八二·〇；一九三二年，六七·三，六九·〇；一年不如一年。

然而，一九三三年春季世界經濟的情形，更不如一九三二年，即連恐慌最深化的夏季，也都不如。經濟情形的惡化，第一表現在物價的崩落上頭。

一九三三年春季物價表

	一九三二年 六月	一九三二年 一月	一九三二年 二月	一九三二年 三月	一九三二年 四月
美(一九二六年=100)	四六	四三	四一	四三	四五
英(一九一三年=100)	一一二	一〇七	一〇五	一〇二	一〇一
法(一九一三年=100)	四九〇	四五五	四四三	四一七	四〇七
日(歐戰前=100)	—	一四七	一四三	一四一	一四〇

；注：上表所列美英法的指數，根據國際聯盟準備局月報日本的指數則根據日本銀行的調查。

春季的物價，不但比之一九三二年六月還低，並且是一直的跌落。

此外，世界工業的生產情狀，也是步著一直的線狀跌落下來的。根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調查(一九二八年——一〇〇)，世界工業的生產指數如下：一九三〇年平均為九〇·五，一九三一年平均為七七·九；一九三二年平均六六·一；一九三三年一月為

六七·五，二月為六七·三，三月為六六·六，四月為六五·八；可說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世界生產狀態約如一九三二年的平均狀態，而四月的衰落則又超一九三二年而過之。

在這種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未曾有的恐慌深化的情勢之下，終於迫成那生產占全世界過半成分的美國，尤其是歐戰後執世界經濟界之牛耳的美國，爆發了金融大恐慌，空前的金融大恐慌。美國這次的金融大恐慌，不僅僅是美國的信用制度及金融制度根本破產的意義，實質上確是世界信用制度根本動搖，世界經濟全體瓦解的意義。這是此次美國金融恐慌所以當作世界經濟一般問題來處理的原因。

自從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即已在金融危機成長的過程中掙扎著。一方面，停業的銀行越來越多，貨幣越發退藏，現金越發流出；另一方面，則由胡佛的各種救濟政策來彌縫並掩飾。而金融大恐慌即在這種掩飾彌縫政策之下，潛伏地長大起來，終至於三月間爆發了美國近代史上空前的大金融恐慌。美國金融危機成長的情狀，可以由美國全國銀行的存款總額看出來。美國全國銀行存款總額，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四日（約當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起點）至一九三二年底之間，激減了一三八億美元。入一九三三年以來，依然繼續減少，在一月四日至三月一日的短期間，特別往來存款減少了十四億美元（減一四%），定期存款減少了五億美元。

現在正在大刀闊斧地發揮他的獨裁手腕的羅斯福大總統，雖然曾在他就任的第二天三月五日試行現金出口的禁止，但終於不得不在四月十九日正式頒布了禁止現金出口令。美國金融大恐慌發展到這時候，不但造成了美國金融恐慌的新階段，並且造成了世界金融恐慌的新階段。禁止現金出口及停止金本位制，已經不復是例外的、部分的事實，而已經成了世界經濟的支配勢力。完全靠稱為「世界貨幣」的金來聯繫的世界信用及商品流通，到這時候更加破壞，此後的世界經濟體系更要四分五裂。另一方面，所謂通貨膨脹政策的發展——由低級的信用膨脹到匯兌膨脹，到更高級的紙幣膨脹——確是一種

不可避免的趨勢。通貨膨脹政策固可以刺激生產及物價上升，但其效力只是一時的興奮作用，上升的生產及物價，一轉瞬間即又跌落。其後的市況，遂呈現動搖不定的投機狀態：夏季的市況稍稍上升，但到八九月後卻又下跌。

三、夏季恐慌深化的緩和

占世界經濟過半比重的美國採用了高級通貨膨脹政策，施行所謂產業復興法的結果，激勵了美國的投機的景氣，美國各部門的工商業以及交通運輸業，都呈現一時反漲的氣象。因而，世界經濟全體也受美國之賜，春季以來越發深化的恐慌，遂得暫時停頓，並且稍微上升了。自大體上說，夏季的世界工業生產及各種物價，皆有稍微上升的現象。

夏季世界工業的生產指數（一九二八年＝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平均	九〇·五
一九三二年平均	七七·九
一九三三年平均	六六·一
一九三三年四月	六五·八
一九三三年五月	六八·九
一九三三年六月	七五·一
一九三三年七月	八二·三
一九三三年八月	八五·八

注：本表根據德國景氣研究所的調查。

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自四月以後即漸上升，五月即超過了一九三二年的平均指數，七月以後又超過一九三一年的平均指數，實在是世界經濟恐慌以來未曾有的好現象。即以夏季的平均指數與上年同期的平均指數比較，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夏季世界生產指數表

一九二八年	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夏季	九四
一九三二年夏季	八六
一九三三年夏季	七二
一九三三年夏季	八三

注：據日文《經濟往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小島清一的報告。

然而世界工業生產的增加，並不是因為實在的需要增加的緣故，而只是因為（一）恐慌太過於深化的春季景氣的迴光返照，（二）世界經濟會議誘致的投機景氣，（三）美國通貨膨脹政策造成的「假景氣」。因此，夏季世界工業生產微小的上升，尚不足以證明世界經濟繁榮之行將到來。事實上這一時期景氣的上升，也極其不平衡，考察各國變動的狀態，即可明瞭。四月以後物價的變動，也只有美國的升漲最為顯明，由三月的七五·一直升到六月的九六。日英的升漲極其微小，在三月到六月之間，日本由一四一漲至一四三，英國由九〇漲至九八。日英也是受到通貨膨脹政策的影響的。至若維持金本位的各國，則不但沒有升漲，倒反跌落了。法國的物價指數，由二月的三九〇，減至五月的三七二。要而言之，本季市況的上升，只是投機景氣的表現，只是通貨膨脹政策

招來的結果（以上數字皆根據日文《經濟往來》十二月號，日本銀行的調查，以歐戰前為基數一〇〇）。

還有一種事實可以證明夏季上升的市況，是一種假景氣。本季的世界貿易，比較以前任何年份的世界貿易都衰退多多，甚至於連恐慌最深化的一九三二年夏季，也都不如。

一九三三年夏季世界貿易表（一九二八年＝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夏季	九八
一九三一年夏季	八三
一九三二年夏季	六六
一九三三年夏季	六二

（注）根據柏林經濟研究所發表的指數。

貿易的衰退，大體上可以說是對於商品的需要減少了，也就是世界的購買力減低了。只要世界的購買力不增加，那末，世界經濟恐慌的消滅，乃至經濟繁榮的到來，自然是談不到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根本原因，即在於生產的過剩，在於生產力與購買力的不均衡的發展，更自經濟法則上說來，就是在於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不相適應上頭。

四、秋季以後景氣的沉落

一九三三年夏季世界經濟恐慌深化的緩和，甚而至於呈現了微小的上升的氣象，完全是世界經濟會議和美日等國的通貨膨脹政策的引誘激成的。在整個世界經濟恐慌越發

深化的過程中苦悶著的企業家們，皆認為恐慌的根本原因在於各國的經濟對立，所以倘得集合世界各國共同討論出一個協調的方法，圓滿解決各國間的各種經濟糾紛，則世界經濟立刻可以繁榮起來。在世界經濟會議未開幕以前，乃至開會期中，各國企業家對於這個會議，皆抱著熱烈的希望，預料世界經濟會議必能消除世界貿易上的種種障礙，所以大家爭相擴大生產，以備向外推銷。這是夏季世界生產所以激增的第一原因。其次，美國在春末夏初，繼續採用種種破產救濟辦法，如銀行破產的救濟等等，通貨膨脹政策，及所謂〈產業復興法〉造成投機的景氣，物價遂有了顯著的增漲，生產也有急速的增加。因為占世界經濟過半比重的美國假景氣的升漲，遂平擺了恐慌，至於略為升漲的程度；同時也刺激了世界各國，夏季世界生產，遂有上述的良好現象。

然而上述刺激夏季世界經濟界的兩種原因，到了八、九月以後即已失掉效用。世界經濟會議經過數十天的長期討論，不能獲得各國經濟上的妥協點，倒反暴露了各國經濟對立的不可調和性。經濟會議終於毫無結果地流產了。（詳情參閱拙作〈世界經濟會議及其後世界經濟的動向〉）這個協調企圖的失敗，預告企業家說：各國此後的經濟對立更要尖銳化，商品的銷路更要狹隘化。另一方面，羅斯福的產業復興法及通貨膨脹政策，也漸失去效用，美國的投機熱也漸冷卻，遂致影響世界經濟的一般景氣下跌下來。不過，這裡有一個特色，就是景氣的升降動搖不定，這完全是恐慌現階段上各國通行的恐慌對策的通貨膨脹政策促成的現象。

投機景氣的消失，第一步表現在一般物價的下跌上。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物價指數表

		美(紐約)	英國	法國	德國	日本
四月	—	九九·九	—	—	—	—
五月	—	九六·〇	—	—	—	—
六月	九五·七	九八·一	六八七	九一·九	—	—
七月	一〇三·五	九八·五	六九七	九二·九	一四四·八	—
八月	一〇五·三	九八·四	六九四	九四·二	一四三·一	—
九月	一〇三·九	九八·五	六八八	九四·九	一四八·〇	—
十月	一〇一·三	九七·〇	六八四	九三·七	一四三·五	—
十一月	—	九五·三	—	—	一四二·一	—

(注) (一) 紐約的物價指數根據日文《中央公論年鑑》。(二) 英國指數根據 Economist 關於五十八種商品的統計，一九一四年七月為基準。(三) 法國指數根據一般統計局關於一二六種商品的統計，以一九一三年為基準。(四) 德國指數根據聯邦統計局關於四十五種商品的統計，一九一三年為基準。(五) 日本指數根據日本銀行關於五十六種商品的統計，一九一四年七月為基準。

根據上表，可知除德國而外，各主要國家的物價都是跌落的。而德國的調查，自從希特勒上台以後即已不可靠了，完全採取欺騙的手段來掩飾德國經濟危機的深化。

各國的股票價格也有跌落的趨勢。英國九十二種股票價格指數，由六月的一〇八跌至十一月的一〇四(一九二四年一〇〇)。法國三五〇種股票價格指數，也由七月的二五三跌至十月的二三三(一九一三年一〇〇)。德國三二九種股票，也由七月的六

八·五跌至十月的六二·一（一九二四年六月一〇〇）。日本股票的跌價略遲，但自十月以後也即大跌，由十月的一四四·二跌至十一月的一一五·九（一九二一年四月一〇〇）。美國的股票價格，因為「人為景氣」的影響，始終動搖不定。紐約市三十種工業股票的市價如下：八月三十日為一〇二·三五元，九月二十七日跌至九三·一八元，十一月一日更跌至八九·六二元，其後雖略反漲，十二月六日漲至一〇一·二八元，但至十二月十三日又返跌至一〇〇·六九元。（根據日文《世界經濟》月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及一九三四年一月號附表）

一般物價的跌落必然地引起生產規模的縮小乃至生產限制，因此，在秋季以後，世界生產也與物價同樣呈現衰退的情狀。

一九三三年秋季以後的世界生產表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美國	—	七五·六	八〇·七	七五·六	七一·四	—
英國	六〇九	五七八	五七七	五六〇	六八〇	六七九
法國	八五·八	八七·四	八八·二	八七·四	八五·六	—
德國	—	九九·九	七一·四	七一·六	七二·〇	—
日本	一一二·一	一一〇·五	一二五·二	一一五·三	—	—

（注）（一）美國的指數根據《國民經濟雜誌》五十五卷六號，（二）英國的數目單指粗編的生產量，單位千噸。（三）法國的指數根據一般統計局的工業生產指數表，一九三一年為基準。（四）德國的指數根據柏林景氣研究所的工業生產指數，一九二八年為基準。日本的指數根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的調查，一九二一年五月為基準。

根據上表可知，世界一般的生產皆向下衰退。美國的鋼鐵生產更在證明美國工業往下的趨向：銑鐵生產由七月的一八二·一萬噸減至十月的一三六·四萬噸；粗鋼生產由七月的三二五·五萬噸，減至十月的二一四·六萬噸。

在世界經濟一般的沉落的情勢之下，只有一種唯一的好現象，可以說例外的好現象，就是國際貿易的發展。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國際貿易表

日		德		法		英		美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入	出						
一三·七〇一	一六·〇三八	三五五·七	三八四·五	二四〇·四	一四二·八	五三·八	三三·七	一二二·三	一一九·八	一四·一〇四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三·九〇〇	
一四·一〇四	一五·八七二	三六〇·二	三八五·八	二二二·一	一四七·一	五三·七	三四·二	一四三·〇	一四四·四	一四·一〇四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四·一〇四	一四·一〇四	
一三·一〇八	一八·三七六	三四六·八	四二二·五	二二四·九	一四四·〇	五六·八	三五·三	一五五·〇	一三一·五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三·九〇〇	
一三·一〇八	一八·一六一	三三七·〇	四三三·〇	二二三·一	一五八·五	五七·八	三五·六	一四六·七	一六〇·一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三·九〇〇	
一三·一〇八	一七·一八八	三四七·〇	四四五·四	二二三·〇	一六六·二	六一·八	三八·七	一五一·〇	一九四·〇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三·九〇〇	
		三五一·〇	三九四·〇			六三·七	三八·一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一〇八	一三·五四一	一三·九〇〇	

(注) 上表根據日文《世界經濟月刊》本年一月號統計表編製而成的。美單位為百萬美元，英單位為百萬鎊，法單位為千萬法郎，德單位為百萬馬克，日本單位為百萬日元。

萬日元。

一般的世界貿易雖然稍稍上升，但這也只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是〈關稅休戰協定〉的賜與。各國為著便利世界經濟會議的進行順利起見，成立了各國的關稅停戰協定，凡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的國家全部加入，所以各國的關稅戰爭自六月以後，入於休戰的狀態，而世界貿易遂得稍稍流通無礙。但揮關稅休戰之國的世界貿易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一旦世界經濟會議失敗而各國聲明退出關稅休戰協定之後，則貿易戰爭必更尖銳化。所以自十月以後，有些國家的對外貿易就呈現反落的現象。

五、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轉動的機契

總觀以上各節的分析，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大體上總算維持著比較平順的情勢。但是這句話並不是說世界經濟已經由恐慌渡到蕭條 (Depression) 的意思 (依照景氣循環說，恐慌後到來的蕭條，就是到繁榮去的階段)。而只是說一九三三年經濟恐慌的深化，沒有一九三二年以前那樣激烈的意思罷了。第一因為這一年中經濟的發展既不均衡，生產和貿易的發展並不適應；第二因為這一年中世界經濟的發展忽升忽降，動搖不定；第三因為現在還不能發見世界經濟轉好的前提條件。實質上，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之所以能夠維持著平順的情勢，完全是由於人為的及暫時的作用。羅列這些作用，可得下列七種：

- (一) 世界經濟會議誘發的投機熱；
- (二) 普遍的戰爭景氣的膨脹；
- (三) 美日英等國的通貨膨脹政策；

(四) 美國的所謂產業復興計劃；

(五) 殖民地統治的強化；

(六) 關稅停戰協定的一時作用；

(七) 日本國際貿易的大活躍。

從現在既定的結果看來，或自那時候洞悉資本主義世界的根本矛盾的眼光銳利的經濟評論家看來，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固然是必然的歸宿，但在當時的企業家們則視為長期恐慌的黑暗世界中的救星。誠然，世界經濟會議所企圖解決的三大問題，通貨信用問題及關稅問題，倘能獲得圓滿的解決，則各國的經濟對立可以緩和至某程度，世界貿易可以增進，世界的生產也可以隨之而增加。世界經濟會議對於企業家的投機的引誘性，實在不小。世界的生產及貿易，就在這種投機的引誘之下膨脹了一個時期。

其次，普遍的戰爭準備也是維持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平順的根本契機之一。世界經濟恐慌深化所反映的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上及政治上對立的尖銳化，激動各國瘋狂的備戰。去年一年中輕重工業的生產及國際貿易中，軍事工業的生產及軍器的買賣，占很大的比重。鋼鐵的生產不用於生產設備上，而用於槍炮及軍用汽車的製造上。例如法國的冶鐵生產，雖然提高了二四%，但機器生產卻只提高了八%，所剩的一六%全部是軍器生產的增加。又如法國的汽車工業的生產提高了一七%，而大部分都為軍用汽車所占；並且法國幾個主要的汽車工廠 Renault、Hotchikin、Worben、及Citron 等等，都是兼造坦克炮、機關槍，及軍用飛機的。德國的軍需工業尤為發展。德國的鑄鐵及鋼鐵的生產，雖比前年提高了一五%至二〇%，但生產機器的生產額卻反從前年八月的一一七落到去年四月的一一四，這在露骨地證明德國去年的工業生產完全為軍器生產所維持。此外，如三合土的生產及棉織工業的生產，也和軍備有密切的關係；三合土用於要塞的建

築，棉布用於軍裝的準備。英美日等國也有同樣的情勢。即據故意掩飾的國際聯盟的統計，世界軍器的生產也已集中在十大工業國，英、美、法、日、德、捷克斯拉夫、瑞典、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去年秋後因為各國皆努力於軍備的擴充，軍事工業更有急速的發展。各國軍事的輕重工業的發展，自然攤平了世界工業生產的衰落。

幾乎普遍全世界的通貨膨脹政策，也是激動景氣的主要動力。自從一九三一年秋英國開始停止金本位以來，通貨膨脹政策即已有高級的發展。同年冬，日本再度禁止金輸出，放棄金本位。去年春間，美國也為金融大恐慌所逼迫而步英日之後塵。到這時候，通貨膨脹政策已經支配了世界經濟的大部分；並且概由初級的信用膨脹升到了匯兌膨脹，乃至紙幣膨脹的階段。通貨膨脹政策對內可以提高物價，增加企業家的利潤，減低破產企業的負擔及融通資金，因而激動各部門的生產活躍起來；對外可以降低本國貨幣的國際價值，阻止外貨進口，增高外國貨幣的國際價值，鼓勵本國商品向外輸出，更能激動各部門的生產活躍起來。在去年一年中，英國的經濟界所以能夠維持小康的狀態，日本商品所以能夠大批地向世界市場進出，以及三、四月以後，美國經濟界所以能夠比較顯著地活躍起來，完全由於通貨膨脹政策的採用。反之，勉強維持著金本位陣壘的各國（法國是個代表國家），經濟情形皆極其慘淡。因此，去年世界經濟能夠維持平順的狀態，實得通貨膨脹政策之賜不小。

美國除了大規模地施行通貨膨脹政策之外，還施行復興整個產業界的計劃，所謂《產業復興法》就是這種計劃的具體規定。美國產業復興法適用的範圍非常廣大，包括著政府的救濟，限制生產及管理物價，廢除托拉斯的禁止立法，勞動的統制，公共事業的興辦，本國市場的獨占等等。這種產業復興計劃運動，在犧牲勞苦群眾及中小生產者的條件之下，是可以在相當的程度激動各部門的經濟活躍起來的。美國去年三月以後經濟界顯著的活躍，完全由於這種人為的作用；整個世界經濟也大得其賜。但要注意這只是一

時的興奮作用，後節詳述。

此外，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加強的壓榨，對於經濟恐慌深化的緩和，也有極大的作用。這種壓榨的根本用意既在於緩和各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事實上也已把恐慌的深化緩和了不少。去年以來，各國帝國主義的這種壓榨格外地加緊。這種事實表現在所謂集團經濟形成的急進上頭。英國自從前年洛桑協定成立以後，即先後實現其獨占殖民地及自治領市場的計劃，各殖民地對於英本國提高優先地位，對於外國則閉鎖市場。美國自經濟會議失敗以後，更加推進其所謂泛美洲同盟的企圖，現在事實上已經達到目的了。日本獨占了東四省，實施了所謂「日滿經濟統制」，野心猶未充分滿足，還企圖向華北及內蒙古各省侵進。此外，多瑙河流域，近東及非洲各國，不管是完全的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莫不處於諸帝國主義的強度壓榨之下。在世界經濟恐慌更加深化之下，在外國市場幾乎完全被封鎖了的情勢之下，加緊各自的經濟集團內殖民地民眾的壓榨，遂成了緩和各國帝國主義恐慌深化的主要源泉。近年來各國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性各國的貿易皆相對地增加，而主要工業國家之間的貿易倒反減少了。各國帝國主義向殖民地的資本輸出，尤其占重要的地位。在去年一年中，各殖民地性的國家，尤其是發揮了這種作用。

最後，去年五、六月以後促進世界貿易進展的兩種原因，關稅停戰協定的一時的效用及日本國際貿易的大活躍，也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數年來各國經濟上最大的困苦，就是生產過剩、就是商品市場的狹隘，也就是各國市場的封鎖造成的國際貿易的極度衰退。所以去年五六月間一旦為著便利世界經濟會議的進行而締結關稅停戰協定以後，世界的貿易立刻活躍起來。去年下半年世界貿易之所以格外進展，原因完全在這裡。再者，去年日本對外貿易的大活躍，也增進世界貿易不少的成分。日本一九三三年的對外貿易總額，比之一九三二年增加了日金十億元（據一月十日東京路透電）。去年日本物價大跌，所以日本對外貿易的數量必在上列金額所表示的數量以上。各國的對外貿易皆無多

大的進展，而獨日本的對外貿易有顯明的發展。可知日本對外貿易在去年世界貿易發展上占如何的地位。

六、此後世界經濟的展望

根據以上的剖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依然在恐慌的路軌上邁進。即如七、八月間一時上升的景氣，也不過是一些極不可靠的「契機」所促成的。布爾喬亞及其學者們從一九三二年底抱懷下來的期待，完全粉碎了，這是事實確定了的。但是此後世界經濟的動向究將如何？將如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的期待，經濟繁榮果然到來呢？抑或經濟恐慌繼續下去，甚而至於恐慌更加深化？這是我們的新課題。

要解答這個新課題（展望未來的世界經濟），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卻有一個最根本的指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幾種矛盾，尤其是帝國主義階段上的幾種矛盾，能否解消。例如最近羅列在我們眼前的生產上的矛盾，流通上的矛盾，國際貿易上的矛盾，貨幣鬥爭上的矛盾，信用問題上的矛盾，失業問題上的矛盾，乃至殖民地爭奪上的矛盾，等等，倘若無法解決，則經濟恐慌只有繼續下去，深化下去——即令發生一時的部份的好轉。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之中，生產的矛盾算是最根本最主要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社會的一方面竭力推進生產量或生產力之無窮盡的擴大，但另一方面消納生產物的購買力卻相對地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諸法則之一，這個法則即在恐慌期依然適用。日本現在勞動的生產性比之恐慌前增加一倍以上。例如紡織工人每人一天的生產量，在一九二四年不過一萬碼，一九三三年則增至二萬四千碼；每一人所管的織機台數在同期間，也由一·一台增至二·一台。生產力的發展最落後的日本尚且如

此，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更不能夠例外；輕工業部門的進步尚且如此，重工業部門必有更高度的進步。但在單位生產量增加的反面，卻有幾乎成比例的工人被擠出生產過程之外，成了失業者。單位生產量雖然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因社會的購買力沒有增加，總的生產量也就不能增加，結果只有縮小生產設備，按照勞動生產性增加的比例而造出失業工人。失業工人的增加，更加減少社會的購買力，而成為經濟恐慌基本原因的生產過剩更加擴大。

社會購買力之減少，還可以從實質工資的減少上看出來。例如去年在生產及貿易上有顯著發展的日本，實質工資尚且減少了許多。一九三三年十月與一九三二年同期比較，工資指數只增加〇·三%，而小賣物價指數則增加一三·三%。這固然是日本獨占資本支持下的日本政府假藉通貨膨脹政策以加緊勞工的剝削，但是實質工資減少的結果，必更減少社會的購買力，因而生產過剩更加增大。又如限制農業生產以適應生產關係，也是減低社會購買力的一大原因。例如美國羅斯福以獎勵金的方法限制棉麥耕種面積，就是一個著例。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為適應矛盾百出的生產關係而終不得不採用「飲鳩止渴」的政策，實在可憐之至！

生產量增大與社會購買力減少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從胎裡帶來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政府為消滅這個矛盾而採用的各種政策，卻又適足以增大它。只要這個矛盾不能克服，則生產無從增加，經濟繁榮也就無從到來。

國際貿易上的矛盾，也是經濟發展的大障礙之一；恐慌之所以不能克服，國際貿易之衰落負著相當的責任。國際貿易固然是利潤的國際分配的歷程，它有促進生產的效力，但在目前各國貿易政策的束縛情勢之下，國際貿易卻只有一天衰落一天，數年來貿易的衰落的速度，已經超過了生產衰落的速度。正統派的自由貿易政策，早被各國政府拋到九霄雲外，即自由貿易祖國的英國，也棄此政策如敝履了。於是國際貿易的矛盾遂日益

深化。各國一方面企圖獨占本國市場及殖民地市場，另一方面則努力向外國及外國殖民地傾銷本國商品。換言之，各國皆企圖侵入外國市場，同時卻又封鎖本國市場。自去年以來這種趨勢尤其是顯明。各國皆兢兢業業地提高關稅，或採用阻止外貨入口的方法，如反傾銷立法，按分制度及禁止法令；他方面則由政府實施匯兌丹併政策及獎勵政策，降低輸出商品的價格至國內市價以下，甚至至生產原費以下，以促進輸出。各國施行這些政策互相報復的結果，各國的經濟對立必更尖銳化，而國際貿易的繫聯越發碎斷。最近，英日，美日，乃至英法的貿易戰可說是空前的激烈，各國雖也感覺這種貿易戰的危險，竭力尋覓國際協調的途徑，但是去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正和一切的國際會議一樣，指示著各國協調的途徑已經是「此路不通」了。此後的國際貿易戰只有越發尖銳化，而國際貿易日益衰落，國際經濟及各國經濟的恐慌更要深刻化。

促進國際貿易衰落的另一原因，就是貨幣制度及信用制度的大動搖。最近許多主要國家如英日等國皆為阻止現金之外流及增加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而放棄金本位制度。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固然因對外匯價的暴跌而增加了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維持金本位的國家的對外貿易，則大受打擊，這就是美國遭受英日該種政策的打擊，終不得不於去年春間也以同樣政策相報復的原因。現在處在英美兩國該種政策逼迫之下的法德等國，且已有相繼放棄金本位制的危險性，國家貿易的障礙只有越發增大。

隨伴各國金融恐慌而來的信用制度的動搖，減低了國際購買國的信用程度，因而減低了國際的購買力。數年來國際資金的流動，不但變化非常，並且偏在幾個國家。去年中，這種情形尤其是惡化。金融恐慌爆發以來，各國皆不敢輕易向外放款，長期放款幾乎絕跡，短期放款的金額也大減。並且，各國皆呈不安的狀態，本月放款，來月即提回的事情，也已司空見慣。於是，世界的現金專集中在幾個國家如法國、瑞士，及比利時等，造成資本過剩的現象。但另一方面則有許多國家缺欠著資本。這個矛盾不能克服，

則不但國際貿易不易振興，世界經濟也只有更加瓦解。然而國際貨幣信用問題——這個問題和關稅問題構成去年世界經濟會議的最主要議題——的解決，自去年經濟會議失敗以來即已成了絕望的課題。

本來，生產上的矛盾減低了社會的購買力，造成貿易上及貨幣信用上的矛盾，而貿易上及貨幣信用上的矛盾，則又具有增加生產上的矛盾的反作用。所以，貿易上及貨幣信用上的矛盾，若無法解消，則世界經濟恐慌唯有深化一途。

再者，各國亦皆企圖減少失業者數及擴大殖民地，藉以克服本國恐慌，但這兩種政策上也有它們本身的矛盾存在。固然不減少失業者數，則社會購買力不能增加，產業也就無從發展，但是資本家的利潤欲卻要求著資本的有機構成的升高，極力減少雇用的勞工。資本家之極力增加勞動的強度，自然要擠出相適應的勞工出了生產過程而變成失業者。因此，希特勒及羅斯福所標榜的提供工作的綱領，並沒有減少德國及美國的失業者。又如殖民地的爭奪，也有不可消除的矛盾。各帝國主義固然皆企圖擴大殖民地，但是世界的地面原則有限，難以適應各國無窮的要求。現在世界上的殖民地幾乎完全被分割完盡，未被分割的地方也都變成各國的勢力圈了。況且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也皆鬧著恐慌，究能解救各帝國主義的恐慌至何程度，是一個疑問。各帝國主義要爭得殖民地，終須以武力相見，而戰爭又是造出經濟破產的最有效的動力。欲藉以解決恐慌的戰爭，只有增大了恐慌，直至發生質的變化，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為止。

因為資本主義生產具有上述各種不能克服的矛盾，所以各國用盡無數的恐慌對策，依然不能發生效力，此後世界經濟的大動向已可窺見一斑。資本主義世界只有照舊循著恐慌的道路前進，「景氣循環說」到這時候，很顯明地已經起了質的變化，目前即如蕭條（Depression）也未發見，繁榮之到來更談不到。

然而，布爾喬亞政府依然繼續他們的掙扎，依然要施行種種的經濟政策來緩和或克服恐慌。目前，各國業已施行或將施行的主要對策，有關稅政策、傾銷政策、通貨膨脹政策、統制經濟政策、部落克經濟的創造政策，乃至軍事工業振興政策，等等。這些經濟政策施行的路程及其將必發生的各種結果，也就是最近的將來世界經濟的動向。換言之，一九三四年的世界經濟的情勢，將循上列各國施行的經濟政策的路線以前進，並且以這些政策的結果而發現出來。因此，考察這些經濟政策的路線及其必然的結果，更可以預知世界經濟的具體的動向。

在這世界貿易日益衰落的情勢之下，各國為要維持他們的對外貿易，自然必須採用關稅政策提高關稅以獨占本國市場及殖民地市場。英國自從沃大瓦協定成立以來，即已急激推進這種政策，將來恐怕更要急進，印度、澳洲、南非聯邦及加拿大等地的關稅牆壁將必築至外國商品無法進去的高度。其他各國也莫不爭先提高關稅，並設阻止外貨進口的種種辦法。但是資本主義經濟本質上又須靠海外市場始能維持其生產，所以主要的資本主義各國又必須設法向外傾銷本國商品，犧牲本國的消費大眾以施行傾銷政策，遂成了各國經濟活動的動向。最近，匯兌丹並政策尤其成了各主要國家的傾銷政策的主幹。關稅政策和傾銷政策，遂至互相賽跑。這種賽跑預告我們：世界貿易乃至世界生產只有越發衰落。

其次，通貨膨脹政策是現階段資本主義各國主要經濟政策之一。通貨膨脹政策有一時提高物價增加生產的效用，所以最近為恐慌所困惱的國家，皆採用或將採用這種政策，以期克服恐慌。在歐戰中，俄德法以及參戰各國曾為籌劃財政而施行過通貨膨脹政策。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英日等國更以克服恐慌的意義而施行同樣政策。美國也於去年三、四月以後，與所謂〈產業復興計劃〉並行而施行更具體更擴大的通貨膨脹政策。英國的該種政策竟擴充到貶低美金元的價值，統制金融，及增發紙幣的範圍。到這時候，

通貨膨脹政策已由特殊的部分的政策變成一般的普遍的政策了。即如勉強支撐著金本位制的法德意比波荷等國，處在這通貨膨脹的風潮及匯兌丹併政策的衝擊當中，恐怕不久也將被捲進這浪潮中去。

但是通貨膨脹政策只有一時的興奮作用，依然不能解決經濟恐慌。通貨膨脹政策固然可以提高物價促進生產，降低貨幣價格減輕破產的產業資本家的負擔，增加本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而利輸出，但是這種效力不能持久，達到一定階段即又返落。通貨膨脹政策在國內是以工農等勞動大眾及消費大眾為犧牲的，結果適足以減低社會的購買力，而物價復又返跌，生產復又減少。從去年四、五月升漲的美國的物價及生產，到八、九月以後即又返落，就是一個顯例。有的時候，通貨膨脹政策根本就不能發生作用。例如為膨脹信用而由政府或中央銀行放出的借款，不流入生產界（這是因為消費減少而起的生產減縮）而轉彎重複回到各銀行的儲金部。又如為膨脹貨幣而增發的紙幣，不流入商品流通場（這是因為消費減少而起的商品交換的減退）而退藏於銀行及各公司的金庫裡，通貨膨脹政策甚至於加深了恐慌的危機以至於爆發金融恐慌。例如美國胡佛的信用大膨脹政策，終於造成去年二、三月間美國的金融大恐慌，即如最近各主要國家用為貿易政策的「匯兌膨脹政策」，也有其飽和點。匯兌膨脹政策的效用在於降低匯價，增進輸出。但是輸出的增進，不但會引起外國的排斥，並且會因出超而匯價增高，而匯兌膨脹政策的效用終了。要而言之，通貨膨脹政策除開戰時的特殊場合，是不會發生很顯著的效用的。要靠通貨膨脹政策來緩和或消除恐慌，不過是一種「此路不通」的把戲。

長期為世界經濟恐慌所困惱的資本主義各國，近年來也妙想天開，居然沉醉於所謂「統制經濟」的甜夢中了。統制經濟源出於「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是蘇聯實施於社會主義建設得到很大效果的經濟政策。各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大都仿效起該種計劃經濟的辦法，但是資本主義各國的計劃經濟，本質上到底和蘇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不同，

所以吾人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

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政策，現在風行於世界上，英、德、法、意等國早即施行，最近美國和日本的計劃經濟辦法更加具體而且擴大了。此後，業已著手於計劃經濟的各國，更加擴大其適用的範圍，未施行的國家也有效行的傾向。計劃經濟政策的要點，就是國家的政權伸張到經濟上，把原來無組織無計劃的資本主義經濟，改成為組織有計劃的經濟。換言之，就是由國家或政府來管理各部門的經濟。更具體地說來，一國的生產，尤其是重要工業的生產、交換、對外貿易、國內外的金融，甚而至消費及勞動，等等，皆由國家或政府依照預定的計劃來管理或推進。例如意大利的計劃經濟及最近著著進行的美國計劃經濟，規模都非常廣大，辦法也很周到。

資本主義各國固然皆企圖借計劃經濟以克服恐慌，但是我人則認為是他們的幻想。計劃經濟在其政策的本質上，固然沒有問題，是可以解決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的，但是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卻沒有實行原本意義的計劃經濟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根本就無法施行計劃經濟；即令實行也不會有根本的效力。資本主義各國是在承認經濟恐慌根本原因的私有財產制及利潤追求的情形之下實行計劃經濟的。他們又是在金融寡頭統治之下實行計劃經濟的，在這種情勢之下實行計劃經濟政策，究竟能否以大多數消費大眾的需要為前提，能否不顧資本家利潤的要求，排脫資本集中及集積的法則的支配，而來真正為全社會的消費以進行生產或分配，這恐怕很難做到！去年春間以來希特勒開給德國小資產階級的支票，不但沒有兌現，倒反引起了他們的憤恨。羅斯福獨裁下的統制經濟的效力，也不過是去年八、九月以後美國經濟活動的反映，就職勞工事實上並沒有增加。

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雖說不能解決經濟恐慌，但卻對於金融獨占資本有很大的便利，因此，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此後必更為各國所採用，甚而至殖民地性的國家

也都有採用的大動向。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適用範圍的擴大，擴大至殖民地性的國家或地方來，就產生了一個最大的世界經濟的動向。從前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不過適用在主要資本主義各國的本國內，現在則把許多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解體到幾個巨大的統制經濟體制了中，形成了更大的統制經濟體，這更大的統制經濟體，就是所謂「部落克經濟」(Bloc Economy)或「經濟集團」。例如印度、澳洲、南非聯邦，及加拿大等國解體到英國統制經濟體當中而形成大英帝國部落克經濟。又如日本吞併東四省而企圖造成所謂「日滿經濟集團」。

最近幾年風行於世界上的「經濟國家主義」，現已更加擴大，直向「部落克經濟」邁進。自從前年沃大瓦會議後及去年沃大瓦協定漸次實行以來，大英帝國部落克經濟的形成，遂至具體化，而其他的部落克經濟的進展，也漸顯著而急進，現在已經形成的部落克經濟，至少可以舉出五個大部落克來，大英帝國部落克、歐州部落克、美洲部落克、日滿部落克，及蘇聯部落克。在歐洲部落克當中，還可以分成法國部落克及意大利部落克，但在大體上皆處於法國金融資本的統制之下。這些部落克皆以本國、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為構成份子，在各自的部落克經濟當中施行統一的有組織的經濟計劃，而與其他部落克對立，例如排斥外貨及外資，尤其是政治勢力之侵入。

各帝國主義造成部落克經濟的根本用意，在以殖民地及勢力圈的民眾為犧牲來緩和其本國的經濟恐慌，及增強本國的實力以與其他各國對抗。這種辦法除開加緊殖民地及勢力圈的民眾的剝削之外，就只有擴大並增大各國的對立和衝突。各部落克內部的統制未必能夠圓滑，例如大英帝國部落克內的印度及加拿大等地的經濟與英本國經濟之間就有許多的矛盾。即使部落克內部沒有問題，也不過加深世界經濟政治的危機，促進第二次世界大戰早些來臨。

去年以來，各帝國主義更加努力擴大各自的部落克及加緊部落克的聯結。具體地說，

就是擴大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及加緊殖民地的統治。這種動向對外表現為殖民地的爭奪戰，增大戰爭的危機，對內表現為被壓迫民眾與壓迫民眾對立的尖銳化，激動民族革命運動爆發，也是一種戰爭。

總而言之，戰爭的導火線已在燃燒著了——戰爭是帝國主義階段口的特質！

各帝國主義也皆覺察這種逼切的戰爭危機，所以一方面加深這個危機，另一方面則積極準備戰爭。這裡又產生了一個最主要的經濟動向，就是「軍事工業」的振興。去年中世界經濟恐慌所以不至於急速深化，原因即在於各國軍事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皆有同樣的趨勢。重工業上，生產機器的生產量減少了，反之，各種軍用機器的生產量倒反增加了。棉織工業的生產和軍裝的準備，也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如修路、架橋、築港、造飛機場，等等，也可認為軍事工業。

此後，各種軍事工業還要急速地發展。即令在極密切的暗室內發展，其發展也必表現在緩和恐慌深化的事實上。在無數的資本主義恐慌對策當中，振興軍事工業的辦法，是目前最有效力的政策。所謂「戰爭景氣」完全由軍事工業造成的，戰爭景氣的確緩和了恐慌深化的趨勢。一九三四年的戰爭景氣必更上升，推測一九三四年以後的恐慌方向，這個戰爭景氣是個主要的原因。一九三四年以後的世界經濟，如果恐慌不至深化，或竟引起市況的上升，戰爭景氣更是吾人檢討的對象。

綜合以上關於一九三四年以後世界經濟動向的展望，吾人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一）最近將來的世界經濟，還不能迎到繁榮，即連蕭條（Depression，一名：不景氣）也未必能到來，戰爭景氣倒是可靠；（二）資本主義各國為排脫恐慌的圍困必更加推進他們認為有效的政策，更高級的通貨膨脹政策，更急進的傾銷政策，更周到的關稅政策，更擴大更堅固的統制經濟政策。（三）這種經濟動向又在政治上表現為各國法西斯運動的

邁進。

我們的中國在這部落克經濟的形成急進過程中，恐怕要漸次分裂而解體到各帝國主義統制下的部落克裡頭去。這是檢討世界經濟的中國人，最後應該深刻覺察及考慮的事情！

然而，在世界經濟恐慌越發深化的過程中，蘇聯的經濟發展，卻依然要發揮他那「孤島繁榮」的本質。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二年度的一九三四年，將必照例在其年底，用數目字來向世界證明本年度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功。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

原載一九三四年六月《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一號

計劃經濟之理論的檢討

自從蘇聯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而得到顯著的成績以來，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竟然成了一種流行病，在世界各國蔓延起來。尤其自從一九三一年「世界計劃經濟會議」上，蘇聯代表奧辛斯基詳細介紹蘇聯五年計劃的進行經過及切實成績以來，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傳染病菌，更加普及了幾乎所有的國家。現在，無論是主要的工業國家，或經濟落後的國家；無論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或是殖民地性的國家，大多已經實施，或將實施所謂統制經濟，也就是計劃經濟。德意英法美日皆有統制經濟的機關和法案，即如我們中國也已設立了全國經濟委員會，企圖施行種種的統制。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意義之重大，可以想見。近來我國討論或介紹統制經濟的論文，有時也在雜誌及報章上見著。即如專著也有一、二種，例如拙作《統制經濟的基礎知識》。但關於統制經濟的本質如何？它是否適用於任何國家？乃至它的實施上需要那些前提條件？等等問題，則未見有詳細而且正確地談到的論文。所以寫成這篇論文，以貢獻國內關心本問題的同好。

一、計劃經濟的概念

凡要理解一種學問或問題，第一步必須先把握住它的概念。所以在未講述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以前，有先就其正確的概念分析，解說清楚的必要。但是「計劃經濟」的概念，極其含混，各派有各派不同的說法，迄今尚無確定的定義。除了計劃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名詞「統制經濟」，時常在各種書籍，報章及雜誌上露面。究竟「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是不是同一內容的形態？抑或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範疇。這層更使所謂「計

「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的概念混亂不明；同時，也更增加明確解釋這個概念的必要性。關於「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概念，有些人以為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是有區別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範疇。若根據這一派人的解釋，簡單地說來，則所謂計劃經濟也者，是在國民經濟上作成整個計劃以進行經濟活動的辦法；而統制經濟云云，不過是在國民經濟上加以統制罷了。然而理論和事實皆證明這種說法的不正確。欲行統制，須先計劃；欲行計劃，須加以統制。計劃和統制是相輔為用的，是一種東西的兩個面。並且，事實上尚無一個國家不計劃而能行統制，或單做計劃而不行統制的。

又有一部分人認為計劃經濟是蘇聯施行的經濟政策，而統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各國施行的經濟政策。但是這種說法也是不妥當的，可以從兩方面指出這種說法的不妥。第一，這兩種經濟政策在其實施方法上並無大差，自各方面經濟的計劃開始以至實行統制，二者都是一致的。第二，即在資本主義各國，也常用計劃經濟的名詞。照我個人的意思，這兩種政策的區別，不在於名詞上或實施的方法上，而是在於立場和目的上。若從這意義來區別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則只能得到「社會主義型的計劃經濟」及「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兩種。但這適足以證明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是同一形態，這種形態因為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可以分成兩大類別罷了。

還有一部分人認為「科學的管理法」就是計劃經濟，這更錯誤。因為所謂科學的管理法只適用於一個企業單位的範圍內，而計劃經濟卻是適用於國民經濟的全體上。從未見過科學的管理法和計劃經濟，本質上密合的事例。科學的管理法，若無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條件，出了一個企業單位的範圍外，就沒有法子實行下去。

然則計劃經濟的真正概念如何？以下略述我的定義。「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生存形態，是生產階級支持下的國

家權利伸張到經濟上，做成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且依照計劃以實行統制的一種經濟形態。換言之，國家在國民經濟的各方面，例如在生產、交換、分配及消費等方面，又如在工業、商業、運輸業，乃至金融業等方面，做成有系統的、全面的計劃，而加以全面的、聯繫的統制，這種經營形態就是計劃經濟。根據上述的定義，可得兩種特質：

(一) 計劃經濟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統制的經濟，正和以前的自由放任的、無政府的經濟完全相反；

(二) 計劃經濟是整個國家的經濟，是全部國民的經濟，正和以前個人的、私人的經濟不同。

具備上述特質的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從理論和實際上說，只有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始能夠適用。換言之，只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始能夠適用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此項，請參閱本緒論第四節〈計劃經濟的前提條件〉!)，但是近年來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者竟有主張實施計劃經濟以克服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即所謂「資本主義計劃化」的；並且資本主義各國的政府，居然也仿效蘇聯大規模地實施什麼什麼計劃，什麼什麼統制。因此，我把這種經濟計劃，或經濟統制，也包括在本書上一併加以檢討，進行比較的研究。但是所謂「資本主義計劃化」的計劃經濟，另外稱它作「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以與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型的計劃經濟」相區別。

二、計劃經濟產生的動因

計劃經濟是現階段上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形態，它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由其先的經濟形態演進下來的。所以，計劃經濟有它產生的許多動因，茲列舉分述如下：

(一)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缺點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本來即有許多矛盾，致使資本主義經濟不能夠順適地平衡地發展。在這些矛盾當中，和計劃經濟的產生有密切關係並且是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所有。詳細地說來，商品經濟的生產是互相依賴的，生產品通常是體現參與生產的全體系的人類勞動，同時，各個生產者互為他人的消費而勞動，互相關聯著。但是依照這種社會的分業而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卻歸各個人所私有，一任私人的意志去處理，本質上應該是社會的勞動，卻採取私的勞動形態表現出來。由於這個矛盾而促成生產及消費上的無政府、無組織、無計劃的經濟活動，產生了生產和消費不調和的結果，而經濟恐慌時常發作。這個矛盾的發展終於產生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及相應的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現在，不但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主張計劃經濟，即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們也都覺察資本主義經濟無計劃的弊害憧憬於計劃經濟。這是計劃經濟所以風靡世界的最大原因。

(二) 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困惱

一九二九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是空前的帶著危機性的恐慌。這次的經濟恐慌不但已經經過了五個年度的長期，它的寬度和深度也都是空前的，一切的經濟部門及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莫不為恐慌所襲擊，生產減少一半，物價跌落一半以上，國際貿易幾乎減退三分之二，失業者增加到五、六千萬人。並且到現在截止，還見不著恢復繁榮的前兆（即所謂蕭條，Depression），普遍資本主義世界的通貨膨脹政策更要招來一個更深入的恐慌，經濟大恐慌只有繼續延長下去。在這帶有危機性的大恐慌困惱中的各國經濟學者、企業家、資本家，乃至政府當局，皆拚命地尋求克服恐慌的方策。許多經濟政策皆被試驗過而無效果；現在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的缺陷，所以企圖改行「計

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計劃經濟究竟在資本主義世界能否行得通，固然是另一問題，而恐慌的困惱之為實施計劃經濟的動因，卻很顯明。

(三) 歐戰中戰時計劃經濟的經驗

在歐洲大戰中各參戰國家，皆為著總動員全國的資源及勞動力起見，對於各自的國民經濟，採取中央集權制度。不但農工業及貿易全歸國家管理，即如分配及消費等事項，各國也設立攤分制度 (Ration System) 實施統制。與軍需有密切關係的各種產業，不論是輕工業或重工業，或食糧工業，其統制辦法尤為嚴密。全國的勞動力不分男女，均以臨時的非常法令，總動員起來，用於作戰或軍需的搬運及再生產上。在這種非常法令強制實行的情形之下，統制經濟政策曾經獲得了相當的效果。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經過這次的經驗，竟然異想天開希冀戰時非常辦法的統制經濟，也可以實施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平常時候。

(四) 產業合理化運動的激蕩

為挽救歐戰後世界經濟全面的衰落，一部分經濟學者及企業家，曾經提倡並實行過一企業內的計劃經濟，即所謂產業合理化運動。這種運動開始於德國，其後各國爭先摹仿。所謂「科學的管理法」，所謂泰拉制度 (Taylor system) 即其代表。科學的管理法應用在一企業單位的範圍內，的確獲得了相當的效果，提高了勞動的生產性，增加了資本家的利潤。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學者、企業家及政治家，遂認為這種科學的管理法也可以擴大而實施於全面的國民經濟上，因而大倡其資本主義的組織化、計劃化的主張。

(五) 蘇聯五年計劃成功的刺激

正當資本主義世界被世界經濟大恐慌困惱著的時候，蘇聯的五年計劃卻逐步地成功，蘇聯的經濟向著上升的方向，以急速的步驟發展了。從一九二九年開始而預定在一九三三年完成的五年計劃，竟然以四年三個月的期間提早完成了。並且，國民經濟的各方面皆有顯著的發展。工業生產額比之五年計劃實行前的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倍以上，比之歐戰前增加到三倍以上。其中，重工業的發展尤為急速，比之一九二八年增加到二倍半，比之歐戰前增加到四倍以上。農業的發展也很可觀。播種面積比之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增加了二，一〇〇萬公畝，工業原料的播種面積超過了預定的計劃。農業耕種上大多採用機器的經營法。尤其可驚的，就是使用飛機播種的事實，在幾秒間播完幾千萬頃田地。再自質的方面看，蘇聯國民經濟已經工業化了，農業人口的比率減低，而非農業人口的比率卻增加了。農工業皆較前社會化了多多。社會化部分的投資額在總投資所占的比率，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五年期間，不過占四一·九%，而在五年計劃實行五年間，增加到八七·五%，又社會化部分的投資總額，五年計劃期間與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至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期間比較，增加到五倍。蘇聯經濟之量和質的如此急速的進步，實出了資本主義擁護者的意料之外，但卻又在反面促使他們堅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偉大的效力。於是他們對於蘇聯的經濟建設完全改變了態度，由冷諷熱刺的態度變成驚嘆謳歌的態度。所以極端擁護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們也都主張，移植蘇聯經濟建設中實行的計劃經濟政策，到資本主義的田園裡。雖說他們所讚賞的只是經營方式，所以他們所移植的也不出經營方式之外。但是無論如何，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在資本主義各國實在掀起很大的波浪，給了莫大的刺激。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仿效蘇聯計劃經濟的甜夢中陶醉著——或者可以說是掙扎著。

(六) 獨占資本的要求

在帝國主義向下期（開始於歐戰前後）的階段上，一方面世界恐慌越發深化，帶上危機性，一般的平均利潤越發降低；另一方面金融獨占資本支持著政府，操縱了政權。結果，獨占資本家為維持他們高度的利潤，或增加更高的利潤率，就不惜以中小資本及勤勞大眾，消費大眾為犧牲，企圖採取更具體的更擴大的經營方式，來達到這種目的。適用於國民經濟全面上的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遂為他們所採用。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不能克服經濟恐慌固然非常顯明，但是可以一時地維持或增高獨占資本的利潤，卻很可靠。所以，獨占資本的要求，成了資本主義各國施行計劃經濟的又一最主要的原因。

(七) 集團經濟的發展

構成最近世界經濟大動向之一的集團經濟的發展，也是促成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實施的一個主因。因為集團經濟和計劃經濟，是相輔為用的。要在龐大的地盤上實行經濟同盟，聯成一個經濟集團，並且要獨占地自給自足地進行經濟活動，那末，就非有周密的、完全的計劃及統制不可。在任何經濟集團內，都包含著帝國主義及殖民地（當然這是就資本主義世界而言），包含工業國家及原料供給地，包含著投資國、商品輸出國及提供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國家。在這樣構成分子及其複雜的經濟集團中，要實行獨占的自給的經濟，自由放任經濟是不能夠發生作用的。於此，計劃經濟正和集團經濟的發展同時，風靡了全世界。

三、計劃經濟運動的發展

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思想很早即已發生，有很悠久的來源。它的最初形態產生於德國的新歷史學派，為該派代表者的瓦格奈（Wagner）及布連達挪（Brentano）所主倡。他們主張用心理的緩和及社會政策去消滅階級鬥爭，所以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又因為主張統制管理的經濟政策，所以一般認其為計劃經濟思想或統制經濟思想的第一來源。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思想上的第二來源，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獨占組織的思想。那時候，世界各國皆發生了種種利用獨占組織如卡特爾或托拉斯等組織去減少資本主義的無計劃性，無政府性，消除由這無計劃性及無政府性產生的弊害如經濟恐慌。

然而上述兩種來源，只是思想上和觀念上的來源，對於實際的經濟界，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尤其是在國家的政策上更無若何的表現。計劃經濟運動到了歐洲大戰，才發生了實際的社會的意義。因此，我認為歐洲大戰期，才是計劃經濟運動真正開始的時期，也可以說是計劃經濟實際運動的濫觴。自從歐戰以後，計劃經濟運動始有顯明的發展。

實際的計劃經濟運動或統制經濟運動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一）戰時計劃經濟的試行期；（二）產業合理化運動期；（三）國際的風行時期。

（一）戰時計劃經濟的試行期

歐洲大戰中，計劃經濟的實施普遍於參戰的各國。凡是參戰的國家，都為著長久維持戰爭以得最後的勝利，而實施所謂「國家的總動員計劃」，或稱為「全面的戰時經濟政策」。德英法比俄美意奧等國，都實施這種政策，其中德尤為周密。那時候的戰時計劃經濟的辦法，約可以從四方面來分析：

（A）國民總動員

參戰各國皆制定非常立法，調動全國適當的、健全的國民以補充軍隊，或從事於軍需工業的生產及軍需的搬運，這辦法稱為強制的徵兵制及勞動的統制。例如德國的《祖國補助勤務法》，規定滿十七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男女，全部徵用。其中健康的男女的六五%，送到前線服務，其餘則全部從事於強制的勞動。

(B) 產業總動員

參戰各國皆施行統制政策於各種產業的生產及一般的消費上。在生產方面有所謂「優先制度」首先集中生產於軍需工業上。其次，還有原料統制、價格統制、農業統制，等等辦法。在消費及分配方面，也施行所謂「攤分制度」，依照分發的票據分配糧食。

(C) 交通的總動員

可以分為海運及陸運兩方面的統制。在陸運的統制上，鐵路、汽車、飛機等交通機關，全部收歸國有，或收在國家嚴格管理之下。即如通信機關也都全部置於國家管理之下，全部用於軍事上。在海運的統制上有貿易統制及船舶統制兩種辦法。前者適用於軍需品輸入的統制上，後者則適用於作戰及搬運的兩方面。

(D) 金融及財政的統制

歐戰一爆發，各國的金融界即大起紊亂。證券市場首先大動搖，軍需工業及海運業的股票除外，其他各種股票及債票，皆一落千丈地跌價。各種公司皆繼續關門，各銀行皆爭先收回放款，民間也爭相提取存款。此時，國家乃不得不採取非常辦法，頒布債務延付令，增發銀行券或紙票，並強制通用，維持票據的貼現，維持貸款，管理外國匯兌。另一方面設法集中民間的現金，或加緊強制的擴大再生產，以籌備軍費。

上列各種辦法都是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的實例，綜合地看來，也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全面的統制。不過，因為那時候計劃經濟政策是施行於非常時期，所以認為是試行期。

因為後來的計劃經濟的發展受它的激動甚烈，所以也可以認為是計劃經濟發展的母胎。

(二) 產業合理化運動期

歐洲大戰是一個空前的大破壞。參戰各國，無論是打勝仗或打敗仗，其整個的國民經濟皆陷於極度的疲敝和衰萎的狀態之下。由這種經濟的疲敝，又反映成為政治的動亂和社會的動亂。不但勞動階級的鬥爭激烈化，即連資本家本身也因利潤的降低而朝不保夕。在這種情勢之下，遂產生一、二經濟學者如嘉塞爾(G. Cassel)及開恩斯(Keynes)等人，提倡計劃經濟的理論。再加以歐戰中戰時計劃經濟的經驗，部分的計劃經濟的產業合理化運動，遂由德國(曾經設立所謂「經濟管理局」)而風行於英美日法意等國，幾乎可以說全世界。產業合理化運動，固然很早已發生，例如一九一〇年代美國的泰拉即已提倡過「科學的管理法」；但是產業合理化運動到一九二四年頃才帶上世界經濟的意義，也才略具計劃經濟的形態。產業合理化，因為是在平時實行的，所以雖說在國民經濟上是部分的不聯繫的辦法，但總比較戰時計劃經濟還高一級。產業合理化的方策，應用在各部門的經濟上，有非常紛雜的辦法。但是大別之，可得兩大類：(A)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B)流通過程上的合理化。

茲略述於下：

(A) 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

這種合理化的第一目標就是降低生產費。所應用的方法，就是採用新技術及新機器，改編勞動組織，增加機器運轉的速度以加強勞動強度，造成製品的標準化、定型化，藉以增進生產能率，排除浪費。最顯著的具體方法，就是採用自動作業機以節省勞動，增大勞動的生產性。所謂「轉送制度」(Conveyor System)的採用，改編了舊時的工場組織，使工作單純化而增加勞動的能率到極度，在生產過程上劃一新時代。

(B) 流通過程上的合理化

這種合理化，簡單地說來就是擁有巨大資本的製造業者，為著增高利潤而自己設立並擴大販賣部，縮小商業資本的活動範圍，奪回商業利潤的方法。此外，為避免競爭，維持或提高價格而組織的卡特爾、托拉斯，及新迪嘉等獨占組織，也是同樣方策。流通過程上的獨占組織，又與生產過程上的合理化，有交互的作用。生產過程的合理化促進獨占的形成，獨占的形成又促進生產部門的合理化。全面經濟的合理化，更加發展無已。

產業合理化運動，無論對於勞動階級乃至中小資本有多大的害處，但是對於挽救資本家階級的危機之點卻有很大的作用。它增大了各種企業的利潤，獲得了經營上的利益。歐戰後陷入沒落期的資本主義，遂得呈現一時的安定化的現象。這個安定化的狀況，居然由一九二四年頃繼續到一九二八年。況且，另一方面尚有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應用產業合理化的各種經營方式，進行社會主義型的計劃經濟，增大了蘇聯全國的財富，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這種情形更加引誘資本主義各國深入地埋頭於更具體的，更擴大的產業合理化。產業合理化運動，遂發展而成為轟動全世界的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

(三) 國際的風行時期

這是一個計劃經濟政策風行於全世界的時期。不但社會主義的蘇聯連三接四地實施計劃經濟於其各階段的經濟建設上，即如資本主義各國也都設立了經濟統制的諮詢機關及執行機關，企圖統制整個的國民經濟。

歐戰後，資本主義各國雖然設立了很多名稱不同的經濟會議，但是那時候的經濟會議大多是政府及國會的諮詢機關，而不是執行機關，並沒有在全國的經濟上進行整個的計劃。到了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以後，具體的積極的計劃經濟，始有顯著的發展。這是

受到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經濟大恐慌日益深化，而獨占資本的利潤欲卻越發強烈。另一方面，一九二六年以來單一企業內的產業統制，獲得了顯著的效果，一九二八年以來的蘇聯十五年計劃實行的結果，尤其在世界上誇耀它那偉大的成績。資本主義各國受到這兩方面事實的壓迫和誘惑，而更加需要積極的擴大的計劃經濟。

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遂成了資本主義各國的論題，各國的經濟會議也自那時候起像雨後春筍般增加起來。計劃經濟運動在這時期中，有一個劃時代的國際事實，就是世界計劃經濟會議的召集。這個會議是由「國際產業關係協會」(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發起而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開會的。參加會議的份子，有資本公司、經濟學者、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及各國工會的代表。派代表參加的國家有二十三國之多，代表人數達三百人。世界計劃經濟會議是一九三一年秋召集的，開會期間自八月二三日八月二十九日，只有一星期的短期間。在這短期中，各國代表皆有熱烈的演講，極力主張計劃經濟的重要性，並且提議許多實施的辦法。他們的理想甚至於提倡在國際施行計劃經濟。但是這種高遠的理想，終被客觀的事實所否決；世界計劃經濟的討論，終於得不到若何的結果。但是世界計劃經濟會議卻在另一方面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收穫，這個收穫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實施計劃經濟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世界計劃經濟會議上，蘇聯的代表奧辛斯基曾把蘇聯五年計劃施行的經過及其成績詳細地介紹出來。奧辛斯基的演說，竟然使其他各國的代表更加感覺計劃經濟的必要和效力，加強了他們對於蘇聯計劃經濟的信仰和模仿的信念。

自從經過世界計劃經濟會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的計劃經濟的實行，更加猛進，更加擴大，計劃經濟居然成了國際的流行病。現在世界上已經設立經濟統制的機關及制定經濟統制法案的國家，已經有十五國之多了，主要的國家有蘇聯、意大利、德國、英國、美國、法國及日本。此外，如捷克斯拉夫、葡萄牙、西班牙、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

夫、墨西哥，乃至殖民地性的中國，也莫不有同樣的計劃和企圖。其中最積極的最大規模的國家，除社會主義蘇聯而外，就是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和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在許多經濟統制機關及統制法案中，最著名的有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意大利的協同組合全國委員會、德國的經濟委員會、法國的國民經濟審議會、英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日本的日滿經濟統制法案，及美國的產業復興法案。

四、計劃經濟實施的前提條件

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雖然以一九三一年的世界計劃經濟會議為劃分期而風靡了全世界，但是這種情勢並不能夠證明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在任何經濟條件或經濟組織之下都可以通行無礙。雖說科學的管理法曾經在一個企業單位內有效地圓滿地施行過，同時，計劃經濟也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實行過，並且得到更偉大的成績。但是出了私人的個人的企業單位的範圍外，科學的管理法是否還行得通，在不具備社會主義經濟條件的地方，計劃經濟是否還能夠施行得有效？這是一個更重大的問題。在我看來，對於這個問題，毋寧給與一個否定的答案。嚴格地說來，計劃經濟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經營方式，離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就行不通；行得通真正意義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了。因此，希冀一方面保存資本主義的制度，另一方面施行計劃經濟，那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幻想，就是獨占資本家的欺騙。要而言之，計劃經濟實施，是有很嚴格的前提條件的；不具備與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相應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是此路不通的。

根據蘇聯出席阿姆斯特丹世界計劃經濟會議的代表，奧辛斯基的報告，要實施計劃經濟於一國的國民經濟上，必須具備下列八種條件：

(1) 勞動者的獨裁；

- (2) 一切的生產手段及分配機關社會化；
- (3) 廢除階級；
- (4) 急快提高勞動階級的經濟的、文化的地位及生活標準；
- (5) 產業指導的集中及與此並行的生產集中和專門化；
- (6) 消除都市與農村間的矛盾；
- (7) 消除民族的不平等；
- (8) 發展一切領域內的文化活動，尤其是科學的調查事業。

即令離開奧辛斯基的意見，單就一般的情形看來，計劃經濟要能施行得有效，解決了目前社會經濟上的許多矛盾和問題，至少也要具備下列三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參加計劃經濟活動的人們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都要一律平等。

計劃經濟原來就是一種集團的經營事業，須由集團的意志發動而完成集團的利益。但在集團的意志和利益的反面，還有私人的個人的意志和利益。在通常的情形之下，這兩種意志和利益是不容易調和一致的。要這兩種意志和利益調和一致，必須每個團員的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一律平等，並且互相聯繫著。私人的意志及利益與團體的意志及利益調和一致之後，集團的精神才能夠變成堅固的、整個的，並且是統一的、積極的、主動的。必須如此，然後一切的問題才能夠圓滿地解決。倘若各個國民或各個團員，因為社會條件及經濟條件的不平等而致各有不同的立場和利害關係，那末，每個人的意志就不會一致，集團的精神無從鞏固，集團事業的計劃經濟如何能行得通呢？即令在意志及利害關係不同的各個人或各階級之間折衷找出妥協點，勉強在整個國民經濟上施行種種計劃或種種統制，但這不是全體一致的、主動的、積極的辦法，而只是消極的，受動的

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計劃經濟的施行，既不能獲得根本的效力，也不能夠維持長久。

「第二個原則」：經濟計劃的實行者與計劃的指導者，要同一人格。

在計劃經濟的施行上最要緊的動力就是直接生產者的切實地實行。如果直接生產者不切實地實行，無論有多麼理想的計劃，結果也只有失敗之一途。要直接生產者切實地實行，須有兩種條件：其一，一切計劃須出自直接生產者的意志；其二，一切的計劃須由直接生產者參加大部分的意見。廣大的國民經濟計劃，絕對不是少數人的統制就可以達到目的的；少數人的統制辦法違背了大多數的直接生產者的意見的時候，一切理想的經濟計劃皆成了幻想。同時，要廣泛的複雜的國民經濟計劃化，必須有完全的精密的計劃底案。這種計劃底案，又絕對不是生產過程外的人們所能編製成功的。不但要直接參加生產的人們提供詳細的精確的材料，並且需要他們參加大部分的意見。這是計劃經濟實行上一個不可缺少的要件。因為每個生產者實行他自己積極地精密地創造出來的計劃案，必定堅決、積極，而且順適。所以，蘇聯經濟的各部門的計劃，都是經由直接生產者的勞工及農民審查過、補充過、修正過，然後始成為最後的決定的計劃底案。但要作到這一層，必須要計劃的實行者與計劃的指導者，是同一人格。

「第三個原則」：直接生產者必須是一切生產機關的主人。

這個原則含有兩重的意義：（一）直接生產者擁有一切生產機關的所有權及使用權，（二）同時，生產出來的生產物也歸他們所有，或享受。這是計劃經濟實行上最重要的前提條件，而又是計劃經濟的最終目的。如果一切的、至少也要決定部分的生產機關的所有權，不為直接生產者所擁有，那末，直接生產者必不能夠任意地自由地為社會全體而從事於生產。沒有使用權，更不消說了。同時，如果使用最進步的機器及最新的動力，提高了勞動生產性的結果，產生了許多的，或更多的無衣無食無工作的失業者——由直接參加生產的人群裡擠出的失業者，那末，計劃經濟必行不通，也沒有它的必要。又，

如果提高勞動的生產性，增加生產量的結果，依然要毀棄生產物的大部分，正如巴西之棄咖啡於海，美國以小麥及棉花當燃料，為維持馬鈴薯的販賣價格而不得不敷設鐵路運至海中棄掉，澳洲剪毛的綿羊竟宰以吃肉，古巴製糖原料的甘蔗用作柴火燒用；那末，計劃經濟不但行不通，並且絕對沒有必要。因為真正計劃經濟的實行，必定提高生產率而激增生產量。若增加出來的生產量，還須花費人工和金錢毀棄它，或用在無益的方面，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因此，因為實行計劃經濟而增加勞動生產性，增加生產物的分量的結果，必須能夠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生活標準，至少也要歸他們享受始可。

此外，固然還需要政權的統一，統計材料的完全而正確（沒有這兩種條件，則整個的複雜的國民經濟計劃無從著手），及官吏清廉（沒有這種條件，則在計劃進行上容易發生中飽的流弊）等等條件，但這些都是次要的條件。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條件，還是上列三種原則。要而言之，生產者、所有者，及計劃者的統一，或聯成一氣，則其經營經濟就變成計劃經濟。

五、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

根據上節所述，計劃經濟不是可以無條件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可以適用的。如果社會經濟上缺欠必要的前提條件，則計劃經濟必行不通，也沒有行它的必要。這裡，重新展開了一個新問題，就是經濟制度與計劃經濟的關係的問題，也就是說：計劃經濟究竟在那一種經濟制度之下始能行得通。

若嚴格地說來，只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才適用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因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才具備上節所述各種條件。根本的關鍵即在於生產和消費之「社會化」。因此，若照原來的意義說來，「計劃經濟」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經營方式」。

至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根本上就不適合計劃經濟的施行，雖說計劃經濟近年來居然風行於資本主義世界。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質使然的。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不能適合於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從理論上及實際上列出幾種原因：

(一) 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的社會

在階級社會裡頭，上節所述各種條件皆不能具備。第一，一切的生產機關不為直接生產者所有，生產出來的生產物自然也不能歸他們享受。第二，參加經濟活動的人們，無論在經濟上抑在社會上，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若就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具體地說來，那末，一切的或主要的生產機關，皆為資本家階級所獨占；他們僱傭勞工以從事於生產，所以生產出來的成果也完全歸資本家階級全權處理。資本家和勞工的社會條件及經濟條件，都是不平等、不一律的。在這種社會裡，即令折衷而勉強實施計劃經濟，其計劃實行者和計劃指導者，必定是兩種社會地位完全不同的人；指導計劃的人，必定是支配全國政治經濟大權的獨占資本家階級，而實行計劃的人，必定是勞工和農民等。

(二) 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無政府性

資本主義制度上有許多本質上的缺陷和矛盾。其中，與計劃經濟行不通的問題有特別密切關係的，就是生產和消費的無政府性，這是從生產手段的私有和利潤的追求產生出來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擁有生產手段的人們，是全為著利潤的獲得而進行生產的。在這種社會裡，若為顧全社會全體的利益而實行計劃經濟，取消或限制利潤——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現在姑且假定為可行——則改良生產設備及增進生產力的刺激減少，而產業資本勢必退出產業界，甚而至流出國外，於是整個國民經濟更加大起混亂，更加衰頹無疑。所謂計劃經濟如何能行得通呢？

(三) 政治經濟大權為少數獨占資本家所操縱

現在，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主要的決定的政治經濟大權，皆為少數擁有支配的生產手段的獨占金融資本家所支配、所操縱。例如美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大權，完全為四十個大資本家所支配，又如日本現在的政治經濟大權，也為三井及三菱等少數財閥所操縱。其結果，指揮計劃經濟的最高經濟會議，或實施計劃經濟法案的執行機關，自然也必歸他們支配和操縱。他們專為增高或維持他們的利潤而實行計劃經濟。若此，則計劃經濟失掉它本來的意義。不如此，則計劃經濟又無從實行。社會民主主義者希冀由資本主義的組織化計劃化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階段，根本就是一種幻想！

(四) 資本主義型的計劃經濟只能助長獨占

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化，實質上只是獨占組織的更高度的發展罷了。現在，成立於資本主義各國的所謂「組織的產業」及「聯合公司」等等組織，本質上不過是大托拉斯的組織罷了。大托拉斯組織愈發達，愈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化。因為大獨占組織愈發展，企業愈發集中，則各企業單位之間的對立和鬥爭，必更擴大而尖銳化。因為大資本之間的鬥爭，比之較小資本之間的鬥爭，要格外激烈，而且這些大資本絕對不能夠發展到單一體的組織。再自另一方面看，獨占資本更加發展的結果，中小資本家必至全部沒落，一般的生產者也愈發不幸福。終局，非至影響計劃經濟行不通不止。

如上所述，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絕對行不通的；即令折衷強制地行下去，結果也必失去本來意義的計劃經濟的效用，而成了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更擴大的辦法。這是很顯明的事實。

然而，這裡殘留下來一個問題，計劃經濟在沒有完全資本主義化的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例如中國）裡，能不能行得通。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計劃經濟在殖民地性的國家實行的難關，比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更多。除開資本主義國家所遇著的上述根本難關之外，還有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殖民地性國家的經濟計劃機關及執行機關，必定全部操縱於帝國主義手裡，例如滿洲統制經濟案操縱於日本帝國主義手裡，或操縱於諸帝國主義手裡。例如中國的所謂「中外技術合作」是中國統制經濟實施的先聲，中國的全國經濟委員會事實上是在國聯和美國的支配指揮之下進行一切的統制的。殖民地的計劃經濟實現，則其殖民地的經濟更加成了其所謂母國的附庸，例如去年以來急速發展著的大英帝國統制經濟的體系之下的殖民地（如印度等）及自治領（如加拿大、澳洲聯邦等），這是很顯明的事例。即如殖民地性的國家，如果實現了計劃經濟，那末，這個國家實質上就完全殖民地化了。例如現在已經在積極猛進中的所謂「日滿統制經濟」及日本帝國主義正在陰謀企圖中的所謂「中日滿經濟同盟」，如果具體地實現，那末，中國東四省成了完全殖民地化的地方，是不消說的，即華北各省也將全部淪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像中國這樣殖民地性的國家，要實施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自非格外謹慎不可。當這中國統制經濟的聲浪震撼了全國的際會，附述幾句，諒也不為無意義。

要而言之，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如果要實施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必須先完成，或同時進行兩種主要的前提條件：（一）排除帝國主義的支配和統治；（二）改造社會經濟的組織。換一句話說，殖民地或殖民地性的國家的真正意義的計劃經濟，只有在排除帝國主義的統治的前提條件之下，並且在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之下，才能行得通。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抗戰以來日本問題書籍總評

一、日本問題著作界的貧乏

我們對日的抗戰已經不是一種平常的戰爭；而是一種和日本帝國主義者拚個你死我活的戰爭了。這正如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亘的朋友所言：這次的戰爭應當是總結算東亞過去歷史的最後的戰爭（見武漢十二團體歡迎鹿地夫婦大會上鹿地亘所引用的談話）。這次的戰爭能否把東亞過去的歷史總結算一下，完全要看我們能否把瘋狂侵略者的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困難，問題只在於我們是不是看穿了它這個紙老虎，真正把握住它的弱點和危機，更進一步而利用它那滿身瘡癍的危機。我常是強調這樣一種主張：敵人並不厲害，只是我們太厲害了；敵人並不可怕，只是我們太怯弱罷了；敵人的內部並不是不分崩離裂，只是我們仍有不甚堅強團結的弱點為敵人所暗算罷了。總括一句話，我們取勝的關鍵只在於正確認識敵人和適當利用敵人的弱點；以積弱的國家抵抗乍強的國家，也只有巧妙運用這種辦法。

利用敵人的弱點先自研究敵情認識敵人開始。但自抗戰發動以來，這種工作實在是最被忽略的一種。政府及軍事機關固然也有特設的機關及部門，專作敵情的研究，但還未充分發揮，卻又無可諱言。例如全民抗戰時期官民合作及軍民合作是一種最理想的方法，但是研究敵情及認識敵人的工作，則和其他的工作一樣，沒有採用這種合理的方式，直至最近還在拒絕這種方式的採用。再就這種工作的成果的運用看，政府或附屬於政府的機關，始終沒有把所認識的敵人的真面目宣布給一般的民眾知道。致使民眾的腦海裡依然印象著戰前的日本，懷著「恐日病」，好一點的，對於敵人的情形絲毫不知，結果

對於抗日戰爭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機械式的無意識的行動。研究敵情認識敵人最重要的任務，是使一般民眾普遍地浸透於這種工作的成果中，使個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把握敵人的弱點和必然崩潰的危機而堅強最後勝利的信心；並且能夠全體性地有機地利用敵人的弱點。

再看民間研究敵情認識敵人的工作做得怎麼樣，特別是將此種工作的成果提供一般國民的工作做得怎麼樣。這種工作主要的表現，在於出版的書籍定期刊物上；我們只要就全面抗戰發動以來的出版界略加檢點，則可以看出研究敵情，認識敵人，傳布敵國弱點的工作，做得多不充分，就是「文化人」也未免太忽略了這種重要的工作！固然其中的原因相當的複雜，例如有心研究的人阻於生活問題，有研究的成果而卻找不到適當的出版場所等等。根據本刊的調查，自去年八·一三至今年四月一日，新出版的書籍大小不下二百種，但是專門談論日本問題的卻沒有一種，只有三種在談論抗戰問題中稍稍提到日本的一些材料。固然本刊的調查也有遺漏的，例如拙著《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中山文化教育館去年十月版收於《抗戰叢刊》中），可以說是專剖述日本問題的一本書籍。此外，還有一本題為《日本是什麼東西》的小冊子，作者是一個人種學者，以人種學者而談論日本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於資源等問題，自然也有它獨到的地方，或不妥當的地方，但也被本刊的調查所忽略了。再精細調查一下或者還有可以舉出些日本問題的書籍，但充其量，抗戰以來討論日本問題的書籍，還是這樣寥寥無幾，我們文化人對於抗戰所有的力量，實在太不夠。

這種缺陷直至四月以後始略有彌補。四月間出現於武漢市面的日本問題書籍，驟然增加到十二種之多，五月又出現了二種（皆據本刊《抗戰新刊目錄》）。這固然是第二期抗戰要求的結果，但是這還不能算是可以滿意的現象，在十幾種新刊的日本問題書籍當中，還參雜著不少莫名其妙的東西在焉。例如《反戰運動在日本》一書，內容和名稱完全不相符，書店雖然抬出陶希聖先生為領銜作者（本刊調查為陶希聖，當為手民之

誤)，但恐陶先生本人未必知有此事。此外還有一些不相干的小冊子，簡直值得介紹。

二、幾本主要書籍批評

象，則有如下表：

若就抗戰以來出版的幾本主要的日本問題書籍列舉於下，以為介紹和批評的主要對

序號	書名	作者	書店
一	《日本論》	哈耶瑪	光明書局
二	《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	趙洵等譯	上海雜誌公司
三	《日本戰時工業的危機》	宋斐如	中山文化教育館
四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	宋斐如	上海雜誌公司
五	《日本人民反戰運動》	宋斐如	生活書店
六	《日本國內的革命怒潮》	王紀元等	戰時出版社
七	《日本的戰時體制》	鄭森禹	光明書店
八	《日本國防力的剖視》	一氓	今日出版社
九	《日本經濟能否持久作戰》	鄭森禹	生活書店
十	《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	柳仁	上海雜誌公司
十一	《日本的陸海空軍》	包剛	同上
十二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	宋斐如	戰時讀物編譯社
十三	《被包圍的日本》	楊寶琛	同上
十四	《敵兵陣中日記》	田漢等	離騷出版社
十五	《日寇開發華北的陰謀》	劉仁	黎明書店

抗戰一年來出版的日本問題的主要書籍，充其量只能馬馬虎虎地舉出上列十五種，實在有點貧乏，這些貧乏的書籍自然還有不完全的地方，茲逐本加以分析。

第一種《日本論》是一般的性質，它是仿效 Popov 《日本論》的作風，它的篇幅雖然沒有 Popov 的作品多，但是它的觀點卻比 Popov 還正確些。這一點可以說是蘇聯近年來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觀點的進步。它的特點之一，是增設《日本歷史概況》一章，簡單明瞭地剖述日本的歷史發展，固然沒有早川二郎的《日本歷史讀本》的詳盡和新穎，但尚能將要點說出，頗有佐野學當年之筆風。其特點之二，是分析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沒有再犯日本「勞農派」的毛病，在第二章《歷史概況》的「明治維新」以後的部分，估量日本資本主義的封建性，並且特別在第三章《日本的經濟狀況》下設《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一節，更加明確地闡明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兩種特質，軍事性和封建性。這一點充分矯正了 Popov 以前所犯的錯誤。其特點之三，是在第四章的《國家機構和政治運動》章下，特別提出資產階級地主集團，君主的作用，反動的軍事警察網，及日本的法西斯主義等節，闡明日本國家機構在經濟條件——生產樣式——決定下殘存的封建特質及其最近高一層的發展。這一點也是他比 Popov 進步的。總之，這本書的內容差不多可以說溶化了七、八年來風靡日本全國的權威著作，《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的論點；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及小林良正等人的主張，不但改正了本國勞農派及布爾喬亞學者的錯誤，並也影響到蘇聯的日本問題研究界。「講座派」（因刊行《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而得名）的第一個指導者，山田盛太郎，現在，聽說因為日本法西政府的嚴厲壓迫而轉向了，但其學說卻已永垂不朽，自己「刻板枯燥」的作品，現在已經再生產成了流暢通俗的作品，並且在蘇聯的日本問題研究界獲得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結果。

這本書大體上雖是進步的，但尚有一、二點沒有說到，或說得不充分的地方。其一，是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特殊過程，它和其他的先進資本主義各國，不但截然不同，並且是顛倒的程序。先進資本主義各國近代產業的發展，是一般的和平工業部門對於特

殊的軍事工業部門占領導的地位，而在日本則顛倒過來，前者的生產和發展倒反依存於後者。先進帝國主義對外的進出是商品在先，軍隊和政權繼之，日本則軍隊在先而政權繼之，最後商品始隨之而來。其占領台灣、朝鮮，以至東三省，都是依著這樣的程序。這當然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後進性決定的，但這幾點對於認識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把握住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就無法理解現在經濟組織的特質，也就無以理解其國家機構及社會組織的正體。但是這一點，哈耶瑪氏卻沒有設專項加以說明。其缺點之二，就是分析日本社會的生活還不夠深刻。例如他說明封建時代的階級構成，只列了四個階級：「軍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原書四十四頁），但是他卻忘記了日本還有一種處於更黑暗的「人間地獄」中的所謂「穢多非人」。他們在日本社會上構成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在封建身分的壓迫之下必須赤足，不許穿木屐，鞋靴更不消說。一般社會不許他們進入普通的人家，他們所住的房屋及所耕土地，也以「不潔」的理由而被免了貢稅。他們雖在明治四年被取消了這種不潔的名稱，但其生活的慘苦卻無減於以前。日本資本主義變革的結果，倒反把農民和工商業者一部分，實質上編進了「穢多非人」的隊伍去。所以敘述日本社會生活的黑暗，不能忽略了「穢多非人」的生活和最近的演變。這一點是哈耶瑪不及 Sogalov 及「講座派」有些作家描刻之深入。總之，〈日本論〉可以說是抗戰以來最好的一本日本問題書籍。

第二種的〈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也是抗戰中的一本日本問題的佳作。關於日本經濟的書籍，還有兩種可以一同舉出來講的。其一是第九種的〈日本經濟能否持久作戰〉，其二是〈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這三種書各有各的特長，其說明的方法和方面，也各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結論卻大致相同，可以歸結到四點：（一）日本經濟力量非常薄弱，工業構成，還非常低，（二）日本商品大部分依存於外國的市場，特別是和平營壘家的英美法蘇荷等國。（三）日本的主要資源大部分依賴外國來供給，不獨軍需資源

如此，即一般的和平工業的原料也莫不如此；（四）因此，只要各國對日實施經濟制裁，即可以制日本侵略者的死命，阻止其侵略的行為。《日本經濟與經濟制裁》一書，特別著重於日本經濟對外的發展及其矛盾，以為各國經濟制裁的前提，是非常正確而後一部的材料也較新鮮。但這本書是獨立的兩部分合拼成功的，所以難免有點不銜接。《日本經濟能否持久》的特色著重於支持戰爭的能力的分析；《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的內容雖只限於剖述工業部門，但卻道破了日本經濟最重要而又最為脆弱的部分，其特點在於由工業的基本構成談到工業危機的具體條件，更談到工人惡劣生活的影響。這本書已由國防宣傳委員會譯成英文向各國宣傳，但有一個缺點即去年十月以後的材料尚未補入，所以作者又應國際宣傳委員會時要求，續補一章，中文載於《中蘇文化》二卷二期，讀者可以參考。

關於政治的主要新刊，就是上列第七種的《日本的戰時體制》及第十種的《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前者說明開戰後日本政制的演變，由企劃廳的改革，說到參議制之新設，直至大本營的成立，都是以動因分析的，是相當的佳作，惟最近近衛內閣的改造，則須倚靠最近的雜誌的論文來補續，其主要的有《中蘇文化》二卷二期及《時事月報》最近期的拙作，有《世界知識》思慕兄之作及各報有關的社評。《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顧名思義應該是說明軍部與法西斯蒂的關係，但是本書之解說是獨立的不關連的——雖說它解說日本政治機構、民間法西斯，乃至最近日本政治的法西化，有相當正確的地方。希望出版界能出刊一本《日本軍事法西斯》來補滿這個缺陷。我曾經在《世界知識》上登載過一篇《日本軍事法西斯論》，但仍嫌言焉不詳，且準備好的事實和資料均因限於字數未用上。

我們全面抗戰以來，日寇最嚴重的一種問題，就是社會的動蕩及其危機的深化，關於這方面的書籍有上列第三、四、五的三本書。《日本國內革命的怒潮》雖是幾篇獨立

的文章集成的，但是材料還算豐富，各文的論點大體上也還正確，這自然和標明陶希聖等著的《反戰運動在日本》的編製自然不同。拙作《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以具體的材料敘述了前年以來日本工農聯合戰線的形成及其發展；《日本人民反戰運動》說明開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左傾各派工農及一般人民、士兵及殖民地民眾等方面的反侵略戰爭的理論與鬥爭，這兩本書正好是姊妹篇，且有不少的特殊材料，特別是前者可以說是很好的文獻。

《日本的陸海空軍》，估計日本作戰的軍力；《日本國防的刻視》更加廣泛地討論日本國防上的各種問題，二者又有密切的關係，後者可以補前者之不足。又《被包圍的日本》，是自日本國內外的情勢說明日本孤立的危殆，它固然也可以補足上面二書一些，目錄也都很新鮮，但終嫌其編排與採擇太無標準，太紊亂，結果全書失掉了重心，例如前面談國際的包圍，後面則談國內的社會危機。又如《拆穿日本紙老虎》的章下更加紊亂了。這種情形是近來我國出版界只顧贏利而胡亂編輯小冊子的一種特殊風氣的表現。這本小冊子材料固然不壞，能夠淨清一下就好了。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是我根據東北協會的特殊資材編著的，詳述日本野獸怎樣壓榨、虐待、慘殺東北的同胞。但是開戰以來日寇對我的殘暴更千百倍於以前，出版界也應該努力出版一本具體刻畫日寇殘暴的著作。《日寇開發華北的陰謀》敘述日本侵略者繼強力占領之後設法開發華北資源及侵營各方經濟，是很自然的趨勢。不過，我們不但要揭穿他的陰謀，還要設法破壞這種陰謀才好，《敵兵陣中日記》，是以俘獲的文件擇譯出來的，內容很多「厭戰」和「恐華」的記載，這不但是可寶貴的資料，並且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品；如其內容能更節略些，更扼要些，其吸引力必更大，其事實宣傳的效力也必更大。

三、以後的希望

總觀以上所介紹的，除了由俄文翻譯的第一及第二兩種較厚的著作外，抗戰以來所出版的日本問題書籍，儘是小冊子，並且非常零亂沒有系統化。即連一部日本問題小叢刊也都沒有看見過。黎明書店曾經計劃出版這類叢書，共十幾種之多，要我代為主編，但辦法訂定後即受到時局的阻礙未得實現。其他的書局也都沒有這樣的要求和計劃，但是抗戰的新階段要求著作界深入的著作，有系統的專門的刊物。像〈當日本作戰的時候〉那樣比較深入的中本書，當是此後的讀書及抗戰指導者所歡迎的。同時所談論的範圍，也應寬廣些，這一年來日本問題的討論，新編的書籍或定期刊物的論文，大多集中在經濟問題的剖述，並且只限於當前的經濟問題，未能深入到日本經濟的核心，或自其經濟的發展過程的正確把握來作，根本的認識，像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那樣的書籍，既沒有人著作，也沒有翻譯。又像 Popov 的〈日本經濟之技術的及組織的基礎〉一書，雖是研究日本資源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能夠再參考別種資料，可以寫成一本絕好的關於日本資源的書，但也沒有書店知道出版它。即像凌青的〈中日實力的對比〉一類的著作，抗戰以來也不多见，我希望出版到第五版的這本書的作者，能再來一本（日本實力的新估計）。作戰一年後的日本已經暴露了很多戰前我們所料想不到的弱點，能再來一次新的估計，自屬非常的必要。又如談論日本社會的危機，單單敘述日本人民的厭戰和反戰，在一般沒有深刻瞭解日本的人們，是懷著半信半疑的。我們應該更深入地刻畫日本社會生活的黑暗實狀，至於政治經濟上找出根本的原因來。但是描寫日本社會生活黑暗面的書，不但抗戰中沒有出版過，就是以前也沒有出版，我國出版界最缺乏的，就日本社會組織及人民生活狀況之類的書。平野義太郎的〈日本社會機構〉是值得介紹的一本。再如日本社會思想及淺薄的文化，也沒有人介紹，戶阪潤及玉城肇的幾本著作，

也值得介紹，前者專討論思想文化，後者寫日本的家庭制度。

最使讀者失望而遺憾的，是抗戰以來竟沒有一種定期刊物是專討論日本問題的。誠然日本問題也是國際問題之一部，〈世界知識〉、〈時事月報〉及〈中蘇文化〉也在那裡登載論文。但是事實上日本問題自有獨特的範圍，有它和國際交錯的一面，也有它自己獨立的一面，而這三種刊物的剖述也只顧到一面，甚至於有些零碎不成體系。抗戰前還有一個〈日本評論〉專介紹並批判日本問題，無論如何總算作了一些；但在抗戰後急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今日，倒反沒有一種定期刊物可以有系統地連續地討論日本問題，暴露日本平時所隱蔽的弱點和危機。平時「閑話皇帝」，就要被監禁，戰時自然沒有這種危險，但是深入刻畫日本的勇氣並沒有增加的樣子。抗戰的新階段上，軍政及人民各方面都要求看一種這樣的定期刊物，最好是軍政機關出來創辦，否則贊助文化人來出刊。戰時日本研究會有創刊〈戰時日本〉半月刊的計劃，並且已經付印第一期，希望這一種各方面所需求的定期刊物能夠得到各方面的贊助，共同奮鬥，繼續刊行下去，使認識敵人的正體的常識普遍化，並且經由宣傳工作者深入民間和隊伍去。

原載一九三八年七月〈戰時文化〉第一卷第四期

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我對於這本書除了作篇將近萬言的長序及忠實翻譯外沒有其他功績，所以這裡要批評或介紹的對象，可以說是原著者的作品。我想必須這樣聲明，才能免去「自己介紹」的諷刺罷。這本書本身確實有他不可磨滅的價值，同時也是我讀後感覺有趣並且有益的許多著作中的一種。在它出以問世的前一晚上，我就得到朋友堀江邑一先生的通知，第二日買到手即便費半天的工夫一氣讀完。讀後首先感覺到的是：這本書確實是理解數年來激烈論爭而未得一個結論的一場筆墨官司的索引，同時又是「講座派」幾本有價值但卻相當難懂的著作的導言。讀了這本書，不但可以瞭解「講座派」和「勞農派」的理論及異同，並且可以理解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質的大概。

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認識，的確是一種相當艱難的工作，不但日本各派學者經多年的論爭還沒有得到一個最正確的定論，就是近年來特別注意日本研究的蘇聯著作界，也還常在改變的過程中。博博夫的前後著就是一個證例。對於日本資本主義本質的分析工作，不但「勞農派」的作品散亂，較難給讀者以有系統的觀念；即有系統地在「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中剖述過這個問題並且就其主要的部分再集刊專書，如山田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分析》、平野的《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以及小林的《日本產業論》等書，也因其敘述法的難測和問題本身的複雜性，致使讀者乍一讀過不能容易瞭解問題的本質。日本讀書界對於「講座派」的用辭及寫法的難測加以非難，就是這種事實的表映，當然講座派的著作絕對沒有因為這點而減低了真實的價值。

內田穠吉能以平易通俗的筆法把講座派的幾部分主要著作介紹出來，作為研究日本資本主義本質或讀講座派全部著作的一個導言，對於講座派及其作品的愛讀者是一樁極

有意義的貢獻。我們若打一個譬喻，那末，野呂及山田以下講座派的著作是《資本論》。內田的這本著作就是考茨基的《資本論通論》了。《資本論通論》的價值不可抹煞。那末，這本書也自有它的價值了。這是本書的第一個特點。其次，內田之介紹日本左翼兩派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論爭，不是單純的介紹，而是一種帶有批判眼光的介紹，所以對於兩派的立論皆隨時加以嚴格的批判，並忠實地儘量介紹彼此的批判，但其結果還能使讀者讀後自己覺出那一派的理論較為「近真」，較合於事實，同時還覺出留下了那些沒有理清的問題。這是本書的第二點特色。其他的特點，因為篇幅所限，不能縷述，請參閱拙作《日本問題著作的一般批評》，載《戰時文化》第四期。

不過，本書也有它未作到的一個缺點，就是：本書只集中於經濟組織的方面，而完全忽略了政治制度及社會機構的剖述。所以希望作者再來一個姊妹作，否則依然希望讀者繼續兩派關於這兩方面的著作，必須如此始能窺見日本資本主義的全豹。這本書的申譯本，原早在抗戰前（一九三七年五月間）完成的，但因上海與南京之棄守，遲延了出版，在武漢時並聞打好的紙版已經遺失，曾經一時大感不快，現在竟然出來見讀者了。在還沒有更具體的介紹的今日，我所感到的快慰，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希望研究日本問題的人，多加以注意。

按：《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原著者：內田穰吉，譯者：宋斐如，中山文化教育館編，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原載一九三九年四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各國勞動力統制政策

各國在戰前即已實行「準戰體制」對於各部門經濟及國民生活，實施相當的統制，至戰爭爆發而實施全面的統制政策，自是當然的歸宿。

實行全面的統制的目的，不消說，是在於推行「全面戰爭」，而全面戰爭的最有效力的因素，首推「人的要素」。兵源出自人的要素；物資要能夠發揮其效用，也非有人力為之發動不可。一般之所謂軍事戰、外交戰、經濟戰、思想戰，乃至文化戰等等，沒有一件不是以人為主動力。所以人的質和量的比較，可以決定作戰的勝負。惟其如此，所以各國對於人力常採取相當的統制政策，視此統制政策運用的得失，幾可以測定那個國家作戰能力的強弱。

在人力之運用上，蘇聯可以說最完全，德國亦實行之甚早，英美發動較遲，但卻富有人力的資源。日意兩國則不獨人力資源缺乏，且其運用也不適宜。所以在實際上，蘇聯早已成績卓著，戰爭爆發後尤有奇效；美國以其富裕的人力，尚足應大規模戰爭的需要；德國也以其強制執行，得以彌縫一時；英國雖較緩慢，但也漸漸走上統制的軌道；只有意大利是一般落後；日本則自今年起開始暴露出勞動缺乏搜剝無方的馬腳。茲就各主要參戰國的勞動力統制政策及其實施的效果，略為剖述介紹於下：

一、美國的勞力戰線

(一) 美國勞力資源

美國的自由主義國家時代已成過去，現在處於羅斯福總統領導下的美國，也在加強其戰爭體制，在全國各方面皆採取相當的統制政策，勞動力問題自然也不例外。一面形成美國苦惱中心的失業問題，也與開戰同時得到了解決。美國自開戰後，即以強烈的力量，急速地成功改變了和平產業為軍需產業的計劃，在女權高於男權的美國，女子竟占了產業鬥士的一半以上。她們出現於工場，甚至於組織了娘子軍，其大規模的國民徵用，成了現實的問題。美國擁有豐富的現金與物力，總人口超過一億三千萬以上，十八歲至六十五歲的勞動能力者，達七千一百萬人（男四千二百萬，女二千九百萬），美國擁有如是豐富的人的資源，但仍未忽略人的勞力政策的運用。

美國著手於天文學數字的國防計劃，始於一九四〇年六月，當時因以合理主義促進生產機器化，產生了九百萬的工業失業者；又以大規模農業的發達及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失掉歐洲市場而產生了農村過剩人口二百萬人，合計共有一千一百萬的失業者群。另一方面又有馬上可以動員至產業戰線的二百五十萬的婦女勞動力，美國可說是「人力的倉庫」。但自太平洋大戰爆發，為要完成羅斯福總統所發表龐大的飛機、戰車，及船舶的生產計劃，而人力的需要大為增加。

據美國勞動局的計劃，一九四三年底，美國需要軍需勞動者二千萬，兵力九百萬。這個數字與開戰當時的需要比較，增加需要兵力七百萬，勞動者一千三百萬，合計二千萬。為著填補這個缺數，須徵用一千萬的軍需勞動者，一百八十萬的失業者，一百四十萬的青年，七十萬的農民，及六十萬的自家經營者的轉業。即令此計劃實現，也尚有五百五十萬的不足。為補足此數而終須動用婦女。

（二）婦女勞動會

美國戰時資源委員會會長馬克那特，自去年九月即已強調動員多數婦女於戰時產業，

稱道：「從十八歲至四十四歲的主婦當中，每四人抽一人，或每三人抽一人，使其從事於戰時產業」。因鑒於此種情勢，而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考慮婦女勞動者的訓練及動員諸問題及政策」。

「在實行全面的戰時生產的此際，多數婦女勞動者的參加，無論如何是必要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戰時生產部內的婦女勞動者，約有一百四十萬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躍而增至四百五十萬人，至一九四三年年底，可以增至六百萬人，在全美的勞動者總數之中，婦女可占至百分之三十」。

其次就勞動者的本質考察，則因美國產業一向著重於和平產業，所以軍需產業的熟練勞動者，非常之少，是為軍需擴充計劃的一大障礙。因此，美國急速設立勞動者養成所及訓練所，努力於熟練工人的養成，但因一時趕不上需要而終於不得不採取勞動強化政策。

(三) 放棄八小時勞動制

美國從來的八小時勞動制是法律所規定的，八小時以上的勞動，一般視為罪惡。但是戰時需要，已改變了這種觀念。去年十月六日羅斯福總統即已布告中止民間航空關係的技術家及勞動者的八小時勞動制，現行陸軍部所管轄各工場的勞動者，也已廢止了八小時勞動制。甚至如戰時生產局長捏爾遜，要求全美的軍需工場，作二十四小時的全日生產。此後的勞動強化，將愈徹底。

從來美國的勞動爭議，也是世界有名的事物，一九三七年發生四千七百四十件，其後每年也各有二千五、六百件。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即設「戰時勞工局」，擁有強力權限，以代替以前的「國防調停局」。美國的勞動爭議的減少，遂破前例，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之間，只有七百二十八件。

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即漸採強力的統制政策，強力政治支配了戰時的整個美國。羅斯福總統特於去年九月，向上院提出〈產業總動員計劃案〉，其要點如下：

- 一、賦予大總統以美國產業全體動員的權限；
- 二、大總統根據上述權限，對於美國國民的行動及私有財產，施行近於完全的統制；
- 三、再如各產業組織及設施上的物的資源，也得加以統制。

如此對於美國產業，要求作人的及物的總動員，以期戰時生產的急速進展。去年十月十二日，羅斯福總統又廣播「爐邊談話」，吐露人手不足的實情，而力主強力的勞力政策，其要點如下：

- 一、為補充農場及工場勞動力的不足，而有重新提出徵用政策的必要；
- 二、為著軍需品的增產，必須禁止工場勞動者的移動，禁止各工場相互間爭奪勞動者；
- 三、徵召適齡勞動者離開農場及工場的結果，或須使用男女童工；
- 四、對於各種教育當局，指令學生於學期中或放假期，赴農場或軍需工場勞動；
- 五、有一部分國家不願使用女工與老人，但在現在的美國，已無此偏見的餘裕；
- 六、希望設立徵用所於全國各地，任命四千五百個人員，以從事於人的資源的擴充。

美國人一向擁有很高的實行力，過去一年中政府勞務人員的進度，也比其他各國為

最迅速，婦女之進出產業戰線，也非常顯著。現在已有三百五十萬人的婦女，進出於工業方面，一千四百萬從事於農業生產，且有五百萬人動員於工業的新計劃。在某一軍需工場上，其男女勞務者的比率，是男女各半，最近婦女且已進出於礦山。最近男女學生皆受軍訓，女子畢業於大學或專門學校者，已有數萬人受軍訓，組織了稱為婦女補助隊的女兵。要之，羅斯福總統之為爭取最後勝利而總動人力於軍備的擴充，生產力的增強，其赫赫戰績，已使日本侵略者聞之而生畏了。

二、蘇聯的勞動陣容

蘇聯革命後的一種口號，是「不勞動不得食」，無論個人感情如何，總之是一個沒有失業的國家。蘇聯自一九二八年以來完成了三個五年計劃，總動員全國國民於勞動戰線上，大規模地把和平工業轉變為軍需工業，加強了國防體制，皆是事實。

(一) 轉向軍需產業

就產業部門的勞務考察，則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已把農業集體農場化，而將其過剩的人口，集中於重工業的建議；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因為農村人口大不夠用，終於求勞動力供給源泉於婦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末年，婦女勞動者數，竟占至全體勞動者的百分之四十。

至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農村人口及婦女的動員，達到頂點，欲再期望量的增加，已甚困難，所以又轉而求於加強質的動員，即強化勞動規律，提高生產力，也即斯達哈諾夫運動的展開。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因為蘇德戰爭的爆發，而此種大動員的傾向，更加加強。

在蘇德戰爭爆發的一年前，蘇聯即已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大施改革於勞動制度，其要點如下：

- 一、七小時勞動制為八小時勞動制；
- 二、六小時勞動制，除危險的作業以外，全改為七小時勞動制；
- 三、事務的勞動（官廳及其他的勞動）改六小時勞動為八小時勞動；
- 四、六日周間制，改為七日周間制。

又於蘇德戰爭爆發後，一九四一年六月，對於全國勞動者，課以一日一小時至三小時的定時外的勞動義務。

（二）徵用與強制勞動

蘇聯又於去年二月，頒布了《勞務徵用令》。又於同年四月，對於集體農場的場員，加強義務勞動日數，約為二倍。集體農場場員的義務勞動的最低日數，以前是一九三九年所規定的六十至一百日，現在則改為一百至一百五十日。對於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少年，一年間也強制五十日的義務勞動，對於十四歲至十五歲的男子，及十四歲至四十五歲的女子，頒布了《農業徵用令》。蘇聯因喪失穀倉的烏克蘭，拖曳車及馬匹被徵用於戰爭，中堅勞動者被動員，所以採用這種非常手段，以防糧食的減產。

上述《勞務徵用令》，原規定沒有從事於國營或私營企業的都市住民，十六歲至十五歲的男子，及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女子，徵用於軍需工場或建設工作。但是此項男子，已被調至前線作戰，或被動員至勞動戰線，因而可以徵用的大部分人，只有家庭婦女。加入勞動戰線的蘇聯婦女，至一九三九年已突破一千一百萬人，占全部勞務人員百分之四十一，現在或已占至半數以上。

(三) 婦女的顯著活動

參加勞動部門的婦女，因曾受過三個五年計劃的訓練，所以一旦在有事之秋，馬上可以轉移自如，關於此點，報紙曾有如下的報導：

婦女勞動者，占全部勞務者百分之四十，不獨限於適合婦女勞動的纖維工業，或工藝手工業，始自道路工程以至機車的運轉，所有的生產部門，婦女皆可與男人並肩，就其綜合的勞力考察，是個偉大的力量。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徵用於戰場的預備兵及後備兵的龐大數目，雖然可能給予蘇聯生產力以相當的影響，但至今日尚未見有大的破綻。其最大的原因，即在於平時婦女勞動者的比率甚高，高度技術婦女勞動者為數甚多，因而可能勞動的婦女完成了產業後備軍的作用。

除了這些後方勞動婦人而外，直接予以參加第一線的婦女，為數也屬不少，特別是女軍醫達到相當的數目。但自大體上說，代替男子以維持後方生產，卻是現在課於蘇聯婦女的重大任務。

三、英國的勞力統制

英國現在的勤勞戰線問題，也已相當的深刻，英國一向擁有印度、澳洲、加拿大，及其他屬地殖民地，故有豐富的資源及勞動力。其本國人大半皆從事商業或其他的和平產業，所以不發生勞務問題，也無對策的需要。

(一) 戰後的非常立法

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事態完全一變。開戰初期因為德國勢力一時席捲於波蘭以至法國，英國曾感相當的危機，因而英國政府特於一九四一年五月，為期國防力的增

強而制定了得以徵用人及物，總動員國內資源的《非常時權限法》，及以此為根據的《國家防衛法》。但此兩種非常法律，實際上截至一九四一年，尚未被運用。其原因在於國內尚存有一百五十萬的失業，及戰爭爆發初期因為和平工業停頓而軍備擴充所需要的勞動力，還十分夠用。

(二) 徹底的轉業政策

但是英國的總人口只有四千八百萬，十四歲至六十四歲的可能勞動的人口，更只有三千三百萬。其戰局的擴大及進展，使軍需品的需求，愈益增大，終於要求徹底的勞務對策。

其步驟是：第一步先送失業者於戰時生產部門，戰時的一百五十萬失業業者，至一九四〇年已用去一半，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減至三十萬。

與此運用同時，英國政府又採用了轉業對策，一九三九年制定了《供給限制令》，極力減少種種販賣業及消費的生產工場。一九四一年又實施《生產集中計劃》，集中種種資材及施設於軍需生產部門。英國一向從事於商業、金融業、運輸業、通信事業、印刷業及娛樂等事業上的人數，占職業者人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所以上項計劃，估計可以動員四百五十萬人，轉向軍需工業部門的勞動者，一定達到相當的數目。

(三) 婦女走向工場及兵營

上述可以勞動的英國人口三千三百萬之中，一千一百萬為婦女，英國政府對於這些婦女，自一九四一年三月，即開始登記及徵用，至去年三月登記者已有五百萬人，其中二百五十萬從事於兵役及其國防事務，所餘的二百五十萬從事於軍需產業。去年六月又有十六歲至四十一歲的婦女七百萬人登記，同月截止的婦女勞動者達五百五十萬，比之

戰前，增加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之譜。

英國與勞務動員同時施行軍務動員，一九四一年，頒布過《國民役務法》，規定軍務以外的國防服役。同年十二月，又實施《國家總動員法》，擴大兵役義務年齡為十八歲至五十歲。又對於二十至三十歲的未婚婦人六十二萬人，強制加入婦女補助國防團、婦女補助空軍團、婦女海軍服務團，與男子為伍而作勇敢的勞動。

英國勞動大臣曾經發表談話如下：「在十四歲至六十四歲的男女合計三千三百萬人之中，已有二千二百萬人從事於軍務及產業。

於此可知英國的勞動者已動員至相當限度，所以去年六月遂又登記十六歲至十八歲的青年女子。」

英國內相毛里遜也稱：「就人口每一人的生產力言，英國決優於世界各國」。此言並非誇大，英國現在已完全確立勞動力動員體制，其生產額已達戰前的二十倍。英國全體國民，皆已樂受戰爭的犧牲，為完成反侵略戰爭，爭取真正世界和平而獻身於生產戰。

尤可感動的，就是英國婦女。他們守著大後方，充當車站的夫役及賣票員，不消說，即電犁或軍需工場的粗污工作，他們也都擔負。英國對於婦女的強制徵用，已由未婚婦女，擴展至有子女的婦人，甚而及於兵役的徵用。於是出現了滿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娘子軍，現在從事於高射炮隊的觀測班。此點，若與東方的情形比較以觀，實有隔世之感。

四、德國的勞力搜刮政策

(一) 勞力搜刮的開始

軸心國家原自稱為「無」的國家，故其物力及人力皆極有限，以有限的人力而作無

限制的侵略戰爭，其將如何搜刮其人力源泉，不言而喻。德國為軸心的首魁，且先考察其搜刮人力的政策如何。

德國造成此次慘烈戰爭的罪魁希特勒，在十年前的一九三三年，握得總統的大權，始建設其納粹黨。當時的德國因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其財力、物力、資源等等，無不窮窘至極，人力也受其影響。當時德國人口大約是六千萬，而在此六千萬當中，又有六百萬人，約占百分之十的失業者（據政府的登記）。德國的疲敝可知。

於是希特勒心懷叵測，乃先樹立第一次四年計劃（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頒布第一次、第二次（失業緩和法），大興土木工事，振作農業，並驅婦女回家去。其結果至第一次四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的一九三六年中期，失業者數激減至一百三十萬。

繼之，希特勒又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宣布第二次四年計劃，其主要方針為使原料自給自足，並擴充生產力，尤其集中全力於製鐵業、化學工業，及機器工業上。從此，德國始再踏上再整軍備的第一步，其後又繼續制定種種勞務管理法令，強化勞務動員體制，以便擴充軍備。

其結果，第二次四年計劃的初期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失業者數，尚為一百三十萬，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僅餘六十萬人，反而感覺勞力不足。另一方面又以德國暗中振興軍事產業，農業勞動力遂至漸減而壓迫至於平時的生產部門，終於開始採取徵用辦法。一九三八年六月公布，翌年一九三九年三月擴充收容的（勞力需供確保令），即為此目的而制定，被徵用的數目，達二百萬以上。

（二）勞動者半數為婦女

德國的勞務政策，起初為著失業者而驅「勞動婦女回家庭」，但其動員男子勞動力

的結果，產生了求過於供。勞動力來源，有涸竭之虞。其時德國政府又開始求其勞動力源泉於婦女，而勞務婦女的數目，與年而俱增了。

年次	勞務婦女(萬)	在全體勞務者所占比率(%)
一九三三	四七〇	三五
一九三四	五〇〇	三一
一九三五	五二〇	三一
一九三六	五五〇	三〇
一九三七	五九〇	三一
一九三八	六二〇	三一
一九三九	七〇〇	三二
一九四〇	八五〇	三七

德國的勞動婦女數目，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更有激急的增加。一九四一年五月，驅婦女返家庭的希特勒終於開始向婦女呼籲了：「提供戰場所要求一切的武器，一切的必需品，是留守本國第一戰線的德國國民的最高義務，此點，余相信德國青年女子及婦人，皆能對國家完成新的貢獻無疑。數百萬的農村婦女，代替男子從事於激烈的田野工作，又數百萬婦人及青年女子，也在工場、辦公所，及商店，在盡著他們的義務」（在巴爾幹戰果的報告中）。

自蘇德戰爭開始後，德國政府為補充男子勞動力之不足，而決定以勞動婦女從事於工場的生產工作。勞動婦女的數目，更有激增的趨勢；一九四一年為一千二百萬人，占勞動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九四二年增至一千七百萬，占百分之四十七。「男子作戰，女子生產」的豪語，迫令德國婦女，自認婦女從事生產為當然義務或最高的名譽，而自

發地從事於勞動。「拜耳製藥工場的男子勞動者數的比例，戰前男六女四，但是現在即變成男四女六了。在其他的工場，甚至如飛機製造廠，女工數目也多過男工。即家庭的主婦，若無十四歲以下的小孩，或有女兒幫忙，也都從事於外邊的職業」。這是某家報紙的報導，德國婦女之如何被徵用可知一斑了。

(三) 勞動力源泉的擴大

無限制的黷武主義者希特勒，至大戰展開而人力更覺不足時，就異想天開，德國的勞務動員政策，終於運用及於外國人的勞動者，乃至利用俘虜。這又與日本侵略者一鼻孔出氣。據調查，德國現在的外國勞動者，波蘭人即在一百萬以上，合意大利及其他小國，共有二百多萬人。至於俘虜勞動者的數目更大，至一九四二年二月截止，在其國內勞動的數目，即已達二百萬人。在其他戰線服務的俘虜數目，恐怕達數百萬以上。

但是從事於瘋狂戰爭的德國，男子的動員已達極度，據調查只尚餘一千萬婦女勞動後備軍，於是德國政府終於不得不採取勞務的「質」的管理法，斷行更高度的產業合理化，集中勞動於高度能率的工場生產，把成績不良工場的熟練工人移至生產優越的工場。據軍需部部长史伯再所稱，「實行產業合理化的結果，比之一年前，同一勞動力增產百分之六十，並可節約三分之一的原料。」這或許有點誇大。不過，德國勞動戰線的勞工會，積極進出於這種合理化運動，卻是值得注意。

五、意大利勞力政策的貧弱

軸心最脆弱一環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指導下，以其法西斯黨的威力，責成其黨員發動全面的戰時姿態，故其勞務情形，略與外國不同。據李智組合相的發表，組合員

的勞務者數目，農業方面有五百六十六萬，工業方面有四百五十九萬，商業方面有八十五萬，其他部分也有二十一萬，合計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二萬人，於組合員之外再加算其他普通人，則從事於工業的勞務者數目，為五百五十萬人，占全體勞務者總數約三分之一。其中有五十萬人被派送德國，從事於礦業、交通、農工業的勞動。意國自稱為協力於建設「德意共同體制」，但事實只不過是墨索里尼對希特勒討好的苦笑罷了！

意大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即於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日，在法西斯黨本部頒布所謂〈勞動的戰時體制〉，對於全國婦女及十四歲至十八歲的未成年男子，作成動員計劃，婦女的半數，被動員於生產部門。意大利為確保其農業生產，以保全其戰爭的原動力，而置重點於「小麥增產」上。其勞動婦女的一半，即用於此方面。

意大利的農業計劃，尤其用心於「戰時菜園」的擴大與加強上，開墾未開墾地，努力於農產物的增產，最近甚至於擴充耕地至鐵路的兩旁，是由鐵路從業者及所謂鐵路義勇軍負責的。意大利在一九四二年又對於農村出身的兵士，實施十五日「歸農兵制」，是與日本同。

但是意大利遲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始由墨索里尼對於全國產業，聲言實施動員令，其中一特色即把十四歲至六十歲的婦女，置於軍律軍規的管制之下。受此動員令適用的公司，有十五萬四千家，其人員達四百萬人。如無政府的許可，在職人員不能擅自離職。

意大利的勞力情勢，因其產業低級而在初期並不緊張，尚有餘裕勞動力供給別地方，但是後來隨戰爭的開展，而漸覺人力的不足。於是終於實施〈勞務動員計劃〉，羅馬街上已出現女郵差，漸以婦女代替男子的工作了。

然而法西斯黨業已瓦解，墨索里尼出亡於德國，希特勒雖揚言予以扶持，但事實上

只不過是個階下客，其貧弱的勞動力政策，將更無力。若尚可有多少作用，那末就是替德國徵集人力罷了。慘哉，墨索里尼的下場！悲哉，意大利的勞工！

六、日本勞力統制的悲哀

(一) 勞工的缺乏與一般對策

日本年來不斷的高喊其「產業報國」、「勞力報國」乃至「協力和親，以突破這非常時局」等口號。但是總人口只有七千萬人（朝鮮及台灣尚不能計算在內），除了老弱者、病患者、小孩、官吏、海陸空軍家庭婦女，以及有閑階級，究竟還有多少人，可以服務「產業報國」、「勤勞報國」，實一大疑問。要用這貧乏的人力，應付空前的大規模戰爭所需要的產業配備，尤成問題。日本政府及其代表發言人們，自然難免焦急慌張了。從下面幾條消息，吾人可以窺見其內情的大概：

1. 日方為促進生產計，已將煤礦工人的工資，特別提高；
2. 日本戰時工業，尤其是飛機工業的工作時間，最近雖已延長，但東條首相在其視察途中，仍向工人作強烈的呼籲；
3. 三菱飛機製造廠的工人已因勞動過度而致十分疲憊，但該廠總裁仍要求工人增加生產；

4. 日本政府下令封閉妓院二千三百家，強令妓女改業，從事於戰時生產；
5. 日本封閉小店鋪約一千五百家，迫令店員從事於製造軍火及耕田；
6. 日本企劃院總裁曾聲稱：「各政府機關應以婦女任各種勞役，並酌量封

閉學校，令教員從事生產。」（據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倫敦路透社訊）。

日本政府對於勞力的搜刮，可說是羅掘俱盡，竭澤而漁了。但是日本勞力再編製政策，最近又有更普及於全面產業界的發展。據上述第八十二屆議會，所謂「企業整備」所企圖的目的有兩種，即獲得原料與勞力。更確切言之，即為緊要產業部門獲得原料與勞力。其具體辦法，就是廢除日本政府所認為「非戰時緊要產業」，而以其機器為廢鐵，以其勞力移用於所謂「超重點主義」的產業生產上的。

今日日本認為最重要而屬於戰時緊急產業，除陸海軍直轄的軍火工廠而外。應首推製鐵、煉鋼、造船、造機，其次，即為紡織工業，及必需的食品工業了。若商業、造絲工業，乃至玩具、食糖、製紙等工業，日本並不視為重要，而予以廢止，或強令裁並，而將其勞動力移用於戰時工業。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日本協調會推算，日本中小工商業服務者，約有三百萬人，以前因為原料缺乏，大半已停止經營，日本政府此後更將所殘存者，命令全部停止。

對於鋼鐵業、煤炭業及非鐵金屬礦業，日本雖然重視，但也因為勞動力缺乏而採取裁並辦法。鋼鐵業只保留日本製鐵會社及日本鋼管會社兩家私營公司，其他即悉數裁廢。煤炭業也只保留三井、三菱、住友、貝島及明治等大公司，並採用地域集中制，以肥筑、筑豐及盤城三地為中心，其餘小煤礦全部停止工作。非鐵金屬礦業，指定礦山二百四十五處，集中開採，其餘小礦山均予以停止。其次，紡織業被命令停業的成分更多。紡織業原為日本支柱工業，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而棉花來源斷絕以來，百分之九十的紡機皆已停動，此後措置將更徹底，僅保留紡機百萬錠及織機三百架以上的大公司八家，且此八家大公司又只保留原有機器百分之三十，其將多出的勞力，實在可觀。他如人造絲工業，原有十五家大工廠，現只保留五家，而此五家的經營又只允許保留百分之四十。化

學工業原有一千三百家工場，現僅保留工場面積三十坪以上的較大工場二百五十家，水泥業也只保留專業及兼業各六家公司。再如造絲業、製紙及製糖業，均以不甚切要而其廢止程度更高。生絲原為日本大宗產品，原有造絲工場在數千以上，現只允許保留一百五十家工場。製紙雖為傳播文化的工具，但在戰時也認為不甚需要，而命令「制業大王」的王子製紙公司在日本內地三十三家工場之中全停六工廠；庫頁島一百家工場中，僅保留一廠。製糖業更因其為半奢侈品而命令日本內地工場全停，台灣方面停止大部分。

日本企業這樣大規模調整，自可移植不少勞工於戰時緊要的工業生產上，這才實實在在是日本勞力再編製的真相，但總難免有剝肉醫瘡之譏。

(二) 女工來源的開拓

日本對於勞力的新調整，除了上述剝腿肉補手腕，移此挹彼的方法外，還苦心孤詣地開拓所謂「勞力新給源」。在日本平時的勞力新源泉中，一向以國民學校畢業生、中等學校畢業生、半島勞務者（朝鮮勞動者），及未就業的婦女為最重要。就中，未就業的婦女，尤為日本政府認為最重要的勞力「新給源」，一般每給予相當大的評價。他們取例於第一次歐戰當時各國動員婦女的事實。所以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第一次勞務動員計劃》，婦女的勞力來源占著相當的地位，日本社會才充分注意到婦女的存在。

誠然，日本政府一向並沒有重視婦女的存在，日本女工雖在日本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勞工總數之中占至百分之九十的比率，但自大體上說，日本婦女除了服務家庭工作外，大多數還是閑散的，或者是所謂「不要不急產業」的從業者。例如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娼妓、家庭婦女兼營的所謂「內職」等等，即在日本當局萬分焦慮以從事勞動力搜刮的今日，還有許多婦女閑散著。日本政府為著幫助農業生產，曾於農耕季節，發動學校學生及輕傷軍人，下鄉幫助農家收穫或耕耘，而下鄉的學生及軍人們，發現過農村的姑娘，

還有許多塗粉抹胭脂，站在門口賣弄風情，感到大不高興。這種事實固亦足以說明日本婦女的「勞力新給源」，還非常豐富。

日本對於發動婦女的勞力，固然用了相當的心思，但就其（婦女勞務動員計劃）實施的結果考察，則其成績又不甚佳。統計數字比什麼都要雄辯些，且將日本婦女就業者數的比率，按年稽察罷。適用（工場法）的工場女工就業者數，若以一九二六年的平均數為一〇〇，則中日大戰爆發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女工就業數只有微少的增加，其比率僅為一〇〇・六。若自戰時勞力動員之點言，未免可笑，但是事實大有進者，中日戰爭第五年度（一九四一年），這個指數倒反減退至九〇・三，翌年（一九四二年）一月又降至八九・八，二月降至八九・二，三月降至八八・八，四月份雖略有增加，但其後又是反降，四月之微漲只是受學校畢業生新就職者一時的影響罷了（參閱下表）：

日本戰時女工的變動表

年度	指數
一九三六年	平均 一〇〇・〇
一九三七年	平均 一〇〇・六
一九四一年	平均 九〇・三
一九四二年	一月 八九・八
一九四二年	二月 八九・二
一九四二年	三月 八八・八
一九四二年	四月 九四・六
一九四二年	五月 九四・三
一九四二年	六月 九三・七
一九四二年	七月 九三・二

從上述事實考察，日本婦女在勞力動員上的地位，不能估量過高。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婦女一向的操業，並不是日本戰時所急需的產業。所以一部分日本論者認為強調日本婦女勞力的泉源，不過是男性的「甘言」而已，甚至有人責罵這種過分估量的人為「大蠢才者」（見東京《日本評論》昭和十八年二月份）。

（三）勞動力搜刮政策的前途

日本在勞動力異常缺欠的壓迫之下，想盡種種搜刮的方法，除了婦女勞動力泉源之外，又曾想到A.朝鮮勞動力，B.俘虜的利用，C.罪犯的使役，D.中國苦力的徵集等等辦法，真所謂妙想天開了。但是事實如何？能否達到理想目的？能達何等程度？實是一個大問題。

先自朝鮮勞動力一次加以檢討罷。朝鮮勞動者一向在日本勞動界亦占一重要地位，以前是以殖民地勞動者與內地勞動者的衝突而表現為日本勞動糾紛的一部分，過去是朝鮮勞動者受到日本勞動者的排斥而構成了日本政界的一個問題，現在日本政府固然為著增加勞動力而有歡迎這些所謂「半島的白衣使者」的傾向，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日本阻止朝鮮勞動者流溢於日本內地的基本精神，一時不易改變，亦無改變的傾向。所以日本政府的方針依舊是移植朝鮮人於中國大陸或南洋新占領區。其次，朝鮮勞動者大部是初級及低級的從業者，精練工人的成分還不多。而今日成為日本勞動力缺欠問題的焦點，是熟練工人而不是粗暴低級工人。近年來從纖維工業及食品工業，乃至玩具生產解放開來的勞動者，為數尚多，所以難免異國情調之感。

其次，俘虜的利用問題，在原則上似是一種理想的勞動新給源，但究其實際，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鏡花。日本軍國主義的軍隊，一向是以虐待俘虜為原則的，加以日本糧食的缺欠，對於中國俘虜大多殺掉。我國抗戰精神在軍隊中的堅強表現，大多數中國士

兵在萬一作戰失敗時寧願戰死或設法自殺。即令此後日本軍閥改變俘虜待遇辦法，而其可利用數目增加，但是中國士兵在高級工業生產上，仍不能有所裨助，他們不是熟練工人，所以俘虜之利用，又與婦女勞動力及朝鮮勞動力的運用問題，正是一樣的可望而不可即，其麻煩反比前者為多。況別國的俘虜能為敵人誠心服役者，究竟不可設想。

再如犯罪的使役，日本統治者在平時即已施行，例如強制使役罪犯於礦業生產的慘苦勞動，就中尤以煤礦的非人勞動為最，使煤礦業資本家獲得異常的利潤，成了世界勞動界的黑暗異例。但是這種罪犯在戰時更進一步的使役，亦屬很難的問題，其限界自很嚴厲。其理由就是一般罪犯大多數為非生產者，更不是熟練工人，即令依舊可以用於煤業等礦業生產的慘苦勞動上，但是今日日本所最急要的勞動力，並不是煤業勞動者。固亦可以短期訓練，達到熟練的目的，但是罪犯也不是長期的，一旦刑期滿後即成自由的國民，日本政府復又失掉使役的強制性，問題依然不能解決，而且徒然增加一筆無謂的開銷。

日本侵略者還徵召「中國苦力」，補助他們的勞動力，但是問題卻依舊困難，上述各項原因構成本項問題的綜合，中國苦力不能有助於日本勞動界。

日本政府對於勞動力的搜刮，業已露出手忙腳亂的馬腳，除了原有勞動力的改編及勞動力「新給源」的開拓以外，還想在原有部門的勞動者身上剪「羊毛」，羊毛總要剪在羊身上。

首先就是「嗎啡政策」，即所謂勞動精神的昂揚政策，「產業報國」、「勤勞報國」、「協力體制」、「和親協同」等口號，就是他們的嗎啡；「出勤獎勵」、「技術向上」、「陣頭指揮」、「勞動管理機構一元化」，乃至新工資政策的採用等等，又是他們的具體辦法。

戰爭已逾六年，而其困難日益增加，所謂嗎啡政策在聰明的日本勞動者，已經失掉效力。於是發動戰時科學管理法，即是所謂新泰拉制度，從勞動組織上壓榨已經瘦弱不堪的乳牛。因勞動制度而致十分疲敝的工人，不獨限於三菱飛機製造廠，對於業已延長工作時間的工人一再呼籲加強勞動強度的人，亦不只限於日首相東條而已。日本工業界已普遍運用上述戰時的科學管理法：對於到工廠工作的勞動者給予津貼，對於工作的技術加緊提高。還要由工廠管理者的首腦如經理、董事出頭監督，以前分裂不堪統一的勞動管理法，也要整理成為「一元組織」，以便加強勞工的勞動強度；日本政府又在獎勵乃至強制工廠主實行新工資制度，改日給工資為月俸了。這一串的新辦法無非是要在瘦母牛身上壓榨牛奶。

日本政府還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定例閣議上決定：在中央設立「臨時生產強制委員會」，在各地地方設立「地方各廳聯絡協議會」，其目的在於：「為期神速實現重要物資的緊急生產」；而其重要的處理事項，就是勞動強度的極力提高及戰時勞動力「新給源」的搜刮。

但是事實決不能盡如所幻想，瘦母牛榨不出更多的奶，是可以斷言的。盡日本統治者的代言人，在把日本勞動新管理法詩化，稱道：

把油污油染的工作服，

當作衛國報君的鎧甲罷！

但日本勞動力的搜刮前途，仍然是黯淡的。

附

錄

悼宋斐如

李純青

編者按：作者係台灣台北市人，我國著名政論家。抗戰期間，同宋斐如等在重慶發起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積極從事抗日救國活動。抗戰勝利後，返台灣參加接受日本歸還台灣的「受降典禮」。生前任全國政協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

人誰無死，你死得光榮，求仁得仁。

今年二·二八紀念日，我抑不住悲哀泉湧。不久前，從報紙獲悉，你的妻子也被國民黨殺害，罪名是「煽動學生，反對政府」。你們夫妻都做了烈士，聚首九泉當抱頭痛哭，當懷念在人間的你們的孩子們。

三年前，因為參加二·二八起義，你被捕，死得很慘，傳說你被裝進麻袋，帶石沉江；也有人說，你被活埋在圓山之麓。誰也沒有見到你的遺體，更不知魂歸何處。

你是一個幾十年奮鬥有成就的文化人。你主編的雜誌——《戰時日本》，你的著作和譯文，在我的書櫃裡，書桌上，我每日看見它們，但永遠看不見你了。

台灣回歸之日，願找到你的葬身之處，願撫慰你的孤兒，願為你復仇。

原載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大公報》

懷念二烈士宋斐如、區巖華同志

陳文彬

編者按：作者原為台灣《人民導報》主筆，二·二八事件中曾被捕入獄。後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於解放前夕經香港到天津、北京，從事教育和文字改革工作。曾任商務印書館編審，全國政協委員。

病床心事有誰知？

廿四年來未息時，

華姐忠貞成白骨，

斐兄英烈竟沉屍。

神州統一期明日，

故里終歸展赤旗，

孤子成家今有裔，

志承革命更無疑。

寫給宋亮同志，作為紀念。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傑出的思想家 偉大的愛國者

編者按：作者為深圳社會科學院教授、抗日戰爭文化研究專家。

楊益群

宋斐如（一九〇二、八、十一—一九四七、三、十二），台灣台南縣人，一九二二年三月畢業於台北台灣商工學校，後至一九三〇年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在校期間，積極參加進步文化宣傳活動，曾於一九二七年參加創辦《少年台灣》月刊並任後期主編，向台灣島內宣傳祖國狀況。一九三〇年又與呂振羽、譚丕模、劉思慕、夏次叔等成立「東方問題研究會」，並創辦會刊《新東方》月刊。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馮玉祥隱居泰山期間，化名宋瑞華（宋端華）擔任馮玉祥的社會科學研究室主任，為馮玉祥及其部屬講授經濟學、日文，並介紹日本國情及國際反法西斯形勢。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深造。抗戰爆發前夕，返國內滿腔熱忱投身抗日救國運動。先後在武漢、重慶、桂林等地發起組織「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台灣革命同盟會」，創辦、主編《戰時日本》，任《廣西日報》主筆，「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專門委員。一九四五年十月，隨「前進指揮所」人員返台，擔任從日本占領者手中接收台灣的工作。翌月，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計考核委員會教育文化專門委員會委員，堅持愛國思想教育。工作之餘，還創辦《人民導報》，敢於為人民說話，針砭時政，為台灣國民黨政府所不容，於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中，以「陰謀叛亂首要」、「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等罪名，被當局秘密綁架殺害。其夫人區嚴華也因掩護進步人士、「煽動台大學潮」罪名，

於一九五〇年被當局殺害。根據中央統戰部指示，一九八〇年，廣西區人民政府追認宋斐如夫婦為革命烈士。

宋斐如壯烈犧牲時人屆中年，未滿四十五歲，生命雖短暫，卻熠熠生輝。其卓著的思想成就和突出的歷史貢獻，值得我們認真學習，深入研究，給以應有的評價與地位。尤其今年正值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和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發表十周年，更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台灣的思想家」，這是著名台灣作家、統一聯盟創會主席陳映真對宋斐如的評價。對照宋斐如生平的思想政治活動和豐厚的學術著作（約二三〇萬字），我們有理由認為，宋斐如不僅是「台灣的思想家」，而且是我國現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偉大的愛國者。其思想成就突出表現在：

一、抗擊日本侵略的理論鬥士

日寇侵華戰爭，蓄謀已久，在軍事、經濟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益顯瘋狂、殘酷。中華民族要打敗強大而凶頑的敵人，奪取抗戰的偉大勝利，除了同仇敵愾，奮戰到底，還應該對日寇有全面深刻的認識，制訂相應的戰略。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也。為此，宋斐如以筆當槍，殫精畢力開展日本問題研究。抗戰爆發後，他迅速聯絡返國的留日同學，在漢口發起組織「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並創辦、主編會刊〈戰時日本〉。該刊旗幟鮮明地闡述辦刊的宗旨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目的和任務是「有系統地深入地討論日本各方面的問題；多方面地、準確地刻畫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把敵人的弱點和危機，廣泛地向國內外宣布；擬議各方面對敵工作實施辦法」。內容主要有時事述評和敵軍戰略與兵力兩大欄目，還有敵國資料、敵情研究、敵兵日記、日人論反戰、

敵後實況、各地通訊、外論選譯、漫畫、書評、講座、座談會、人物素描和本刊資料室等專欄。針對重大問題和不同時期發生的主要事件撰寫的「特輯」，如「日寇內部危機」、「戰時日本農村的危機」、「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日寇南進問題」、「日寇第四期侵略戰的力量」、「戰時日本總檢討」、「美日戰事」、「蘇日協定後的國際形勢」、「東北的現狀」、「抗戰中的華僑」等特輯及「太平洋戰爭專號」等。針對性強，及時而集中，深獲讀者歡迎，影響廣泛。作者隊伍十分強大，有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如郭沫若、張友漁、張鐵生、林煥平、許滌新、劉思慕、于毅夫、李純青、李友邦、謝東閔等；有國民黨政要如蔣介石、馮玉祥、孫科、梁寒操等；還有日本、韓國、朝鮮、蘇聯等各國的反戰人士，如鹿地亘、池田幸子、塩見聖策、李斗山等。由於受戰爭的影響，該刊先後轉移到廣州、桂林、昆明、重慶等地斷續出版，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創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終刊，歷時三年半，堅持出版了六卷共三十二期，成為我國抗戰期間重要的期刊，更是難得的以研究日本問題為主的抗戰理論特刊，在我國現代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戰時日本》是個十六開本的大型刊物，人手少，從組稿、編輯到出版，大量編務工作都得由宋斐如親力親為。「創刊詞」、「編後話」及每期固定的「時事述評」和「編輯室」專欄文章，皆出自其手筆。各期的「特輯」或「專號」組文，其中皆有宋斐如撰稿。據初步統計，他在該刊發表近百篇文章，平均每期均在三篇以上。由此可見，《戰時日本》的成功出版，是與宋斐如的努力密不可分的，也是其對我國抗戰宣傳出版事業的巨大貢獻。

宋斐如在嘔心瀝血主編、出版刊物，積極宣傳抗戰之餘，還爭分奪秒繼續潛心日本問題研究，共出版有關專著十六本，其中有：《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九國公約會議與我們應有的鬥爭》、《日本鐵蹄下的東北》、《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日本戰時外交內幕》、《日本亞洲獨霸戰》、《日本如何決戰》等。譯著八本，其中有《日本

國家機構略解》、《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太平洋戰略論》等。有關的論文不計其數，除了上述提到他在其主編的《戰時日本》上發表了近百篇之外，還在其參與的《少年台灣》、《新東方》及其他報刊上，如《時事類編》、《中蘇文化》、《時事月報》、《世界知識》、《東方雜誌》、《抗戰》、《抗到底》、《抗戰文化》、《新中華》、《廣西日報》、《大公報》、《力報》、《新華日報》、《掃蕩報》、《中國農村》、《半月文萃》、《西南青年》等發表了大批研究日本、宣傳抗戰的論文。這些論文的特点是：

第一、內容廣泛，層層深入。宋斐如對日本問題的研究，涉獵的範圍相當廣泛，論述全面而深刻。從縱的方面來講，有政治問題，如《日本戰時政治的衰落及其展望》（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至十二日）、《現代獨裁政治的分析》（載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冬季號）、《戰爭第四年日本政治總檢討》（載《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日寇國民政治的沒落》（載《半月文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第二期第五期）等；有軍事問題，如《敵寇軍事南進的陰謀》（載《西南青年》第二期第五期）、《日本軍事法西斯論》（載《世界知識》第七卷第二期）、《日本最近軍事動向》（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日本南侵北攻下的出醜》（載《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等；有經濟問題，如《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危機》（載《時事類編》第一期）、《日寇通貨膨脹的新發展》（載《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日本勞力資源的悲哀》（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八月六至八日）、《日本產業統制的三種制度》（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等；有外交問題，如《日本戰時外交及其動向》（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最近日寇的外交動向》（載《半月文萃》一九四三年第二卷第二期）、《日本最近對美外交剖析》（載《世界知識》第十卷第五期）、《日本軍部行動派的外交主張》（載《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

期)、《日本對美國軟硬並施》(載《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等；還有社會、文化及其它問題。從橫的方面而言，作者又把上述問題各列出幾個小問題，由淺入深，條分縷析。以經濟問題為例，就分好幾個方面：其中包括工業，如《日本戰時中小工業的沒落》(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戰爭中工業危機的發展》(載《中蘇文化》第二卷第二期)、《日寇最近的鋼鐵業與造船業》(載《廣西日報》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等；農業，如《日本農村經濟的特質》(載《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日本糧食增產的政策的批判》(載《大公報》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日本半封建的農業經濟》(載《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三至六期，第五卷第一、二期)等；金融，如《日本金解禁與中國》(載《新東方》創刊號)、《日本戰時金融統制的剖述》(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日本貨幣的新攻勢》(載《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四期)等；財政，如《日寇南進的財政狀況》(載《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戰爭財政論——如何籌劃戰費》(載《廣東省銀行季刊》)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斐如的日本問題研究，不論其廣度或深度上，堪稱是我國抗戰文化研究中，屈指可數卓有成就的大家。

第二，愛憎分明，筆力犀利。宋斐如在全面深入研究日本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問題的同時，也濃墨重筆，義憤填膺地抨擊揭露日本的侵華暴行，其中有《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載《民族戰線》第八期)、《日本侵略下的東三省農業生產》(載《新東方》「二周年紀念特刊」)、《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載《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載《時事類編》第二、三期)等。《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是這方面的力作，寫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副標題「為紀念九·一八而作」。全文分為：一、日本占領東北六周年；二、日本猙獰面目的表露；三、「經濟統制」下的掠奪；四、武裝移民強占民田；五、

苛捐雜稅；六、毒化政策等。作者滿懷對慘遭日寇蹂躪的東北同胞深切同情之心，以大量血淋淋的實例和精確的數字，力透紙背的筆觸，憤然控訴日寇對東三省民眾的殘酷迫害與橫徵暴斂，並以公開售賣鴉片、廣設烟館妓院、推行奴化教育等手段毒害民眾的罪行。讀來觸目驚心，激發起對日寇的深仇大恨，堅定了抗日救國意志。對日寇的侵略行徑，宋斐如嫉惡如仇，痛加揭露，而對於為虎作倀的投降論調，他更是大義凜然，迎頭予以抨擊聲討。如面對汪精衛的叛逆言行，他按捺不住滿腔怒火，立刻撰寫了一系列討汪的戰鬥檄文，入木三分地揭露其叛國投敵的醜惡嘴臉，引起了大家的強烈共鳴。其中有〈汪逆兆銘的悲哀〉（載〈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汪逆賣國與我們的覺悟〉（載〈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本多與汪逆的魔舞〉（載〈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汪偽「參戰」前後的乖謬〉（載〈大公報〉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等。〈汪逆賣國與我們的覺悟〉中作者指出的六點「覺悟」，一針見血、切中流弊，不啻是堅持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的一劑強心針，在當年具有指導鼓動作用，於今也有認識參考價值。宋斐如在狠揭日寇侵華暴行和痛斥汪逆投降言行之餘，還撰寫了〈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載〈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冀南豫北游擊隊英勇抗戰的一斑〉（載〈抗戰〉第六七號）、〈台灣民主國對日抗戰〉（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等一大批文章，熱情歌頌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戰鬥精神；撰寫了〈七年來的教訓與進步〉（載〈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上海事變的檢討〉（載〈新東方〉第三卷）、〈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剖述〉（載〈中蘇文化〉第一卷第十二期）、〈第四期抗戰的敵我情勢〉（載〈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新年·新階段·新覺悟〉（載〈抗到底〉第六期）等評論，及時總結各階段抗戰經驗教訓，指出前進方向；撰寫了〈對日集中進攻罷！〉（載〈廣西日報〉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抗戰必勝的理論根據〉（載〈時事類編〉第四期）等文，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堅持不懈抗

爭，奪取抗日最後勝利。這些文章，對推進我國偉大抗日救國運動，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第三、意識超前，見解獨到。社會科學研究，不僅需要紮實的理論功底，更需要敏銳的思辨能力，才具有真知灼見，不致人云亦云。宋斐如在日本問題上卓有建樹，既得益於其深厚紮實的理論素養和不折不撓的研究實踐，更來自其勇於探索，善於獨立思考。這主要表現在其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判斷上。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必要將抗戰期間國際形勢的框架，總格局略述於下：

抗日戰爭八年中的前四年，我國是單獨對日作戰的。其時蘇美兩大國尚未捲進到戰爭漩渦裡，英美與日本有矛盾，也有準備與日妥協、犧牲中國的舉動。尤其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國代表在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鼓動了日本在東北太平洋地區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氣焰。日、美兩國間爆發戰爭的危險日趨嚴重。但美國此時仍幻想置身於戰爭之外，或盡可能地推遲太平洋戰爭，便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謀求通過談判與日本達成妥協。日本雖然也已下決心「南進」，為奪取南洋地區不惜與美國開戰，但為麻痹美國，並企圖通過日美妥協以儘早結束中日戰爭，也贊成同美國談判。於是，一九四〇年底，日美談判以非官方接觸開始。此後，日美談判雖繼續進行，但日本以談判當作備戰之烟幕彈，美國亦利用談判爭取時間，更把它當作遠東慕尼黑黑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雖然提出各式各樣的「方案」、「建議」、「臨時協定」等，但談判毫無進展。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美軍損失慘重，日美談判收場，美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英美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與此同時，鑒於德國法西斯侵略蘇聯的危險性日趨嚴重（德國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侵蘇聯），蘇聯雖同情中國，但擔心日本北進，為避免在西方和東方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決定對日緩和。而日本亦想集中力量解決對華戰爭和準備南進，暫時

對蘇聯取中立態度。蘇聯遂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日寇侵華氣焰更加囂張，中華民族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因此要想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身處模糊迷離的國際形勢中保持頭腦清醒，絕不能迷失方向，必須抗戰到底。

宋斐如有鑒於此，適時撰寫了一系列國際問題研究論文，透過對變幻莫測的世界局勢的科學分析，獨闢蹊徑，廓清流弊，一針見血地揭穿日本侵略者的陰謀詭計，警示世人。這些文章中較側重於論述國際關係，除了「中日關係」，主要還有「日德關係」，如《德意軍事同盟與日本》（載一九三九年《廣西日報》）、《日本軍事代表團赴德意》（載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日寇欲勾結德國平分世界》（載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二期）等，抨擊日本同德國勾勾搭搭，其野心在於與德國平分世界，建立其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在「日蘇關係」上，則有《蘇日漁約糾紛的前前後後》（載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日蘇最近的糾紛》（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十期）、《日蘇談判及其問題》（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世界知識》第十卷第六期）、《蘇日會馬上爆發戰爭嗎？》（載一九四三年八月《半月文萃》第二卷第二期）等，闡明日蘇兩國鑒於各自的需要，不得不暫時掩蓋矛盾糾紛，締結「中立條約」，目前日本不可能進攻蘇聯，所謂日本北攻蘇聯是假，實則蓄意南侵英美等國。上述作者的科學論斷，已為後來的事實所佐證，發揮了一定的指導作用。而在「日美關係」的論述上，尤為突出，如《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載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一期）、《日本對美國軟硬並施》（載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日本最近對美外交剖述》（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世界知識》第十卷第五期）、《日本南侵北攻下的出醜》（載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六日《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等。這些文章的發表，均早於日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

二、三年前，正當日本誘惑麻痺並處心積慮備戰美國，而美國則毫無覺察甚或助紂為虐之際，作者便不厭其煩地闡明：日本對美國所採取一系列軟硬兼施的外交政策，其意在於對美國施放烟幕彈，為侵美戰爭作準備。在《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一文中，強調指出：「太平洋的血戰，自所難免，美國及其軟弱的鄰邦，將遭遇列強的壓迫」，「假使美國也與英國同樣屈服於恫嚇，日本將更得寸進尺地排擠」。鑒此，「美國絕對不能坐大了日本」，務必主動制裁日本，因為「美國今日制裁日本比蘇聯容易得多，他可以不動一兵，不發一炮，使倔強的侵略者屈服，因為日本在華的經濟開發還沒有成功，離開了美國資源及軍火的供給，就無法進行戰爭」。作者進一步告誡美國，指出「美國今日尚可以運用輕而易舉的經濟制裁辦法及與英、法、蘇聯合外交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就範，若再過些時候，到日本的羽毛豐滿之時，美國即欲保持其本國之安全，也恐怕不可能了」。最後，作者語重心長，強烈呼籲：「我們代表中華民國的全部人民，以極誠懇的態度，敬告美國當局及人民：美國絕對不能坐失制裁日本強盜的機會！」真可謂料事如神，一語中的！可惜當年美國無視這些忠告，預言應驗，自吃苦果。

值得我們指出的是，被譽為二戰史上經典戰例的「珍珠港事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僅用了兩個多小時便把神秘精良的美國海軍基地炸毀，致使美軍損失慘重，並蒙受奇恥大辱。可見日本早有準備，戰前的情報工作也做得十分準確。兩年前我有幸赴夏威夷親歷其境，紀念館的講解員告訴我們，說日本當年靠的是大量移居島上的日本僑民提供美軍的情報及日本間諜的策應。而早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發表的《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中，宋斐如便十分清楚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的魔手，早已伸展到美洲，日本對於美洲移民的積極，及近來日本間諜在美國的活動，其情勢之嚴重並不下於日本四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企圖」。這決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作者善於審時度勢，具有超前意識。

二、力促祖國統一之踐行者

台灣早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後被日寇所占領，日寇為了使台灣人「成為忠良的日本人」，即受日本人支配、奴役的忠實奴僕，著手實行所謂「同化政策」，開展奴化教育的訓練。抗日戰爭爆發後，更變本加厲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加重對台灣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精神強制，把台灣民族推進滅種的嚴重危機之中。

宋斐如自小生活在日寇如此殘暴統治之下，雖然被強制奴化教育和訓練整整二十年，但愛國情懷愈加熾熱，嚮往祖國之心無時不在。終於在一九二二年擺脫了日寇的魔爪，冒險悄然返回祖國在北大就讀，並從此獻身於促進祖國統一的偉大愛國事業中。一九二七年，在北大求學期間即與張我軍、洪炎秋等進步台灣青年創辦期刊〈少年台灣〉，「架起台灣與大陸間資訊傳播的橋梁」，向台灣島內宣傳祖國。抗戰期間，宋斐如同謝南光、李友邦、謝東閔、丘念台、李純青等在重慶發起建立「台灣革命同盟會」，這是台灣知識分子在大陸組成的愛國抗日政黨，由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革命黨、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台灣光復團等六個進步黨派和團體聯合組成。宋斐如為三人常委之一。其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奮鬥目標是爭取實現台灣的自由、平等、進步和康樂。同盟會在推動大陸和台灣抗日鬥爭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貢獻巨大。抗戰勝利後，宋斐如就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期間，提出要「教育同胞成為中國人」。要教台灣人民以「長江大河、五嶽長城的雄壯」，「學習做人、做主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還通過其創辦的〈人民導報〉，號召台灣要搞光復後的經濟建設，更要加強祖國的文化教育，和祖國「溶化在一起」。為兩岸的統一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

宋斐如在促進兩岸統一的過程中，不僅運用刊物做好輿論引導作用，而且通過政黨

和自身職務做了大量組織發動工作，還以飽蘸愛國激情之筆觸，撰寫了感人肺腑的論文，抒發其熱盼台灣早日回歸祖國的赤子之心，概括起來，可以分為：

(一) 憤怒控訴日寇占領台灣的種種惡行，強調台灣是祖國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呼籲祖國毋忘台灣。其中較突出的有：〈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載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新東方》第一卷第十期）、〈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發展〉（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新華日報》）、〈毋忘台灣〉（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廣西日報》）、〈台灣在急激演變中〉（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廣西日報》）、〈太平洋戰爭中的台灣〉（載一九四三年五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和〈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載一九三〇年三月、四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三、四期，譯文）、〈台灣民眾的悲哀〉（一九三〇年九月出版，譯著）等。

〈毋忘台灣〉堪稱為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歷數日寇殘暴蹂躪台灣人民諸多罪行之後，著重在政治、經濟、教育三方面給予揭露抨擊。指出：「第一、在政治上，敵人的政治制度本來是很野蠻的，」而對台灣的統治尤其野蠻，「在殘酷的《六三法律》支配下，台灣的統治可以說是一種暴君的專制；個人生殺予奪完全操在一個人手上。而這種專制的統治，是透過警察制度執行的。警察的權力最大，他可以隨意對人民加以逮捕或毆打，隨便侵入民宅，因此，常常釀成反抗的事件；」第二，在經濟上，敵人不是實施經濟的剝削，而實在是超乎經濟以外的掠奪。對台灣的農副產品實行壟斷，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比如「強占農民的土地，強迫農民栽種甘蔗」，收穫後「數量價格完全由會社規定，由不得老百姓作主」，「所以一般蔗農都叫苦連天，過著非人的生活；」第三，在教育上，敵人所能給我們的只是奴化教育，而待遇上尤有厚薄之分，「中國學生動輒遭欺侮迫害，」所以常常鬧出民族的鬥爭，「這不過是指其一端，其實

在教育上的束縛毒害，又何止待遇上的不平而已。」

接著，作者進一步談到：「從政治、經濟、教育三方面看，日本統治台灣用的是半封建的野蠻的方式，我們五百多萬同胞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所以四十八年來，民族解放的武力鬥爭，始終沒有中輟過。但大多數是地下的孤立無援的行動，很少得到祖國同胞的瞭解。到了今日，才能夠向祖國同胞公開提出光復的口號，希望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來，在祖國方面過去四十八年，我們一直表面緘默著，到今天才能公開的呼號，同胞的悲痛，可想而知！」親愛的祖國，「勿忘台灣」！

文章最後，作者向祖國再次強烈呼籲：「六百萬同胞只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我們很清楚，我們除了這條路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我們也有權利要求祖國表示收回台灣的決心，宣布台灣是一塊失土，和其他淪陷省份一樣看待。我們更要求祖國趕快完成收復的設施！」

讀著讀著，我們的靈魂深受震撼，仿佛看到一個瀕臨水深火熱之中的棄兒，正在傷心欲絕地向著他那多災多難的母親，訴說著離情別緒，迫切呼喚早日將其從苦海中拯救出來，回到母親的懷抱中。情真意切，發人遐想！作者正是通過觸目驚心的例證，絲絲入扣的論述，如訴如泣的字句，充分表達其將台灣的命運跟祖國的抗戰大業緊密聯繫起來，希望祖國早日打敗日寇收復台灣，抒發其熱情高漲的愛國情懷。

(二)重申台灣與祖國「血濃於水」的關係，為如何收復台灣出謀獻策。其中，尤以〈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載《新華日報》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如何收復失地台灣——血濃於水，台灣必須收復〉(載桂林《大公報》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台灣農民的慘痛〉(載重慶《益世報》一九四二年四月六日)等最為突出。〈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係宋斐如在重慶「台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上的發言

稿，〈新華日報〉發表時特加編者按語，稱「本文係台灣革命同盟會常駐委員宋斐如先生在台灣光復宣傳大會的演說，其中敘述台灣人民的戰鬥經過，並對日寇統治台灣的方式和台灣解放問題，提出了他的意見。茲特刊載如下，以供內地同胞的參考」。

宋斐如講話一開始，便再次深刻闡明台灣跟祖國「血濃於水」的密切關係。他通過深入系統的論證之後強調指出：「從地理上說，大家都知道，台灣距離福建很近。從廈門坐船到高雄只要四個鐘頭，兩地相隔不過一衣帶水，台灣實是全國的海防屏障。從人口上說，大多數都是中國人，台灣與祖國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從歷史上，地理上，人口上這三者觀察，都可以證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我們怎能讓它受敵人的宰割呢？」「還有，台灣除了上述三點之外，尚有一個中華民族所不能忽略的特點，就是它始終是抵抗異族統治的堅強根據地。」可見，「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與祖國關係之密切，」血脈相連，無法分開。言簡意賅，有理有節，無可辯駁。

宋斐如在講話中，還再次無比憤慨地控訴揭露日寇摧殘毒害台灣人民的血腥暴行和陰險手段，表達同胞「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的強烈願望，希望祖國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解放台灣的神聖職責，早日「使五百多萬呻吟於敵人魔掌下四十八年的台灣同胞撥開雲霧，重見天日」。

為此，宋斐如為祖國收復台灣建言獻策，提出：其一，糾正「以為台灣革命運動向來不統一」，要求只有「先統一起來」，方能進行收復準備的「錯誤觀念」。他認為「自去年以來，由於祖國抗戰的關係，各團體完全統一，各黨派的意見也完全一致，大家都在台灣革命同盟會這一組織下努力進行種種革命工作」。「因為同盟會是代表五百多萬同胞的一個總體，所以我們主張在省政府成立以前，它要具有政治機構性質，在省參議會未成立以前，它應該是代表民意的機關」。其二，「要求祖國趕快完成收復的設施，如正式成立省政府，省黨部、團部，設置參議會及國民參議員。有了這些設施才算奠定

了未來的基礎，集中黨、政、軍及社會文化教育各界的台灣人才，而發揮更大的力量」。其三，台灣「要求回到祖國」，「工作相當艱巨」，不僅「需要五百多萬台灣同胞的努力與奮鬥，同時也需要靠祖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協助」。因此，「收復台灣失地，已不只是台灣人民的責任，而是全國同胞的共同責任」，務必團結一致，抗戰到底，才能實現祖國的統一。這些建議，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中肯貼切，頗具可操作性 and 指導性，表現出作者在如何收復台灣，促進兩岸統一方面，早醒早覺，深思熟慮。其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令人敬佩。

如果說，宋斐如在上文關於收復台灣的獻策中，較偏重於思想認識和設施建構的考慮，那麼〈如何收復失地台灣——血濃於水，台灣必須收復〉一文，則突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深層探討。他開宗明義指出：「收復台灣須自收攬台胞人心下手，而收攬人心之妙，在於運用民族主義。」接著，加以深入分析，認為「台灣人民的家族觀念極深，每一家或一族，皆與『唐山』保持著族譜關係。用家族關係去聯絡台胞，容易親密混成一片」。而家族和宗族構成了國族，密不可分。「但此台灣宗族與國族的連鎖，」卻「為日寇離間民族政策所遮斷，故欲運用宗族關係以發揮民族主義於台灣，須先接上宗族與國族的聯繫。其方法就是祖國積極宣布：台灣人即中華民國國民，祖國已為收復台灣而苦心孤詣。首先要著，就是集中台人的力量」；而「收復台灣的第二要著，應該是爭取『台胞內向』。爭取台胞內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民族主義的運用。台胞受治於日寇達四十八載之久，加以政治經濟的壓迫，其民族精神不無多少變化。故欲爭取台胞內向，必須先復活台灣的民族主義。」

最後，宋斐如強烈呼籲我國當局，務必高度警惕日寇的人心爭奪戰，指出「現在敵人不但在積極謀同化台胞，且欲利用台胞為橋梁，繼由宗族關係，來懷柔我淪陷區的同胞」。「其心叵測，良可警惕，願當局三思現勢之轉移，考慮適當辦法，以相抵制」。

凡此等等，宋斐如有關收復台灣的意見，可謂忠心赤膽，金石之言。在當年團結台灣同胞，爭奪抗戰勝利上，發揮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今天，更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尤其在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爭取同胞民心方面，值得我們記取。而對於承襲日寇衣鉢的台獨祖師爺李登輝之流的媚日勾當，更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迎頭痛擊。

(三) 關心光復後的台灣建設事業，提出要加強祖國的文化教育，和祖國「溶化在一起」。較主要的文章有：〈如何推進台灣的生產建設〉（載《人民導報》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談談台灣農業的改進〉（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台灣教育設施的現階段〉（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同胞應踴躍參加師範教育〉（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十二日）、〈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十二日）、〈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台灣心理建設問題〉（載《人民導報》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和〈我們要溶化在一起〉（載《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等。以最末這篇文章為例，這是作者抗戰勝利後在台灣省訓團上的講話。篇幅不長，立意高遠，開放心扉。開頭介紹其本人早年離台赴祖國大陸的原因和目的。他說：「兄弟是本省南部人，從小就離開台灣有二十五年之久，」「因為我們不滿意日本政府，到祖國去發動抗日的工作，另與台灣方面時時取得聯絡，做復興台灣的運動，日本政府很注意我們，」「這期間在國內奔走呼號的同志們很苦，」「但一回想到台灣同胞受日本政府的欺侮壓迫，其痛苦自比我們更多，」因此，「兄弟在國內二十多年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因為台灣的人民，也就是祖國的人民，台灣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的版圖。」一言以蔽之，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畢生為之奮鬥之目的，便是讓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兩岸的統一。宋斐如接著談到，抗戰勝利了，「台灣已重返祖國，親兄弟『久別重逢』，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一件事！」但是，「台灣

過去五十年離開了祖國，在歷史的認識上難免有一部分脫節」。加之淪為「日人殖民地，受了教育的影響」，「日人實行文化封鎖政策，致使大家對祖國文化不大明瞭」。其實，「祖國有五千多年悠久的歷史，吸收世界進步的思想，實是光輝燦爛文化」，即使近五十年來，「各方面都有進步」，如「從社會思想來講，有五·四運動」，「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藝復興運動，這種文化運動的成果值得我們來接受」。總之，「我們中國的歷史文化是這般光榮悠久，我們更要去接受」。為此，他提出在進行戰後台灣積極建設的同時，也要重視台灣的精神文化建設，尤其要加強祖國文化教育，「更要虛心接受祖國的文化」。

在這篇講話中，宋斐如還特別指出抗戰勝利後，台灣出現的不和諧現象：「近來在社會上輿論上，看到本省人與外省人有些隔膜，國內同胞對台胞有種種批評，而台灣同胞對外省同胞也有許多不滿」。他認為，雖然「兩方面都有相當的理由，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關係，許多往往不能為我們理解，這是難免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是否讓它繼續存在，或是想辦法來消除呢？」答案是後者而決非前者。

為了解答這一問題，宋斐如先引用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教導：「構成民族的要素，就是血統關係，國家是由家族到宗族，再由宗族到國族結成的。」接著指出：「我們可以說普通台胞家族的族譜中，看出從前台胞一部分是從福建漳泉來的，另一部分是從廣東潮州梅縣來的，我們之所謂「唐山」就是我們的祖家。我們的所謂「唐山人」就是指內地人，這就可以證明我們同胞是一個血統，同是一個民族。」結論是，要消除台灣光復後存在的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今後要互相親愛，互相團結」，更要和祖國「溶化在一起！」

宋斐如這些鏗鏘有力的愛國諍言，充分表現了他既愛台灣，更愛祖國，始終堅持把台灣的命運與祖國的富強緊密相連。雖然已逾半個多世紀，但今天仍光芒閃爍。尤其對

於目前台獨分子煽動、挑撥台灣族群的對立衝突，以達到其分裂祖國的野心，更是一面照妖鏡。至於他們硬把二·二八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愛國民主運動，扭曲成「台灣人反抗外省人的流血大衝突」，企圖借宋斐如等人被殺一事來為其分裂活動造勢，這是對宋斐如的無恥褻瀆，不值一駁！

綜上所述，宋斐如一生為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為驅趕日本侵略者，收復台灣，為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大業奔走吶喊，獻青春，灑熱血，功標青史，不愧為台灣人民的優秀兒子，炎黃子孫的精英！確為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偉大的愛國者。但鑒於時間關係和水平限制，未能閱讀其全部著作，細心領會其精髓，難免遺珠斷璧，甚或錯誤，有待日後補正。

二〇〇五年四月急就於深圳益雅齋

馮玉祥與宋斐如相處的日記摘錄

馮玉祥

一九三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

不看新書、新報如何不落後？須趕速設法去購買，如《大公報》、《商報》、《京報》、如《新東方》、如《新亞洲》、如《青年使命半月刊》等，定好寄至某商號轉最好。

一九三二年

四月三十日

國聯調查團來中國，這是一個國際陰謀，企圖與日寇協調對我實行瓜分共管，他們還歡迎，我真痛恨！

五月二十五日

此次到泰山，主要的為了求學，充實革命理論。

七月四日

見宋（宋斐如，編者注，下同）先生等，談政治經濟報告的事，定為每星期一、三、五來談，下次將談研究的綱領及其辦法。

七月十一日

讀經濟學一段。宋說經濟學的動靜兩點，頗有意思。

七月十三日

同宋談經濟學，同鄒談唯物史觀。時間雖只一小時，然獲益不少也。

七月二十二日

宋先生談了許多的實際問題，都是關於經濟的，很有道理，同時又很引發興趣。

八月十六日

同宋先生談經濟學，極有意思。讀過的書要時常復習，以免忘記。……托鄧友仁先生訂購日本經濟雜誌。

八月二十日

同宋先生談洛桑會議及沃大瓦會議之事。知道這兩個會議的具體內容，心中非常高興。這些國際事件都得用心研究。

八月二十七日

宋先生報告國際政治、經濟情形甚詳，又談及南美洲等地革命浪潮之高漲，有一日千里之勢，堪為注意。我以為這是好現象，不革命沒有出路。

陳豹隱先生來談蔣、張、汪三同志情形甚詳。

八月二十九日

本日開始聽陳先生講書，又聽宋先生教日文。

八月三十日

在午前十時聽陳先生講書後，擬赴臥雲台聽宋先生講日文，殊因宋先生之夫人來此，宋先生已去車站矣，故未學習。

八月三十一日

今日聽陳先生講政治，又聽宋先生講日文。

九月一日

早七點至十點，聽陳豹隱先生講書。十一點至半點，讀日文。見宋先生的夫人，係師大畢業。

九月六日

日文因宋先生上山，未講。

九月七日

早七點半至十點半，讀書。未學日文……

宋來談二事，一、其夫人教書事，二、住的地點事。均說了個大概，唯未說明月津若干，不妥，必須說明為好。

九月八日

十一點至十二點，聽日文，本日與宋先生談，請其夫人教弗矜、理達之書，每日教三點鐘，唯月津未定耳。

九月十一日

十二點，同陳（陳豹隱，編者注）、余（余心清，編者注）、雷（雷季尚，編者注）、張、孫、宋六位共餐，談些各方情形，至午後二點多始散。陳先生走，回北平了。

九月十三日

早七點半至九點半學日文。十點至十一點經濟學。

……如五賢祠收拾好，宋先生等四人均移來，則近的多，談話亦方便。

九月十六日

本日八點學日文至九點半。十點至十一點半，宋作經濟報告，甚詳。

午後三點，宋往北平，帶洋一百五十元。觀其發信找人一點，不免有閱歷尚淺之處，某既請准其又婉拒之，可以證明也。

九月二十四日

午後未開會，因宋先生未來故也。

九月二十六日

宋先生夫婦及楊先生來，楊（楊遇夫，編者注，下同）係長沙人，談文法等事件。

九月三十日

本日學日文，學漢文。午後同徐、宋、張、鄒開討論會，……宋、鄒、張、徐、楊之講書，我以為極好。

十月一日

早起，學日文至十點，至十二點學文法。……

午後四點，討論會，宋、張、徐、鄒、鄧六人，詳談印度洋及德國之事。

十月四日

本日學日文，學經濟學、國文、學社會進化史。

我同宋先生、楊先生均談時間不少。

十月十日

本日讀書雖按表進行，然徐因方來，午前未能講課，而宋先生亦未講。……四點至六點，開會討論調查團報告書。

十月二十六日

張、宋、徐三位來，討論反調查團書的寫法。

十一月十二日

劉純德往北平，給宋帶五十元，鄒一百元，為醫費，連前有二百元了。

十一月十四日

我近日因張、宋、鄒之走，讀書太少了，自本月應另改表也。

十一月十九日

自十點同徐、王、宋、張四位讀〈反調查團報告書〉，自緒言至本文四章，均張先生（張勃川，編者注）寫的。自五章至十章，均宋先生寫的。因為九、十兩章關係太大，故改為攜回詳看，至六點半始散。

徐先生頗細。張先生心似略。宋先生文字活而輕視人，人似尚慎重。

十一月三十日

就在這裡把本月的事清算一下吧！寫出如次：

一、……

二、作〈反調查團報告書〉，宋、張兩先生頗努力。

十二月五日

宋先生及其餘諸位均搬到本院來住，為防有事發生之不便可免也。

十二月十五日

宋先生講日文，我覺得他只願教的快，我則以為慢點好，因少了可熟也。……

宋先生午後講經濟學，是用政治經濟學教程，係李達同某譯的，先講生產力及生產關係。

十二月二十四日

午後三點開會，張、徐、宋、鄒均到。宋報告國際經濟後，鄒竭力批評，頗有不相上下之勢。張之報告亦有意思，我均記有筆記也。

一九三三年

一月八日

〈反調查報告書〉換面已成。

一月十六日

……宋先生買來好多日本文的書，不知自己幾時方能看完，努力呵，努力！

二月十一日

談談決心革命之所以。宋先生來談，我請他在政治、經濟、法律、白話文四事上設法找人，定妥後他回北京，亦給了他三十元川資。

二月二十二日

見宋先生端華同白若水、粟寄滄（法學院）、陳君平（北大）三先生，皆陳先生介紹來的。陳為望都人，白為湖南人，粟為廣西人也。

二月二十三日

宋先生帶三人昨日到。

二月二十五日

見宋先生，談找人講法律、講白話文的事。

二月二十七日

午後讀社會進化史。因宋先生昨晚回平，帶洋百二十元。

二月二十八日

……這一個月做了些什麼事呢？……一請妥了宋、陳、白、粟四位先生來講書。

三月十五日

……宋先生回來。

三月二十四日

去年本日住泰山，今一年矣，山海關失守了，熱河失了……

八月十八日

我們在張恒之口號是「抗日救國」，現在泰山口號是「讀書救國」。

八月二十五日

……午後三時，宋端華先生與陳定民先生至。宋先生談現代世界潮流與我等今後應負之責任。

八月二十六日

早飯後八時，會宋端華先生。余問陳豹隱先生近況，最近可否來泰岳一遊，渠詳為余告之，余先渠曰：陳先生為人做事，勤苦耐勞，惟待人太為謙遜，有時使人不安。陳先生有暇，擬再請之來山授學，渠允轉達。

八月二十七日

八時至九時半，宋端華先生講日文、經濟學。

九時五下分至十一時，陳定民先生講作文與修辭……

八月二十九日

七時早餐。宋端華先生在臥雲台講日語、經濟學。

八月三十日

七時至八時，宋先生講日語、經濟學。八時至九時，陳先生講普羅文學。

八月三十一日

六時早餐。七時……。德全自本日起隨宋先生學日文。

九月六日

六日午後講〈春秋〉，范樞銘先生。〈資本論〉，宋先生。白話文，陳先生。

九月七日

……本日給范先生送洋百元，帛二匹。宋一百五十，陳一百，為上月的。

九月十九日

午正，同宋端華先生談研究室的辦法：一、須有長久性。二、須有一固定地方。三、如何能推進一切。四、注重研究討論。五、找人才。我以為此事關係極重大也。

九月二十二日

早起，宋先生報告世界經濟會議之始末，極詳細。我雖看報，並不能詳細，還是有人講說為好。

九月二十三日

早起，宋先生未作報告。讀白話文，……

十月七日

本日宋、趙、徐均有報告。宋的報告寫完了。

十月十一日

同宋談研究室的辦法，擬確實去辦，不知如何。

十月十三日

報告的事，宋先生說羅斯福之復興計劃。趙先生報告是中東路之出賣台灣等。……

十月十五日

請宋先生等作三十篇白話文講演文章，三十篇為中初級，三十篇為高級將領，或作或選，均無不可，惟限於抗日，不怕死之題目，不知如何？

十月二十日

……四、報告事件須自己擬些題目，並同先生們商議一次，按之報告。

十月二十五日

宋先生講貨幣……

十月二十七日

本日粟先生報告農村復興事……

宋先生報告西木拉會議事。……午後蘇先生講西洋史……

十月二十八日

本日是徐、趙兩位報告新疆事件之危險……

宋、徐、趙、粟、陳五位費用，本日送交……

十一月十五日

本日讀書，宋講「經濟學」，陳講散文，范講〈左傳〉。

十一月十八日

……宋端華先生由北平來，談陳先生的意見。約六、七點鐘之談話，寫來對我說了

二個鐘點，非有不能辦國家的事。

十一月三十日

算算這一月作的什麼事……三、研究班已成立。

十二月六日

早讀〈資本論〉，宋先生講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

經斗母宮、白楊山口到三陽觀，同粟先生及宋先生等午餐。

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來約宋先生在午後講書，因到三陽觀來，故未講，午後六點，崔貢琛先生來山上講書，為大戰史。

十二月三十日

午正，請宋、粟、趙、陳、徐、孟憲章諸先生用飯。

一九三四年

一月六日

早起讀書，粟先生報告土地，宋先生駁他，不覺有什麼意思。

一月八日

早讀書，宋講〈資本論〉。陳定民先生講李大釗先生的論文。

一月十二日

歸來即聽宋先生報告通貨膨脹事。……我在研究班讀了「經濟學」八篇，「政治學」

七篇。

一月十三日

本日仍是報告。宋的報告為通貨膨脹。……午後研究班來談武術。

一月十五日

早起，宋講〈資本論〉的目錄。……我同研究班講革命的愛……

一月十七日

宋、趙二位所講的經濟、政治篇子，須要三份來仔細看看。

地質學、生物學、天文學，此三事擬請人來講一講。世界地理亦想請人來講一些。

星期五、六報告改為二次，共四次，每次一點半至三點，定可有個結果。如此即不單一、二、三、四之功課，亦無不可也。

一月十八日

趙先生講「進化史」……同宋先生往接李季谷先生去。李先生紹興人，國內畢業到日本師大，回來教書後又到英國，又回來教書。此次……

一月二十六日

宋及趙、徐、陳報告〈一九三三年之世界經濟回顧〉。

二月六日

李先生講中日戰史……〈春秋〉今日講完……同宋先生規定講書辦法，另擬一表。

二月二十三日

陳定民先生已走，宋先生往北平買書及作書架二事尚未辦，不可忘也。

三月二日

午後，宋先生報告世界經濟之事。後趙先生報告西藏之情形……

三月三日

宋先生等午後二點報告。……後陳先生均平報告美銀提高之事甚詳，宋有所補充。新買的三百多元的書漸漸來了。……在普照寺門前見宋先生之友瞿某、袁某，未多談。聞陳先生談瞿某同美人某同學於清華學校，因瞿較美人所考皆優，美人某在清華為教育科，故不請瞿云云。中國人之腦子不劣於外國人也，明矣。

三月五日

宋先生講《資本論》之復習。……午後五點，同研究班講話，……

三月九日

范先生來討論憲法稿，但未發言。陳先生對應字提出討論。

孫、崔、陳、徐、宋都有意見發表。

三月十二日

早起讀書，是宋先生講《資本論》剩餘價值論。

十一點讀「國際政治」……午後二點，范先生來談《春秋》……午後三點半，陳定民先生談梁啟超的「知不可為而為」……胡適的《為什麼讀書》。

三月十九日

本日是讀宋先生等要印的書。至十一點……

三月二十六日

讀書，午前時間宋、趙來談中國政治，一九三三年的。

四月十三日

早起即讀書，趙先生、宋先生報告。宋為計劃經濟事，趙為雲南事，……
四月二十二日

同宋先生談，得悉唐某在廣西之事。

四月二十九日

我在近賢村同宋先生談台灣人之不自由的情形及我的三點意思：一、經濟學的如何寫，綱目如何，有何意見，二、文章的寫法。三、陳先生出國的事。又說到請心理學先生之事。約有一個鐘頭的時候。

五月十日

同宋先生談兩次話，有些很有意思的事。

六月四日

早起後即見崔、王、宋三人，談擬寫〈歷年作戰之回顧〉，……

六月十四日

宋先生本日回來，談陳、白、許、黃、李五位的情形。

七月二十七日

午前同宋、徐、鄭三位商功課辦法，並將陳先生留下之五條研究一回，宋先生即開始報告意大利的種種情形。未完。

八月三日

早五點半開討論會，宋、徐、鄭三位到。宋續前次之意大利的統制經濟。

八月十七日

八點半開討論會，宋報告各國經濟情形，甚詳。

八月二十日

早八點，宋先生來講經濟學，至十點。

八月二十七日

陳豹隱先生回北京，……同宋先生談些功課的事。

八月三十日

一、物理先生尚未回。二、教理化教員已上課。三、宋先生送來《膠東遊記》序文。

……

八月三十一日

昨夜讀宋先生贈我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看了七封信，並加以圈點，以期有些印象留於腦海中。

九月十九日

陳豹隱先生贈講話二本，宋端華自北平回來，談國語先生的事。

九月二十一日

早八點討論會，鄭先生政治經濟報告為《國聯與中國之政治》，合作內的不成，外的不成，一條一條的分析，很有意思，須要特別注意。末了宋先生補充的事亦有些意思。

九月二十二日

本日午前八時開討論會，先是趙先生報告日英同盟之復活的分析……。宋先生報告C國加入國聯之分析，歸結中國之日壞，此後更不能有任何好處。

十月二日

十點半，宋先生講日文法。

十一月一日

午前宋先生來，談《膠東遊記》，規定改後專人送印辦法。

十一月十四日

宋、鄭、高均按所定時刻教書。

十二月十日

宋、高二位均未上課。

十二月十一日

宋先生午後往北平去。

一九三五年

一月一日

宋先生的信中，裝了黃、薛二位的信中，黃說只見「營私忌才」四字。……

一月十一日

宋先生本日由平回來。

一月十三日

宋先生同田先生、賴先生來，田為安平人，賴為內江人。談在今日政府之下，國家民族所吃之大虧，又說道說實話之得罪人。午後，把讀書之事又重新定規一次。（賴先生即賴亞力，宋斐如去日本留學後，由賴亞力接替宋斐如任研究室負責人。編者注）

一月三十一日

……二十二、《膠東遊記》印出。……

二月一日

同宋先生端華談其到南京的事及見孫（孫哲生，編者注）、鄧等事。

二月十三日

宋先生由北平來了，談了些書的事。

二月十四日

同宋先生談甚久，為新書的事。

二月十五日

同宋先生談新寫之書約二個鐘頭，有些結果。

同宋先生對新書，我寫了十七條意見，以打鬼為主，其次則為不可做圖表也。

二月十六日

同宋先生對書二次，所談甚有意思。王先生去，贈……，宋、何二位送至車站，我送至山下三叉路口。

二月十七日

宋端華先生來對書畢，又談讀書各事：一、注重軍民之希望常新，以拿破崙為比方。二、生活一切須堅持。三、讀書時間宜少，尤須在社會科學，注重實際有用。四、我把信五封均寫李、孫、簡、梁、馬五位，均為介紹宋的。

二月十八日

八點半開始上課，為經濟學，詳論貨幣的情形。九點半同宋先生談他走的事情。我寫的五封信介紹給孫、李、梁、馬、簡五位，有無效果，誠不敢肯定。

二月十九日

何、宋二位來，把寫的書拿去，我亦說了些意見，告知他們二位。

讀經濟學和比較憲法，賴、鄭二位均能按書詳說。

二月二十八日

算計算計這一月辦的……都是什麼……五、宋的留學去，……均辦了。

三月十五日

宋斐如自上海、南京回來，已同中山文化館定有二年的合同，月支一百五十元，聘為日本政治經濟研究員云。……

宋談話如下：一、見孫（孫科，編者注），談□次話，看他寫的東西。二、見馬超俊，談話數次，並有精神團結事。三、見楊某，談話，是三民主義的理論家。四、見李石曾，談話。五、見薛德煜先生，談話。

六月九日

宋先生往濟南，不知何事。

六月二十日

宋斐如先生自日本來函，並有剪報，詳說良心之不安，並問我之所以。

八月二十三日

陳……講書，趙先生澄之已走矣。……說到宋的事，只說到寫書的綱目，給他看，未及他事。我同陳先生談提案甚久，陳先生談青年之病甚詳，一點不假，對於寫書的見解亦甚是……

九月二十四日

宋端華先生來自日本，定規自明日起講書。

九月二十五日

早八點，請宋端華先生講其到日本所研究之心得，言語之間，問其所以，彼對日本史不十分清楚。可見史書之重而且要也。

九月二十七日

宋先生講日本農村情形。

九月三十日

六、宋端華先生來此。……午前宋先生講在日本之所得。

十月二日

為的要同宋先生談其所講的課程，至十點始完，把日本的政治、社會各情形，均詳述了一次。

十月三日

同宋先生談他走的事，我贈他魯網二匹，又介紹信二封，並談了些話。

一九三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見宋端華先生夫婦，談他在東京的近來情形，又言中山文化館，至三月滿期，初級負責為馮朝（超？）俊先生，主持者為哲生先生也。

三月三日

宋、張、李（等）共八人會食，宋由日本歸來，讀（談）些日本社會之困難情形，大量賣兒賣女，大量向外租十八歲的女兒，租不出去，又談些日本軍閥之罪惡。

三月四日

見宋端華先生，談他以後之工作的辦法，我同他商妥之事：一、準備報告在日本所見所聞的一切事情；二、對於我的研究改進；三、研究室此後的進行。

三月二十日

宋端華先生同孫繼顏來到，談些研究室的情形，孫來帶到桐子及柏子一些，桐秧五千株，不日可到，云云。

三月二十三日

本日同宋端華先生談兩次，皆他在日本見聞，說來很有條理，記之如下：一、日本輕視中國；二、中國的學生太自害自己了；三、好的學生很不少；四、在某次大會上，有中國學生唱梅蘭芳的戲，使人輕看；五、又有洋服學生挾了紅衣女子在街上走，日人很輕視的，然他還覺得很有意思的；六、日本左派如……等。多無故被抓，至今無放出來，其待人，用火燒博士們，是真的；七、日本憲兵警察無不知法，然對中國人不合用，因為中國人不配用的，云云；八、日本右派人們更輕視中國人。

三月二十四日

宋先生端華把在日本見聞說完之後，又說了他的些意見好幾點，均甚重要，一、努力抗日；二、同情青年；三、促成政府抗日與人民感情日親；四、與學者有些交通，五、有一研究團體及刊物。

我說我贊成到廣西走一次。

午後，宋先生說日本的近況後，我即在雪中照活電影去了。

三月二十七日

本人九時，同宋先生詳談抗日救國的實施辦法，記之如下：……

四月一日

我同宋端華先生談日本封建之色彩甚為濃厚。……

為宋端華先生給哲生先生寫一封介紹信，意在找事。

四月二十四日

早九點，到小（曉）莊開討論會，至十一點始完。到的人有劉允丞先生、宋、賴、董、鄭君、王共六位。加德全夫人同我共九人，題目為日本此次之政變，報告者為宋端華先生，其大要如下：一、日本軍部為特別勢力；二、日財閥在軍部之後；三、一切辦法以軍為先；四、政黨有點勢力，不過是不很大；五、歸期仍以軍部之主張為主張；六、對中國之辦法，表面上改換一點，內容仍舊；七、中國既不能與之開仗，此時可分二步辦理：甲、凡與中國有利的事，可與之談，否則不談。乙、刻刻須準備大戰而不懈怠；八、孫哲生先生之談話。

四月二十六日

早九點，到峨眉路開討論會，為賴先生報告，很有條理。

我先把今天早起馬超俊先生來的話說了一遍如下：即是宋先生為研究員，不久可為一組長，云云。

六月一日

休息之後，我同宋端華先生、薛德煜先生同車到國立編譯館去見辛樹之先生，前國立編譯館館長，今為陝西興平農業院院長，……

十一月十一日

十一時，宋端華先生偕同信社之司徒德先生來見，談以該社創辦「抗戰」刊物之經過，並索取詩以備登載。我詩二首送之。

十一月十七日

九時，宋端華先生（來），我請其看致韓向方等之函稿，請其斧正。並贈《新大學》十本，請其寫一跋辭，並將書內二要點舉以告之：一、舊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衍成數千年來我國人只知道有家而不知有國之觀念。具體言之即養成自私自利之個人觀念。而新大學之道，則力去其弊而以民族國家觀點為出發；二、所謂「善終」二字，吾人解為安死家鄉，而殊不知如關公、岳飛之死，為民族為國家之死，為正義而鬥爭之死方為善終，否則安死家中不過臭死而已。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七時，請宋端華先生來談話如下：給山東諸將領信，已寄報館發表，不日可登出。

十二月三日

十時見宋端華先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

請宋端華先生來，談以抗戰以來不少部隊軍紀之欠缺，殊出人意表，推其原因，不外平日精神教育缺欠所致，故余制定「軍人問答」二十七條，以匡其失，曾經多人之增刪，並送蔣先生一閱，今請宋先生加以刪改，並作引言一篇，以敘其動機及目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為協和先生雲南起義二十二周年紀念，我請文化界人士二時聚餐，計到有沈鈞儒、鄒韜奮、沙千里、王迄時、李公僕、杜仲（重）遠、范長江、劉清揚、張申府、王炳南、彭漢民、張志讓、張仲實、錢俊瑞、金仲華、沈茲九、石筱山、孫良成、張維璽、

黃文植、張含清、舒舍予、何容、趙望雲、張雪山、董志誠、宋端華、葉鏡元、李協和等二十餘人。餐間，協和先生首起致辭，繼由我起立致辭，繼由沈鈞儒先生致辭，王迄時先生致辭。……二時許散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

六時許，擬請老向、老舍、宋端華諸位先生用飯。皆在家。乃與張雪山、葉先生同餐。
十二月二十七日

八時許……，請宋端華先生來，我請其根據我目前所寫綱領，編一〈民眾問答〉，使人民知發動民眾，究為何因，所作究為何事。

……十一時王冠來開會……

宋端華請為黎明書店編輯陳文傑先生所著〈抗日戰爭之將領〉題字，我題字與（序）之，十二時復介紹來見，乃留與王冠同、李協和先生同進午餐，席間詢及軍事失敗之原因與今後抗戰之意見。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六時晚餐。宋端華、劉思慕兩位先生來見，談以抗戰問題久之。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三日

八時，宋端華先生來會，談以木刻之事，繼談以〈民眾問答〉六十條已草竣，我謂俟我先閱讀一過再談。

一月五日

三時半，見宋端華、劉思慕兩先生。

一月八日

九時，王向晨先生招請與〈抗到底〉有關諸友茶會，計到有老舍、何容、趙望雲、宋端華、劉思慕、張克俠、吳組襄（湘）、趙望雲、張雪山、王德寬、尹心田、葉鏡元、趙虛吾等十數人，首由王向晨先生報告籌備經過，……繼，王先生請我講話。（〈抗到底〉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武漢創刊，宋斐如在該刊上發表過多篇文章，編者注）。

一月十五日

王向晨、舒舍予、趙望雲、劉思慕、宋端華等來談。王先生攜〈抗到底〉、〈戰時教育〉、〈文摘半月刊〉來，中皆有余所寫文字。

一月十六日

二時，會宋端華、劉思慕及羅時覺先生，談楊渠統軍長事甚久。

一月二十三日

接國際和平會函，今日下午一時於漢口商會開成立大會，請余屆時出席，並致演辭。（編者注：此會由宋斐如代表馮玉祥參加並發表演說，詳見〈武漢日報〉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報道。）

一月二十七日

一時，請宋端華先生來，為余撰一演辭，為二月六日國民外交協會向世界廣播，至其內容似應稍涉宗教，余可請一、二教中朋友來略事商談。

三時討論會，宋先生報告日本之近況，嗣由劉思慕先生、張鐵生先生加以補充。我對彼等談以昨日蔣先生召集留漢中央委員茶會之情形及蔣先生發表之談話，均甚誠摯。

一月三十一日

七時，宋端華先生介紹張效良先生來見，談以潛山一帶民眾工作之情形，武進流亡同學所組織的服務團之勤狀況。

二月十日

三時，宋端華、董志誠兩先生先後來談，我告以宋明軒處，曹福林處，以及谷良民處，應派人赴彼長川居住，既不領錢，復不求官，惟日與彼等見面即行，談以國際現勢，抗戰情形，當能使彼等徹悟也云。

四月一日

十時起，開討論會，首由宋端華先生致開會詞，並介紹羅軍長（卓英）部之戰地服務團團長胡蘭畦女士，報告其抗戰以來在東戰場艱苦工作經過。

四月十三日

後請賴先生、宋先生來談討論會事。

十二月四日

十時與賴、宋二先生談話，一、速起電稿，連前天之十條湊夠二十條，為兵役事給委員長；二、苗夷問題太重要，要多與貴省士紳談話，能多知一點事，即能多盡一點力也；三、賴、汪二先生之社會調查報告真好，這是咱們的偉大工作，寶貝東西，我希望咱們能更慎密地進一步調查更好。

一九四〇年

二月二十日

巴中（巴縣中學，一九三八年馮玉祥到重慶後，先後住過陳家橋、巴縣中學、沙坪

壩文化區、南開中學、白鶴場等地方，編者注）李火斤、趙普炬、宋端華三位先生來談。

十月八日

宋斐如先生同兩位朝鮮金若山、韓志誠來巴中，我說，你們的精神使我真是欽佩到了萬分。我們要集中一切力量，把日本趕出中國去，才算是真英雄。他說：今後如何促進中韓友誼也是要緊的，我們為報效祖國，要努力，一切照你說的去。

原載《馮玉祥日記》，一九九二年，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題目為編者所加。

追憶父親宋斐如

宋 亮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每年清明，我多麼想親自到台灣父親墓前拜祭他，可至今我仍不知道他魂歸何處？屍在何方？前台盟中央副主席李純青伯伯一九五〇年曾著文〈悼宋斐如〉說：「……你被捕，死得很慘，傳說你被裝進麻袋，帶石沉江；也有人說，你被活埋在圓山之麓，誰也沒有見到你的遺體……」。八〇年代末期，海峽兩岸的堅冰解凍後，遠在台灣の堂侄子前來探望我，談起先父，他哽咽著說：「當年，六叔公是由我父親幫忙安葬的，連屍首都沒有，葬的是衣冠。」我和他叔侄倆滿含淚水，只有四目對望，妻子也在旁邊陪著垂淚。

一九四七年，父親在台灣二·二八事變中被當局殺害時，我還不到一歲半；而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母親因「掩護進步人士，煽動台大學潮」罪名被台灣當局槍殺於台北馬場町刑場時，我也還不滿五歲。可以說，在我的腦海裡沒有留下任何有關父親記憶；對於母親的被害也只依稀記得。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長，父輩的敘述，我才開始認識到父親是怎樣一個人，漸知父親年輕時從台灣到祖國大陸北京大學念書，而後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深造；曾任馮玉祥在泰山的讀書研究室主任；抗戰期間在國內從事抗日活動，辦過抗戰刊物〈戰時日本〉；當過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台灣〈人民導報〉社長。

為了弄清父親到底是如何一個人，為何被台灣當局殺害？自一九八二年始，二十多年來，我多次尋訪了父親生前的好友、同事以及他們的後輩。並先後拜訪台盟中央、省

台盟的各位領導，得到熱情支持。我與妻子為尋覓父親足跡，跑遍祖國各地，北京、重慶、南京、上海、昆明、桂林、武漢……乃至香港、台灣，共收集了父親的近二十本著（譯）作及發表在《新東方》、《戰時日本》、《時事類編》、《中蘇文化》、《新華日報》、《世界知識》、《時事月報》、《大公報》、《廣西日報》等二、三十種抗戰刊物上聲討日寇之檄文二百多篇，共計約二百多萬字，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此時，我才深深理解李純青伯伯在《悼宋斐如》一文中所寫的「你是一個幾十年奮鬥有成就的文人」的含意，說我父親「一生著作甚豐」之所指。父親的形象在我面前變得愈來愈清晰。

辦刊撰稿 抗日救國

承蒙離休老幹部何標大哥對我的關愛，把秦賢次先生覓自日本的《少年台灣》創刊號複印本贈送與我，我才得知父親早在北大念書時就與其令尊張我軍及洪炎秋、吳敦禮等幾位台灣來京留學的青年學生開始創辦刊物《台灣少年》，父親任後期主編，該刊反映日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狀況和介紹祖國新文化運動進展，率先「架起台灣與大陸間資訊傳播的橋梁」。

記得一九八四年夏，我和妻子第一次到北京劉思慕伯伯（曾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家裡拜訪時，劉伯伯和劉伯母待我們就好像是遠方的兒女回到了自己的身邊，噓寒問暖，愛護有加。劉伯伯還用廣東話對我說：「好多得你阿爸，不然的話，就沒有我的今天了」。我知道，劉伯伯指的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父親曾通過馮玉祥將軍幫助過劉伯伯、伯母。接著，劉伯伯又告訴我：「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一九三〇年，在北京創立『東方問題研究會』，創辦會刊《新東方》時，我們就在一起了；在泰山馮玉祥讀書研究室工作時，我們在一起；一九三八年，在漢口抗日時，我們又在一起了。」

臨走時，劉伯伯還說：「待到二·二八四十周年（即一九八七年）紀念時，我要寫一篇悼念你父親宋斐如的文章。」遺憾的是因劉伯父的逝世，我無法得到他的賜文。

在山東泰山時，父親任馮玉祥將軍的讀書研究室主任，與馮先生擬定了建立研究室五個辦法：長久性，有一固定地方，推進一切，注重研究討論，找人才。父親聯絡了眾多進步學者為馮將軍及其部屬講授各類課程，自己主講政治經濟學、日文、〈資本論〉，介紹日本國情及世界經濟，把泰山讀書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普照寺旁是學府，五原祠下人才濟」——這就是當年的泰山讀書活動寫照。此外，父親還為馮先生書寫了各類文稿、講演文章，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與張勃川合作）、〈膠東遊記〉序、〈對初、中、高級將領講話〉集、擬訂〈軍人問答二十七條〉及引言、編〈民眾問答〉等等，深得馮先生的讚賞與信任。

在馮玉祥與吉鴻昌組織的察哈爾抗日戰鬥中，父親與研究室成員也隨同前往協助工作，宣傳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父親作為馮副委員長的代表出席在漢口召開的「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成立大會並發表演說。馮先生還介紹父親到南京孫科主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任日本問題研究員。抗日救國、復興民族的共同理念把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誓不臣倭〉一書中介紹「馳聘在抗日疆場」的台灣同胞時，稱父親宋斐如為「馮玉祥的密友」。二〇〇一年，泰山馮玉祥抗戰展覽館原展館主任王新豐，得知我是宋斐如的後代，熱情接待我們，並述及展館的大部分展品已運南京第二檔案館，此處僅留下部分照片。他熟悉當時研究室主任宋斐如的活動，因為馮玉祥的日記裡常常提到。在泰山普照寺——研究室舊址，瞻仰著父母親及當年研究室部分成員的照片，我們浮想聯翩，對先輩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當我在盧溝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館）看到父親主編的〈戰時日本〉雜誌、〈廣西日報〉主筆的委任狀以及父親參加抗戰的證件、證章擺在展櫃裡，我明白父

親為何在一九三七年中斷了在東京帝國大學的研修，毅然回國，奔忙於漢、粵、港、桂、閩、雲、貴、川、渝，不辭勞苦，呼喚抗日，矢志不渝。如在漢口，發起組織「戰時日本研究會」任總幹事，創辦、主編會刊《戰時日本》。他以筆當槍，深刻揭露日本殖民主義者侵略暴行，剖析日本軍國主義本質，多方面地、準確地刻畫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堅持抗戰必勝，日寇必敗。在父親的操作和眾多抗戰志士的支持下，《戰時日本》因其內容翔實、鮮明、尖銳等特點，「出版不久即已售罄」。還得到了海外眾多華僑大力襄助，「只菲律賓一地即有一千八百多份贊助訂戶」，贊助金額五元、十元、數百元不等。先後由華僑革命家莊希泉（莊一中）、宋淵源任發行人或贊助督印，為雜誌募捐，籌集資金。除國內發行人外，還在南洋各地設總經理，成為一份膾炙人口、頗具影響力的抗戰刊物。正如《大公報》讀者顧問評曰：「《戰時日本》這個雜誌，並沒有在報攤亂擺，也沒有往字簍裡亂丟，它主要的不是給一般讀者認識各種敵情，而且是給中國各抗日高級機關作重要參考的典籍，內容很豐富、翔實、潑辣。」立法院長孫科曾讚譽曰：「細讀各期內容，其資料之豐富，觀察之透徹，與夫論斷之正確也。《戰時日本》主編宋斐如兄研究問題之精博與作事之負責，為我所熟悉，故自策劃創辦時期即予以相當之贊助。」讀者認可《戰時日本》是唯一研究敵情、使一般人鏟除恐日病之抗戰刊物，千萬萬人已經受了它直接間接的影響。

一九四一年，為配合抗日鬥爭和台灣光復的需要，父親與謝南光、李友邦聯合在大陸進行抗戰活動的台灣知識分子和團體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並擔任執委兼常委，培訓台灣抗日骨幹。會同韓國抗日志士組織「中韓文化協會」，參與組織了「中國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聯盟」，會同眾多的抗戰人士在共同目標下積極進行抗戰活動。父親與前來祖國大陸進行抗擊日寇的台灣鄉親許地山、李純青、李萬居、李友邦、張我軍、謝南光、連震東、謝東閩等經常聚首，他們議論抗日救國，「訴說一個不可移易的信念

——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

一九四二年，在重慶的「台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上，父親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在大會上發表題為〈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的演講，讀著這篇文章和當年的有關報導，我彷彿看見父親正在沉痛地訴說著台灣同胞幾十年來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統治的種種苦難。他從政治、經濟、教育三方面剖析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如何統治台灣、蹂躪台灣人民，繼而他代表著六百多萬台胞在大會上高聲呼喚：「我們今天的要求（目標）很簡單，台灣和別的淪陷區不同，六百萬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我們很清楚，我們除了這條路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同時，我們也有權利要求祖國表示收回台灣的決心，宣布台灣是一塊失土，和其他淪陷省份一樣看待。」赤子之心，蒼天可鑒。

倔強「狠心」 心繫台灣

父親的朋友很多，竹馬之友、時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伯伯是我們最熟悉的一位，這不僅僅因為陳伯伯一家是在我母親的幫助下才逃離虎口的（後來成了我母親被殺害的「罪狀」之一），還因為陳伯伯是〈人民導報〉的總主筆，當年，在那腥風血雨的日子裡，他曾和父親共同戰鬥過，志同道合。二·二八事變中，他為營救學生而被捕，後來媽媽又邀他們一家在台北我們家中居住過一段日子。一九五七年，也是陳伯伯寫報告給中央統戰部把我——宋斐如的遺孤從香港接回祖國大陸讀書。所以，我是他家的常客，而幾乎每次會面，他都會沉痛地對我說：「小亮呀，當年你爸爸要是肯聽我的勸告，暫時到香港避一陣，也許就躲過這一劫了。當年，在你爸爸召集的會議上，我是極力主張他離開台灣的，因為他辦的〈人民導報〉太鋒芒畢露了。可他總是說：『我又沒幹壞事，我為什麼要離開呀？我怕什麼呀？』再說，我也離不開呀！」他真是太執著、太倔強了。」

我常常想，父親不肯離開台灣，自然有他的道理。幾十年來，他為抗戰付出了心血。回到台灣後，他白天到教育處上班，為恢復祖國文化教育、台灣的真正「歸宗」而不懈努力。下班後又和其他有志之士為〈人民導報〉不倦操持，也是為了「啟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溝通國內外的消息」，這有何過錯？！父親雖身為「半山」（當時台灣人對自大陸歸台的台灣人的稱呼），回到家鄉當了「官」，且是當時台籍人士中「官位」最高者，但父親並不像某些「劫收大員」那樣搜刮民財、中飽私囊。李純青夫人談家芳經常說「你父親沒有錢，是個窮書生」，確實，辦報的經費還是從民間籌集的。父親之所為只不過是真實報導而已，「公正的報紙就是報達民情的機關。」何錯之有？！

多年來，聽著外婆、舅舅、舅母及阿姨的回憶，我對父親的瞭解逐漸加深，父親真是個倔強而執著的人。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我來到這個世上才十三天，他就「狠心」地留下我和尚在坐月子的媽媽，而隨「前進指揮所」的人員匆忙趕回台灣。這在別人看來確實太不近人情，但母親理解自己的丈夫，她說：「他是為了祖國接收台灣做準備工作的」。父親在台灣省訓團講話中已說得一清二楚：「兄弟在國內工作二十多年的目的，就是要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因為台灣的人民，也就是祖國的人民，台灣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的版圖。」奮鬥了二十多年，終於迎來了台灣光復，就像一個被賣出去的孩子，歷盡千辛萬苦才能回到母親的懷抱，能不激動、能不焦急嗎？！

父親雖然走得十分匆忙，但他卻沒有忘記交代母親帶上他們結婚時朋友們所送之禮物，這禮物並非金銀珠寶，也非價值連城之古董，而是一塊四五十釐米見方的白綢布，上面畫著一枝梅花，除了書有「勿忘台灣台南開元寺的古梅」外，還有諸位朋友的簽名。父親沒有忘記朋友、同事的囑托，無論是在抗擊日寇的征途中，還是在回台從事恢復國民教育的工作中，他已向台灣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交上了一份圓滿的答卷。

父親的確是個既執著又「狠心」的人。記得外婆曾對我說過，我周歲生日那天，母親從「法制室」下班回來，親自下廚準備飯菜，等著丈夫回來給他們的愛子做生日，可那飯菜涼了又熱、熱了又涼，就是等不到父親。深夜，父親才拖著疲沓的身子進門。聽到開門聲，已靠在沙發上迷迷糊糊睡著的母親馬上站起來，接過父親手中那沉沉的皮包。父親連說「對不起，對不起，太對不起了！」接著又說：「報社的事情要處理，實在是脫不開身。」水都沒有喝一口，父親又躡手躡腳地走進我的臥室，望著熟睡的我深情地說：「小乖乖，明年爸爸一定給你做生日。」接著又在我的小臉蛋上親了親。可誰能想來年三月份，上海《大公報》就已刊出「台北報界遭逢厄運，五家報館封閉，負責人全部被捕，生死不明，日本問題專家宋斐如傳已槍決」。

父親永遠不會回來給我做生日了，倔強而執著的他終於倒在了二·二八的血泊中。那一年，我才一歲五個月。據媽媽當年給當局的「陳情書」中所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左右，父親被便衣六人從家中挾持上了持七三號特別通行證、車牌號為〇二〇三九號的汽車，從此下落不明。

父親的確是個倔強而執著的人，外婆曾多次對他說過：「斐如呀，你既做「官」又罵官，你的《人民導報》幾乎天天都在抨擊政府施政，這樣下去，恐怕官位難保，或會招致更大的麻煩也未可知。」父親總是堅定地說：「我說的都是事實呀，這也是我辦報的宗旨。說違心話，我實在做不到。就是撤職，我也在所不惜！」這真是被父親不辛言中了（其實，也是意料之事）。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才當了十五個月「官」的父親就接到當局「免職，另候任用」之命令了。父親回台後在韓籍官兵集訓隊（日語講演）中講過對台灣建設的設想：「一、在政治上必須確立民主政治。二、經濟方面，不能像日本那樣只肥大財閥，而應為多數國民的幸福謀發展。三、社會性方面，更加注重發揚優秀的民族精神。」父親的這些理想、抱負尚未實現就「失蹤」了，真是壯志未酬身被

害，令人扼腕長嘆息！

新朋老友 緬懷志士

在《人民導報》社過去的眾多記者中，我們能覓到並保持密切聯繫的是吳克泰、周青、戴青田等幾位前輩。他們的訴說，更是加深了我對《人民導報》、對父親的瞭解。吳克泰叔叔曾告訴我：「當年，你爸爸總是下班後才來報社，有時就全家在報館吃晚飯，邊吃邊聊，講存在決定意識、講如何採訪及報導。講記者耳朵要『長』，消息要靈，報導要真實。我寫的那篇台灣農民運動老前輩李偉光訪問記，你父親看了很喜歡，闢專欄分幾天刊載。」

一九九二年三月，我妻子出差北京，周青叔叔帶她去拜訪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吳克泰叔叔，吳叔叔把她介紹給出席大會的其他台胞委員：「這是宋斐如的兒媳婦，」並說：「宋斐如在祖國二十多年，抗戰期間做了許多工作，回台後積極從事民族文化復興工作，可惜在二·二八中犧牲了。他是我們台灣人的優秀分子，台灣人的驕傲。」這令她十分感動。周青叔叔對我說：「你父親被害，是因為他的報紙始終堅持正義立場，堅持真實報導，為民喉舌，我的那篇灣子內農民反抗大地主剝削，遭到大地主區長勾結警察局打手鎮壓的報導，引起了有名的『王添燈筆禍事件』，當局對你父親極為不滿。」我聽多位前輩說過，父親因辦《人民導報》，常常受到當局的警告，但他仍不改初衷。

戴青田叔叔對父親的敬仰更是令我感動不已。二〇〇三年，我們去遼寧拜訪戴叔叔的令郎戴高爾兄弟時，高爾兄弟竟能說出許多父親的往事，我驚奇地問他為何能如此清楚？他說：「我父親經常對我講宋老前輩的事情，就是在『文革』期間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我父親還說比起宋斐如老師，我受的這點苦，算不了什麼。」由於父輩的關係，我

和高爾真是一見如故，他把其父發表在〈團結報〉上的悼念宋斐如的文章以及尚未來得及發表的文章、詩等等都送給了我。至此，我方明白戴青田叔叔為什麼在一九八三年就提出要協助我出一本紀念宋斐如的文集。可惜那時我並不如今天這樣瞭解父親嫉惡如仇、鐵骨錚錚的性格和一生為抗擊日寇及台灣回歸祖國不遺餘力的抱負。今日，每憶及此，仍感愧對先父在天之靈。

幾經努力，去年十月，我和妻子終得以回到闊別五十五載之故鄉——台灣探親，少小離家老大回，激動之情難言表，凝視延平南路〈人民導報〉社舊址，漫步新生南路，尋訪開南商工學院——這些父親當年曾經工作、生活、學習過的地方，我彷彿看見父親還在孜孜不倦地工作著，他正在電台播講〈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他正在向台灣的父老鄉親述說對於教育的設想：「應該教育六百萬台胞，變成『主人翁』」，「使『歸宗』二字名副其實……，使得擇其善者而學之，其不善者而棄之。」，「應該培養台胞成為『世界人』。」，「台胞也必須從此三大原則去學習作人、作主人、作中國人、作世界人，……然後才不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父親這鏗鏘之音仍然回蕩在故鄉台灣的上空。

雖然在台灣僅僅逗留一個月，但卻得到了眾多熱心人士的大力襄助，陳映真教授介紹認識了曾健民醫生（業餘時間從事光復後的台灣歷史研究）和夫人，他們為我們提供了父親回台灣後發表在〈新生報〉、〈政經報〉、〈和平日報〉的文章及全套〈人民導報〉複製版。台灣史學家秦賢次先生指點我們尋找父親著作的捷徑，借給我們許多參考書，使先父的遺著收集工作意外順利，如願以償。拜讀當年的〈人民導報〉，我們也才得以進一步瞭解父親回台後為恢復台灣的國民教育、宣傳祖國文化，反映民情，為台灣的生產建設及發展而日夜奔忙、竭盡全力。

台灣抗日義勇隊隊長李友邦伯伯的夫人——八十高齡的嚴秀峰女士，雖身體欠安，

但仍接我們到她家裡，向我們介紹父親與李伯伯在一起的戰鬥歷程，介紹他們之間的友誼，諄諄告誡我們：「你們一定要好好收集父親的資料，一則還歷史公道，二則以史為鑒，告誡後人：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團結，不要分裂！」同時，嚴女士還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為後人留下一些歷史資料，讓他們知道：從九·一八算起，祖國大陸是經過十幾年的艱苦抗戰才取得勝利的，而台灣則是經過五十年的抗爭才得以重回祖國懷抱的。這其中，有千千萬萬的同胞付出了血汗，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祖國的抗戰中，我們台灣人民沒有缺席。你父親和李伯伯是台灣人民的優秀兒子，他們為抗戰、台灣的回歸、台灣人民的民主與自由付出了很多很多……」

先輩為台灣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為中華民族大家庭骨肉團圓奮鬥了幾十年。無數台灣抗日愛國志士前仆後繼參加抗戰活動，只是為了一個「魂牽夢縈」的祖國——中國，父親宋斐如只是這千千萬萬之一。今日，海峽兩岸雖尚未統一，但海峽兩岸是血肉相連一家人，誠如先嚴所說，台灣和祖國人民「血濃於水」，「台灣的人民，也就是祖國的人民，台灣的土地，也就是中國的版圖。」誰要否認這個亘古不變的事實，妄圖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只不過是小丑跳梁之舉罷了。

紀念是為了緬懷過去，面向未來。父輩的遺願尚未了卻，作為宋斐如的後代，一個居住在祖國大陸的台灣人，應為完成先輩未竟之事業，為了統一團結的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須努力，再努力！

沉屍之冤何日申

何標

「華姐志貞成白骨，斐兄英烈竟沉屍。」這是二·二八起義前擔任台北建國中學校長的陳文彬先生，生前所作悼念宋斐如、區巖華夫婦的詩句，宋先生曾任台北《人民導報》社長，一九四七年二·二八起義被鎮壓時遭特務綁架失蹤，據傳被裝入麻袋沉入大海。三年後，區巖華女士又在白色恐怖時期慘遭殺害。獨子宋亮當年不足六歲，頓成孤兒，後由親戚帶來大陸，現已年屆半百，供職於深圳市。

兩年前在北京的一次集會上，我同宋亮邂逅。當得知他的父親就是家父張我軍早年摯友宋斐如時，我就把剛從台灣友人處得到的《少年台灣》創刊號複印本相贈。這本刊物是六十多年前由在北京讀大學的幾位台灣青年創辦的，宋斐如主編，家父為主要執筆者。它的出版，曾成為連結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和日本占領中的台灣的一座文化橋梁。把這本具有歷史意義而絕版半個多世紀的父輩合作結晶贈送宋亮，是為了表達我對斐如老伯伉儷的懷念和敬意。

斐如先生比家父小一歲，他們當年都是生長在台灣的热血青年，為了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遠離家鄉來到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接受祖國的高等教育。斐如先生在滯留大陸的二十多年當中，追隨過愛國進步將領馮玉祥將軍，在武漢、香港、桂林、重慶等地創辦過多種報刊，宣傳抗日愛國，撒播進步思想。日降後，由他擔任社長的台北《人民導報》，敢冒當政者的大不韙，揭露黑暗統治，報導內戰真相，替同胞百姓說話，而深遭當局之忌。宋先生學識淵博，一生為國家、民族和家鄉父老漂泊奮鬥，遇害時年僅四十

五歲。這樣一位台灣菁英竟遭不幸，使廣大台胞至今悲憤難消。

宋先生被綁架後，區嚴華女士隨即致函地方當局，陳述宋先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左右，被乘坐掛著〇二〇三九號車牌和七十三號特別通行證汽車的六名便衣人員拘捕而去，要求查明開釋。三個多月後，台「警備司令部」做出答覆，矢口否認逮捕過宋先生，甚至說連通緝名單也未被列入；聲稱所指出的車牌號為某商人所有，特別通行證號為某銀行之車所用。他們把一切責任推卸得乾乾淨淨，其實不過是極其拙劣的抵賴而已。

據當時報載，宋斐如被當局誣為「奸偽要角」，冠以兩大「罪狀」：一是「陰謀叛亂首要」；二是「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這兩大「罪狀」有無事實根據和是否能構成犯罪暫且不論，既然加以如此嚴重罪名，為何既不通緝又不逮捕？這豈非自相矛盾？當時全島正實施「戒嚴」，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有多人公然乘汽車從家裡把宋先生抓走，除了特務分子，誰又能如此橫行霸道、膽大妄為？至於車牌和特別通行證的所屬人，倘確如「警司」的解釋，不過是證明特務機關以假冒的牌、證隱匿身分，以逃脫罪責。這種種掩飾和托詞，對密捕暗害宋斐如的事件，只能是欲蓋彌彰。

區嚴華女士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被捕，經連續五天五夜的疲勞審訊後，於一九五〇年一月被扣上「匪諜」的莫須有罪名，慘遭殺害。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隨意抓人和濫施刑訊已司空見慣，無論是否被屈打成招，只要用「匪諜」帽子一扣，想殺就殺，誰敢出來問個明白？何況宋家只剩了一個還不懂事的孤兒呢？

四十多年過去，台灣島世道大變。在為二·二八起義參加者平反昭雪、為白色恐怖時期含冤者招魂的強大輿論壓力下，台當政者一再表示要「走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陰影，撫平事件造成的創傷」。但在最近台官方公布的「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蹤名單中，

宋妻如仍被列為「失蹤」，可見台當局仍企圖繼續掩蓋事實真相。對這樣的大案要案都如此諱莫如深，又怎能對所有受害者公正進行「受難者評定」和「撫慰賠償」呢？至於白色恐怖時期涉嫌「叛亂」被處死者，據估計有三、四千人，申冤更屬遙遙無期了。

今年二月，台當局一位高官對要求重新調查二·二八事件的答覆是：「應以慈悲心及向前看的態度，面對此一不幸事件。」大慈大悲是佛祖之心，真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確有此心，宋妻如失蹤之謎就應立即大白於天下，並平反昭雪、妥為善後。所有冤案都照此辦理，受難受害者及其家屬自然會回過頭「向前看」。否則，頭怎能回的過來呢？

原載一九九四年《台聲》雜誌第六期

憶宋斐如先生

戴青田

編者按：作者係當年台灣〈人民導報〉記者、總編，此詩由作者兒子戴高爾提供。

一

閱牆驚作天涯客，
孤島飄蓬誰肯收？
相識自怪今生晚，
逢君如遇韓荊州。

二

棕影迷離白雲悠，
當年俊傑幾人留？
思君難忘刀劍處，
長哀不忍過荒丘。

訪宋斐如副處長

丁文治

他說：「過去日人在台所施的『皇民化』教育，現在業已證明是全失敗了！」

〔本報專訪〕記者此次往草山參加「全省教育行政會議」，首次晤到教育處宋副處長。宋副處長著西裝，戴金絲框眼鏡，待人接物，一團和氣。講起話來很有條理，通常在講話中停一小節，使聽的人有一點思索和回想的餘地。宋副處長首次和記者見面，他給記者的印象，完全是一位溫文爾雅，標準教育家的風度，在宋副處長的身上，我們不能看到絲毫官場中常有的官僚習氣。

「全省教育行政會議」閉幕後，宋副處長於本月二日蒞臨台中視察，宋副處長的事務很忙，他除了須視察本市的各個中等學校以外，還得出席各種座談會、茶話會，其主旨在宣達省方所確定的教育方針，並報告此次教育行政會議中所議決的幾項重要案件，同時更重要的是「聽取當地各界名流對教育方面的意見」。宋副處長有時要忙到深夜才能夠休息，就在宋副處長這樣的事務繁忙中，記者也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和他會晤，而且作了一次超過一小時以上的長談。

記者首先詢問宋副處長對於視察本市教育的感想。宋副處長約略遲疑了一下，然後回答說：「不但台中，就是整個台灣，教育事業的普及，是頗足稱道的。在戰爭期中，台中各校沒有受到任何炮火的摧殘，而且省方派來台中主持教育事業的人，如周校長、金校長、余校長、薛校長等，又都是國內知名的教育家，所以對台灣目前的教育事業，

就一般來講，是頗足令人滿意的。」他略為間斷了一下，然後說：「我這一次到台中來，當地有很多名流對我貢獻了不少關於改進教育的珍貴意見，等我回台北後，我決定把這些意見，代為轉達省方，台中一般人士對教育事業等的熱心與協力は頗值得感謝的。」

我們的話題轉到全省教育行政會議方面，我問宋副處長對這一次會議的看法如何？他笑了，他似乎在說，站在我的立場，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不過他終於用一種嚴肅的口吻說：「的確，這一次全省教育行政會議的成就不能說不大，它在台灣的教育史上，將要占據劃時代的一頁，因為在這一次會議中通過了更改學制和改用國定本的兩項議舉，這將是台灣教育徹底「中國化」的一個轉折點」。

隨後他並若有所感的說：「一般人的看法，尤其是省外不明瞭台灣實際情形的人，他們都認為台灣什麼東西，都有其特殊性，所以應付這些特殊性的東西也都得用特殊的方法，這真是一種要不得的錯誤觀念。」他說：「台灣有什麼特殊呢。台灣同胞都是黃帝子孫，他們每一個人的血管裡都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宋副處長的話說得很激動，他的拿著一只水果的手有點顫抖。

我們不願意把討論的範圍擴大。我問宋副處長對日本時代的教育方針，觀感如何。提到這一點，他的話像決了堤的潮水一樣，滔滔不絕的往下流。他從日本人在台灣所推行的「差別教育」，說到「皇民化教育」。最後他用一種快愉的口吻下了一個結論：「日本的這種教育方針是失敗了，現在就連他們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這樣承認。」他說：「這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來說，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初，他們決定了在台灣推行一種差別教育，他們把日本人、漢人和高山族土人，分成三種階級，而分別推行三種不同的教育。這是一種變相的愚民政策，他們使同胞很少接受中等教育的機會，他們想永遠把同胞當奴隸看待。所以當時的青年學生，欲求深造，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投到祖國的懷抱裡去，

一種就只有到日本去。但當時因為交通經濟等種種原因，結果還是以到日本去求深造占多數。這種差別教育推行的結果，在他們日本人看來也許是認為很成功的，但卻因此養成了台胞一種很濃厚的民族思想。台灣同胞不願意再做奴隸，他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距今二十餘年前，台灣便發生一次規模很大的請願運動，這是一種民族鬥爭的雛形，這一運動的展開，迫使日本人不得不對台灣同胞重新估價，不得不改善其在政治、經濟、教育上的許多差別待遇。尤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數年，日本人便極力在台灣推行所謂「皇民化」教育，這是日本時代台灣教育事業的第二個階段。他們強迫每一個台灣同胞都更改為日本姓名，他們希望每一個同胞都忘去了祖國，都變成他們大和民族的一份子，但日本人的這種教育方針是更失敗了。」宋副處長舉了一個例說：「在被強迫更改姓名的時候，台胞中有很多姓「林」的都自動改成了「小林」，這表示他們對於祖國的依戀，但即使這樣，這種「小林」仍舊有台灣「小林」和日本「小林」之分的，台灣同胞永遠是黃帝子孫，他們永遠不能變成大和民族。日本人過去禁止台胞使用台灣話，但台灣話到現在為止，依舊在台灣的一個角落裡被保存著。這說明了台胞過去雖在日寇壓迫之下，但對祖國的向心力並不會有過絲毫的更動，同時這也說明了我中華民族的偉大之處。」

「現在台灣光復了」，宋副處長在休息了一分鐘之後，繼續說下去：「我們對於日本過去推行「皇民化」教育的遺毒，固然要加以肅清，同時對於那種差別教育制度也必須有一個徹底的更改，我們對於階級和種族的觀念也必須完全打破，過去日本人對高山族同胞推行所謂番民教育的，我們要廢除這種方法，我們要使得高山同胞和台胞有同一的受教育的機會。」

宋副處長繼續從台灣目前的教育現況，談到省教育當局對發展本省的教育計劃。談話的時間已經很長，宋副處長還有很多重要的公務須要處理，為了不更多耽誤他寶貴的

時間，記者便告辭退出。

在歸途中，我在默默的想著如何使台灣教育徹底「中國化」的問題。

原載一九四六年□月四日台灣〈和平日報〉

憶台灣民主戰士宋斐如先生

戴青田

劉思慕同志在〈馮玉祥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刊《團結報》五八一號第四版），曾提到台灣籍著名民主戰士宋斐如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勾起我的回憶。宋先生不幸為國捐軀已有三十五年了，至今很少有人報刊上提到他。我現在寫這篇回憶文章，也算是一點小小的紀念吧。

我跟宋先生相處，是從抗戰勝利後，他回故鄉在台北創辦《人民導報》開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那時，內戰槍聲已經響起來了，舉國騷然。我因在上海給鄭振鐸先生編的《民主》周刊寫了兩篇文章，惹出了麻煩，經開明書店總編輯郭紹虞先生介紹，到台灣嘉義女子中學當教員。後來才到宋斐如先生主持的《人民導報》當記者。可是只跑了幾天新聞，趕上總編輯得病，須長期休養，宋先生就把總編輯的擔子壓在我的肩上了。那時我才二十七歲，還是個學識淺薄、歷事不深的人；雖然在新聞界作過幾年事，比起著名老將來，只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卒而已。宋先生卻敢委以重任，把我當棟樑使用，真可謂「魄力非凡」。

宋先生是個有大作為的人；是五四以後，由台灣愛國青年中成長起來的傑出人物之一。他早在北京大學求學時，就在一條小胡同裡創辦了著名的亞洲書店，在揭露日本侵華方面盡過不少力量，是國際上有名的日本問題專家。抗戰勝利後，家鄉父老對他期望甚殷。當他久別歸來，一時轟動全島，民眾扶老攜幼，都從老遠趕到台北機場來歡迎。他下飛機第一句就說：我是回來為家鄉服務的，不是來作官的。

當時在台灣主政的陳儀，想借重他的聲望裝飾門面，請他當教育處副處長。他表面上雖不得不去應付差使，但把全部精力放在《人民導報》上。

當時台灣有三大報鼎足而立。堂而皇之的《新生報》，是陳儀的宣傳工具，日銷二十四萬份，規模最大，條件最好。其次是《中外日報》，是財閥林宗賢出錢辦的，銷數雖然不多，也沒有什麼特色，但闊氣得不得了。只有《人民導報》最窮，顯得最破落。宋先生囊空如洗，辦報全是他由民間湊的錢。報社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他在台北借了一座臨街的舊樓房。那木板樓梯已經年久朽爛，不堪負重了；一有人登臨，就連聲嘆息地咯吱咯吱響一陣。而且也沒有印刷設備，得委託離五、六里遠的一家印刷廠代印。因為是平版印刷，僅日銷萬份就忙得不可開交。

宋先生辦報的口號是「一切為人民」，《人民導報》成了民眾唯一的喉舌。雖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就是不誣稱中共為「匪」，凡是遇「中央社」電訊中稱「匪軍」的字樣，一律改稱「共軍」。另外還有一個特點，是對貪官揭得猛。那時台灣民眾對貪官諱稱為「中山袋」，意思是說，中山裝的衣袋很大，正好便於貪官來裝民脂民膏。於是流行起來，「中山袋」就成了貪官的代名詞。《人民導報》幾乎天天闖禍，除非由宋先生頂著，能勉強出版，不然三天也挺不過。宋先生不屈不撓的精神，能感動所有員工在極艱苦的生活中都齊心跟著他奮鬥。為了節省開支，施行「半薪制」就是一例。這也是《人民導報》與眾不同之處。規定凡是台灣籍人，不論職位高低，連宋先生也在內，只能實得工資的半數。只有我一個是北方人，不在此限。別看那裡的實得工資比別處低一半，員工們卻沒有暗自叫苦或工作懈怠的，都是精神抖擻，幹得很歡。於是就有這樣的謠言，說宋先生跟共產黨有關係，用「半薪制」辦報，就是從共產黨那兒學來的辦法。

到一九四七年初，宋先生被迫辭去教育處副處長職，以全部精力辦報。每天到報社，

他總是笑容可掬，根本沒把前面會有什麼險事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忙到十點多鍾他還不走，編輯部收到最後一批電稿，發現有一條消息說，華北戰況緊急，共軍撤出了張家口。他主張寫篇社論，指出共軍撤離的意義，強調勝敗兵家常事，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免台灣民眾悲觀。沒想到，緊接著就捲起了二·二八大風暴，素孚眾望的宋先生再也不能分身到報社來了。一直到三月中旬報社被封，我也沒再見到他。危難中，我躲到朋友家住了些日子。隨時打聽宋先生的消息，但總是傳說紛紛，凶多吉少，很可能是犧牲了。至四月間我不得不逃出台灣。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深沉懷念宋先生，總覺得心頭有一種說不盡的哀情。但又覺得他似乎還活著，不定哪天會在什麼地方遇到他……。

原載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九日〈團結報〉

宋斐如殉難經過

宋洪濤 劉昌智口述

編者按：題目係編者所加，宋洪濤係宋斐如長子。劉昌智為宋斐如的司機。

宋洪濤口述：

家父宋斐如民前九年七月八日生於台灣台南縣仁德鄉，原名宋文瑞，早歲負笈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後，監委白鵬飛介紹任教於北平大學，並擔任副委員長馮玉祥之社會科學研究室主任。其後任中山文化教育館正研究員，派赴日本工作，並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深造；惟心直口快，當面指正別人，不會圓滑留人顏面，易得罪人。

抗戰前返國，任職於軍事委員會設計委員，兼任中央幹部訓練團指導員等職，熱心黨國工作。台灣光復，家父返台被任命為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因鑒於台灣淪日五十載，一切與祖國隔閡，尤以文化教育為甚，因而利用公餘，並經簽奉長官陳儀核准，創刊《人民導報》，惟後因與林茂生的《民報》競相以揭露社會黑暗面，抨擊時弊，因而頗受當局矚目。

民國三十六年元旦，時值中華民國憲法公布及《人民導報》成立之一周年，家父為此發表《本報創刊周年紀念感言》，因而受到更大壓力，於二月二十一日，副處長官位不保，接「免職」另候任用之命令。

家父曾發起募款修建介壽館（學生獻金部分，業經募足金額），且在二·二八事件絕未參加任何活動，而所寫作文章及報紙等亦於事件中停刊。於事件中除應參謀長柯遠

芬召見，及拜訪大安區長，於十日晚與連秘書長（省參議會）通電話外，均居家思過，並未離開家門半步。

三月十一日下午時，突有便衣人員六人，持槍乘坐車牌號碼〇二〇三九及特別通行證七十三號汽車到宅，將家父拘捕。後來家母區嚴華（任職於長官公署法制室）透過各種管道加以營救，均無法如願，住宅（報館）亦被查封。

家母區嚴華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亦以參加共產黨罪名被槍決，我不得不輟學當學徒，無「厝」可住，有時就在火車站或新公園度夜。光復當初，台籍最高階公務員的下場，竟是一家破人亡，真是令人不禁唏噓！

劉昌智口述：

本人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戰爭結束二個多月後返回台灣，一道被徵調至南洋服役之本省同胞，對於戰後祖國遣返作業之遲緩，以及糧食供應之短缺本就普遍不滿，加上回到故鄉後，發現來自戰勝的祖國國軍毫無軍紀、胡作非為、強暴婦女、儀容不整，與戰敗的日本軍人相較甚感「漏氣」，因此我對國軍印象惡劣到極點。

民國三十五年農曆年後，我前往長官公署應徵司機，被分派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座車司機，時值年輕力壯，故尚能勝任每天長時間之駕駛工作。

宋先生日語並不很流利，大多用北京話和閩南語與人交談，與當時政壇聞人黃朝琴、連震東、林茂生、王添燈……等人頗有交情，惟與陳儀長官死對頭。宋先生創辦《人民導報》批評時弊，反映社會真相，深獲讀者好評，惟頗受當局壓力，當然陳儀視之為眼中釘。最後陳問宋要繼續辦報或擔任教育處副處長，二擇其一，宋只好選擇前者。

宋辭職一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駕其座車載送報社記者至台北圓環附近密集採訪新聞，洞悉被取締私烟女販林江邁與當地角頭老大同居，以致林女遭專賣局緝私

員傅學通取締及「欺侮」時，星星之火立即燎原，加上角頭老大弟弟陳文溪遭傅學通有意或無意開槍擊斃，群情更為激憤。

二月二十八日當天整座台北城，鑼鼓喧天。後來因專賣局對面城門及長官公署，以機關槍掃射遊行民眾，造成更多的死難，一時秩序大亂，場面失控。凡是穿著長袍馬褂者一律被毆打得遍體鱗傷，抱頭鼠竄。許多客家人遭受無妄之災，新竹縣長朱文伯北上公幹，亦莫名其妙遭圍毆，座車被掀倒焚毀。另外國大代表謝娥味著良心上廣播電台說謊話，其位於延平北路住家遭到群眾焚毀不少傢具。

我的主人宋先生在三月十一日中午時分被當局派員拘捕，其妻區嚴華透過各種管道極力營救，仍「回天乏術」，迄今，屍首不知在何方。同時位於延平南路的報社亦被查封，迄今，人去樓空，尚由警備總部人員代管，個人認為此乃人民財產，理應儘早歸返宋氏家屬才對。

至於我本人在事件後惟恐遭受波及，亦遠避鄉下近半年之久，後來至警總應徵參謀長座車司機，派出所警察始未再上門找麻煩。

原載一九九三年二月台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四期

宋斐如著作年表

梁汝雄 張雅芳整理

編例：

- 一、本年表基本上以宋斐如著作初版的時間先後為序；
- 二、除「宋斐如」、「斐如」不加署名外，其他均署以筆名或曾用名；
- 三、作品體裁，除注明者，均為論文。

一九二五年

〈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

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台灣民報〉第七十七期

署名：宋文瑞

一九二七年

〈敬神嗎？民族自殺！〉

載一九二七年三月〈少年台灣〉創刊號

署名：奔流

一九二九年

〈高阜素之的資本主義功過論〉（譯文）

原作者：（未署名）

載一九二九年七月《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四期

《歐美聯邦計劃及其經濟的背景》（譯文）

原作者：平尾彌五郎

載一九二九年《三民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二期

一九三〇年

《日本金解禁與中國》

載一九三〇年一月《新東方》第一卷創刊號

署名：沉底

《東方各民族的轉動及其現狀》

載一九三〇年一月《新東方》第一卷創刊號

署名：沉底

《印度問題之史的考察與印度解放運動》

載一九三〇年三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三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譯文）

作者：山川均

載一九三〇年二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二期
署名：蕉農

《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
載一九三〇年七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五、六、七期合刊
署名：沉底

《安南獨立運動的研究》（譯文）
載一九三〇年八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八期
原著者：滿川歸太郎
署名：蕉農

《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衝突》（譯文）
載一九三〇年九月《新東方》第一卷第九期
原著者：泉哲
署名：沉底

《土地國有論》（譯述）
載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民半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
原著者：安部磯雄
署名：宋蕉農

〈台灣民眾的悲哀〉（譯著）

一九三〇年九月北平新亞洲書局出版

原著者：山川均

署名：宋蕉農

〈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載一九三〇年十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期

署名：沉底

〈「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動〉

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下滿廿年的朝鮮〉

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期

署名：沉底

〈日本資本在台灣的發展〉（編譯）

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

署名：永瑞

〈日本無產政黨研究〉

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新東方〉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

署名：蕉農

一九三一年

〈日本新內閣前途的暗淡〉

載一九三一年一月〈新東方〉第二卷〈周年紀念特刊〉

署名：沉底

〈日本帝國主義的危機〉

載一九三一年一月〈新東方〉第二卷〈周年紀念特刊〉

署名：沉底

〈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

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第二卷〈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署名：蕉農

〈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

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第二卷〈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署名：沉底

〈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

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新東方〉第二卷〈最近遠東問題專號〉

署名：劍華

〈羅馬尼亞的土地政策〉（譯文）

載一九三一年〈朝大季刊〉

原著者：澤村康

一九三二年

〈普魯士的國內殖民政策〉

載一九三二年〈三民半月刊〉第七卷第五、六期

〈上海事變的檢討〉

載一九三二年四月〈新東方〉第三卷〈二周年紀念特刊〉

署名：沉底

〈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

載一九三二年四月〈新東方〉第三卷〈二周年紀念特刊〉

署名：蕉農

〈中俄復交問題〉

載一九三二年七月〈新東方〉第三卷第七期

署名：沉底

〈東方民族運動與中國西北開發——帝國主義侵略的新轉變與東方民族運動的新階段〉

載一九三二年七、八月〈新東方〉第三卷第七、八期

署名：沉底

〈日本帝國主義論——滿蒙問題之一考察〉（譯文）

載一九三二年七月〈新東方〉第三卷第七期

原著者：高橋正雄

署名：蕉農

〈印度革命新趨勢之片影——未來印度的指導者芮魯〉（譯文）

載一九三二年八月〈新東方〉第三卷第八期

原著者：印人薩巴瓦魯

署名：蕉農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新東方〉第三卷附錄

署名：沉底

〈土地政策研究〉（著作）

北平西北書局發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

〈統制經濟的基礎知識〉（譯著）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版

與盛導吾合譯

一九三四年

〈世界經濟現狀及其將來〉

載一九三四年六月《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一號

一九三五年

〈計劃經濟之理論的檢討〉

載一九三五年一月《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

〈現代獨裁政治的分析〉

載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冬季號

一九三六年

〈日本社會教育的批判〉（譯文）

原著者：賴阿佐夫

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月《時事類編》第四卷第二十、二十一期
一九三七年

《日本戰時經濟編製中的原料問題及其政策的動向》
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春季號

《三木清論》（譯文）

原著者：戶阪潤

載一九三七年二月《時事類編》第五卷第四期

《日本憲法論》（譯文）

原著者：瀧本英雄

載一九三七年二、三月《時事類編》第五卷第四、五期

《日本思想界及思想家》（譯文）

原著者：戶阪潤

載一九三七年六月《時事類編》第五卷第十一期

《日本侵略戰爭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載一九三七年九月《時事類編》特刊第一期

〈九·一八六周年〉

載一九三七年十月〈時事類編〉特刊第二期

〈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九·一八而作〉

載一九三七年十月〈時事類編〉特刊第二、三期

〈抗日必勝的理論根據——封建的軍事性的日本帝國〉自序

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時事類編〉特刊第四期

〈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著作）

抗戰叢刊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一九三七年十月初版

〈九國公約會議與我們應有的鬥爭〉（著作）

抗戰叢刊中山文化教育館編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日本國家機構略解〉（編譯著作）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日本工業經濟危機論〉（著作）

祖國書店

一九三八年

〈新年·新階段·新覺悟〉

一九三八年一月〈抗到底〉第一期

〈日本鐵蹄下的東北〉（著作）

戰時讀物編譯社出版、發行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版

〈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

載一九三八年一月〈民族戰線〉第八期

〈一年來的日本〉

載一九三八年一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一期

〈日本軍事法西斯論〉

載一九三八年一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二期

〈最近日寇的外交動向〉

載一九三八年二月〈時事月報〉第一八卷第三期

〈中國抗戰與日本民眾反戰〉

載一九三八年三月《抗到底》第六期

《日寇對我侵略戰爭中的勞動問題》

載一九三八年三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七期

《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譯著）

原著者：勞動調查部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版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

載一九三八年四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八期

《冀南豫北游擊隊英勇抗戰的一斑》（散文）

載一九三八年四月《抗戰》三日刊第六十七號

《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剖述》

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日本右翼運動最近的狂態》

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二卷第一期

〈日蘇最近的糾紛〉

載一九三八年五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十期

〈日本侵略戰爭中工業危機的發展〉

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二卷第二期

〈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與軍部法西斯政府的確立〉

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中蘇文化〉抗戰特刊第二卷第三期

〈近衛內閣改組與今後動向〉

載一九三八年六月〈時事月報〉第十八卷第十一期

〈美國新經濟恐慌對於日本的影響〉

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世界知識〉第七卷第十一期

〈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著作）

世界知識戰時叢刊 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版

〈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載一九三八年七月〈世界知識〉第八卷第二期

〈抗戰以來日本問題書籍總評〉

載一九三八年七月〈戰時文化〉第一卷第四期

〈戰時日本〉創刊詞

載一九三八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一期

〈日本反戰運動的國際化〉

載一九三八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一期

〈戰時日本社會危機的發展〉

載一九三八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一期

〈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

載一九三八年一〇年〈世界知識〉第八卷第七期

〈七年來的教訓與進步〉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散文）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二、三期合刊

〈日本軍隊的莫斯科〉

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

〈第四期抗戰的敵我情勢〉

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九年

日台韓反戰與〈香港日報〉

載一九三九年一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五期

〈日本進攻英國嗎？〉

載一九三九年一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五期

〈日本資本主義論戰〉（譯著）

原著者：內田穠吉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一九三九年二月

〈日本再度向蘇聯「屈膝」〉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日本排英運動〉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蘇日漁約糾紛的前前後後〉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勞動節寄日本勞工〉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戰時日本研究會財務報告〉

載一九三九年三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一期

〈日本工潮新階段的開始〉

載一九三九年四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二期

〈「日本問題」信箱〉

載一九三九年四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二期

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

載一九三九年四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二期

〈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二元性〉

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日本為什麼沒有參加德意同盟〉

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日本農業經濟的特質〉

載一九三九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三期

〈德意軍事同盟與日本〉

載一九三九年六月九日〈廣西日報〉

〈莫洛托夫的演說與遠東〉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四期

〈日本貨幣政策的新攻勢〉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四期

〈「日本問題」信箱〉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四期

〈美蘇親善與遠東的關係〉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

〈日軍南侵北攻下的新出醜〉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

〈「日本問題」信箱〉

載一九三九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五期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壯舉〉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

〈日本軍事代表團赴德意〉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

〈二年來沒落過程上的日本內政〉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二卷第六期

〈美國不能坐失制裁日本的機會〉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一期

〈美蘇關係的進展與遠東〉

載一九三九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一期

〈歐戰與中國〉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美日鬥爭的新開展〉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蘇德協定與日本〉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美國排日運動的概況〉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日本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意義〉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日本對美軟硬並施〉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歐洲大戰與日本〉

載一九三九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

〈日本帝國本質論——軍閥官僚統治的經濟基礎〉

載一九三九年一月〈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五期至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三卷第三期

〈美日談判的前途〉

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

〈日本外交往何處去——親英美可能嗎？〉

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

〈日本外務省派閥鬥爭及其背景——戰時鬥爭激烈化的秘密〉

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

〈日本最近對美外交的剖述〉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世界知識〉第十卷第五期

〈日蘇談判及其問題〉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世界知識〉第十卷第六期

〈汪逆兆銘的悲哀〉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日本急於與蘇聯談判的目的〉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署名：端華

〈美國孤立派波拉先生的錯覺〉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日本軍部行動派最近的外交主張〉（編譯）

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戰時日本〉第三卷第六期

一九四〇年

〈泥塘中的日本內政〉

載一九四〇年一月〈世界知識〉第十卷第七期

〈汪逆賣國與我們的覺悟〉

載一九四〇年四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

〈提防日閥製造「東方慕尼黑」的陰謀〉

載一九四〇年四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

〈戰爭第四年日本政治總檢討〉

載一九四〇年四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一期

〈日本戰時外交內幕〉（著作）

時代書局出版 一九四〇年四月初版

〈戰時日本·渝版發刊詞〉

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論太平洋集體安全問題〉

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美英不能再姑息日本〉

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評日人「世界四分論」〉

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日寇南進與對華策略——日寇結束中日戰爭三部曲〉

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二期

一九四一年

〈歡迎居里先生與中美合作〉

載一九四一年二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五期

〈日寇南進呢？西進呢？〉

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日寇東西圈外的圈圈〉

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日寇南進的財政狀況〉

載一九四一年三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六期

〈戰時日本·卷頭語〉

載一九四一年五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一期

〈再論日寇南進呢？西進呢？〉

載一九四一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二期

〈日寇欲勾結德國平分世界〉

載一九四一年六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二期

〈日本半封建的農業經濟——解開日本帝國特質之謎的一把鑰匙〉

載一九四一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至一九四一年六月第五卷第

二期

〈德國侵蘇與遠東前途〉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

〈本多與汪逆的魔舞〉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

〈日寇通貨膨脹的新發展〉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

〈日寇的物產及動力總剖述〉

載一九四一年七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三期

〈歡迎拉鐵摩爾先生〉

載一九四一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四期

〈中蘇美英的共運與協力〉

載一九四一年八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四期

〈日寇戰時的死亡問題〉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地黨政月刊〉創刊號

〈正義的和平與勝利的和平〉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五期

〈福建新政與抗戰建國〉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五期

〈日寇特殊經濟基礎上的政治和社會〉

載一九四一年九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五期

〈美日談判的展望〉

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六期、第六卷第一期合刊

〈日本新動向中的舊動向〉

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六期、第六卷第一期合刊

〈日本的欽定憲法與陰性議會〉

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戰時日本〉第五卷第六期、第六卷第一期合刊

一九四二年

〈讀丘吉爾首相的演說〉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六卷第二期

〈英美戰略上當務之急〉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六卷第二期

〈論東方民族聯盟組織〉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六卷第二期

〈日本特殊選舉制與官僚政黨〉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戰時日本〉第六卷第二期

〈台灣農民的慘痛〉

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六日〈益世報〉

〈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

載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新華日報〉

〈毋忘台灣〉

載一九四二年六月一七、十八日〈廣西日報〉

〈太平洋戰略論〉（編譯著作）

原著者：池欽崎忠孝 伊藤正德等人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四二年七月

〈東條內閣內外動向的檢討〉

載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廣西日報〉

一九四三年

〈日本戰時外交及其動向〉

載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廣西日報〉

〈日本的軍事動向與我們的警惕〉

載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廣西日報〉

〈論太平洋集體安全與中國的關係〉

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政治的衰落及其展望〉
載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十二日〈廣西日報〉

〈如何收復失地台灣——血濃於水 台灣必須收復〉

載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一日〈大公報〉

〈太平洋戰爭中的台灣〉

載一九四三年五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日本人口問題與移民政策〉

載一九四三年五月〈中國農村〉戰時特刊第八卷第十一期

〈日本最近軍事動向〉

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廣西日報〉

〈對日集中進攻罷！〉

載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廣西日報〉

〈日本勞力資源的悲哀〉

載一九四三年八月六—八日〈廣西日報〉

〈蘇日會馬上爆發戰爭嗎？〉

載一九四三年八月〈半月文萃〉第二卷第二期

〈汪偽「參戰」前後的乖謬〉

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十八日〈大公報〉

〈日本產業統制的三種制度〉

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廣西日報〉

〈日本糧食增產政策的批判〉

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五日〈大公報〉

〈日寇的「超重點」產業〉

載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中小工業的沒落〉

載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金融統制的剖述〉

載一九四三年十月三日〈廣西日報〉

〈美國戰時勞動力政策〉

載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廣西日報〉

〈日寇空軍現勢研究〉

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廣西日報〉

〈德國如何搜括勞動力〉

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日〈力報〉

〈日寇的悲鳴——所謂「一億國民走向第一線」〉

載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廣西日報〉

〈台灣在急激演變中〉

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廣西日報〉

〈太平洋戰爭兩年的日寇動向〉

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廣西日報〉

〈從太平洋中路進攻日寇——先射日本的阿溪里足踵的台灣〉

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十五日〈廣西日報〉

〈日寇國民政治的沒落——國民政治組織的糾紛〉
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半月文萃》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四四年

〈各國勞動力統制政策〉

載一九四四年一月《新中華》復刊第二卷第一期

〈美國雄厚生產威脅下——日本船運的苦難〉

載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十一日《廣西日報》

〈日本戰時議會本質的檢討〉

載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二十五日《廣西日報》

〈日寇一年來的決戰設施〉

一九四四年三月《新中華》復刊第二卷第三期

〈日本亞洲獨霸戰〉（著作）

三文出版社發行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版

〈論台灣的革命戰略〉

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二十一—二十二日《大公報》

〈日寇最近的鋼鐵業與造船業〉
載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廣西日報〉

〈日本最近飛機生產的檢討〉

載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二十四日〈大公報〉

〈日本如何決戰〉（著作）

戰時日本研究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七月初版

一九四五年

〈日本失敗的實況〉

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生報〉

〈民族主義在台灣〉

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政經報〉第四期

一九四六年

〈人民導報〉發刊詞

載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人民導報〉

〈如何鑷除日本軍權政治〉

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八、九日〈人民導報〉

〈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播講）
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十二日〈人民導報〉

〈中韓兩民族的關聯性〉（日文）
載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二十四日〈人民導報〉

〈日本軍權政治終結與日本人民應有之努力〉
載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導報〉

〈論台灣基本人權——並祝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人民導報〉

〈國家為什麼要保障人民自由〉
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導報〉

〈台胞應踴躍參加師範教育——為台灣師範教育宣傳周而作〉
載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人民導報〉

〈「台灣日」的回憶〉
載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人民導報〉

〈台灣民主國對日抗戰〉
載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人民導報〉

〈反抗滿清統治的暴動〉
載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導報〉

〈我們要溶化在一起——五月十二日在省訓團精神講話〉
載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導報〉

〈日本失敗的教訓——八月十五日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記錄〉
載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導報〉

〈孔夫子的偉大〉
載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新生報〉

〈報人的使命——為紀念記者節而作〉
載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導報〉

〈台灣教育設施的現階段——全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會議閉幕感言〉
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導報〉

〈談談台灣農業的改進——祝中華農學會成立〉
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導報》

〈推行合作事業的檢討——並祝台灣合作事業健全發展〉
載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人民導報》

〈成功之道——在成功中學訓話記錄〉
載一九四六年十月八、九日《人民導報》

〈國父與國慶〉
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人民導報》

〈回顧與希望〉
載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導報》

〈學生深造的第一步——延平學院訓話記錄〉
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人民導報》

〈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
載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人民導報》

一九四七年

〈本刊創刊周年紀念感言〉

載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人民導報〉

〈如何推進台灣生產建設——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省訓團對全體學員精神講話〉
載一九四七年一月九、十日〈人民導報〉

〈台灣心理建設問題——三十六年二月八日對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
載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導報〉

以下著作、譯著出版日期、出版社或刊載期刊不詳：

〈政治的社會基礎〉（原著者：大山郁夫，與鄭應瑞合譯）

〈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譯著）〉（原著者：李雅矢謙克）

〈戰爭財政論——如何籌劃戰費〉（編譯）

載〈廣東省銀行季刊〉

〈敵寇軍事南進的陰謀〉

載〈西南青年〉第十二期

《日本果非侵外則不能存立嗎？》

《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方法》

《美日戰爭論》（譯）

《台灣民眾運動史論》（許地山作序）

《封建的軍事的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主義研究》

《日本戰時政治內幕》

《台灣問題與台灣革命》

《日本帝國本質論》

《工業經濟危機論》

《日本近世產業史論》

《朝鮮問題的真髓》

《日本的台灣土地政策》

《世界經濟會議及其後世界經濟的動向》

宋斐如生平簡介

翁曉波 梁汝雄

宋斐如，原名文瑞，字斐如，曾用名宋瑞華、宋端華，筆名：蕉、蕉農、宋蕉農、沉、沉底、永瑞、劍華、奔流等。生於一九〇二年農曆七月初八，台灣省台南縣仁德鄉人（日據時期家庭住所為台南廳文賢里大甲庄二五二番地），祖籍福建同安。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變中，遭當局秘密綁架、殺害。時年四十五歲。

一九二二年三月，畢業於（台北）台灣商工學校（現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翌年九月毅然奔赴祖國大陸，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一九二五年，發表〈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刊登在〈台灣民報〉第七十七期上）文章，反駁王悅之氏關於台灣來京的留學生只不過是「騙騙父母之金錢，到北京漫遊而已」的不實之說。在校期間與張我軍、洪炎秋等進步台灣青年學生創辦〈少年台灣〉月刊，任該刊後期主編，向台灣島內介紹、宣傳祖國狀況，「架起台灣與大陸間資訊傳播的橋梁」。

一九三〇年一月與劉思慕、呂振羽、夏次叔等成立「東方問題研究會」，創辦並主編會刊〈新東方〉月刊，研究東方問題，「團結融合東方各被壓迫民族，以共籌解決整個東方問題的方略」，一九三〇年九月畢業留校任教。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發表了〈「德化政策」下的台番暴動〉、〈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等二十多篇文章及近十篇譯文，以大量的事實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占我東北及台灣，企圖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滔天罪行。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追隨愛國抗日將領馮玉祥赴察哈爾抗日，負責抗日宣傳工作，擔任泰山讀書研究室主任，組織進步教授、學者（李達、陳豹隱、陳定民、賴亞力、范樞銘、李季谷、吳祖湘等）為馮將軍及其部屬講授唯物辯證法、世界經濟、《資本論》、日語，介紹世界反法西斯形勢及日本國情，報告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等等。期間曾掩護地下工作者劉思慕夫婦脫險泰山，擔任孫科主辦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日本問題研究員。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前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深造，潛心研究日本的政治、經濟及外交政策。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宋斐如毅然返回祖國投身抗日救國運動，發動民眾，宣傳抗戰。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漢口發起組織「戰時日本問題研究會」任總幹事，研究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創辦《戰時日本》期刊，擔任主編。為該刊撰稿的有：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郭沫若、張友漁、張鐵生、許滌新、劉思慕、李純青、李友邦、謝南光、謝東閔等，還有日本、韓國等國際反戰人士鹿地巨、塩見聖策、青山和夫等等。國民黨政要如馮玉祥、孫科、梁寒操等的文章也常見於報端。隨著國土的淪陷，該刊先後轉移到廣州、桂林、昆明、重慶等地堅持出版，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創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終刊，歷時三年半，堅持出版了六卷共三十二期。

抗戰期間，出版專著《戰時日本工業的危機》、《九國公約會議與我們應有的鬥爭》、《日本鐵蹄下的東北》、《日本戰時外交內幕》、《日本亞洲獨霸戰》等十六本；譯著《日本人民統一戰線的發展》、《日本資本主義論戰》、《太平洋戰略》等八本。有關的抗戰論文甚多，除了在其主編的《戰時日本》上發表了近百篇之外，還在其他抗戰刊物《時事類編》、《中蘇文化》、《時事月報》、《世界知識》、《東方雜誌》、《抗到底》、《新中華》、《力報》、《新華日報》、《半月文萃》等發表了大量研究日本、宣傳抗戰的論文，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一九四一年二月，與台胞愛國抗日將領李友邦、謝南光發起組織「台灣革命同盟會」，任常委兼執委。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在重慶舉行的「台灣光復運動宣傳大會」上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發表題為〈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的演說，明確指出「六百萬台胞只要求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表達了台灣同胞渴望回到祖國和光復台灣的決心。

一九四三年八月，任廣西日報主筆。期間，在〈廣西日報〉、〈大公報〉、〈西南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毋忘台灣〉、〈論台灣的革命戰略〉、〈如何收復失地台灣——血濃於水 台灣必須收復〉等三十多篇有關抗戰及收復台灣的論文。

一九四五年一月，被聘任為「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專門委員。十月，與李純青、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十幾位台灣籍人士一起隨「前進指揮所」人員從陪都返台，為接收台灣、日本投降儀式做準備工作。同年十一月，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設計考核委員會教育文化專門委員會委員。當時，宋斐如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中職位最高的台籍人士。

一九四六年一月，與蘇新、白克、鄭明祿等人創辦〈人民導報〉，始終堅守著「人民第一」的原則，為人民說話，做人民的喉舌；針砭時政，大膽揭露當局的黑暗、腐敗，令當局極為不滿。五月八日，被迫辭去〈人民導報〉社社長職務，改聘任為顧問；七月中旬，被聘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專修科兼任教授，九月，復任〈人民導報〉社社長。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被當局免去教育處副處長之職。二·二八事變後，三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左右，在台北新生南路一段一四五巷二十一號寓所內被當局綁架，下落不明。後經查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羅列的「罪名」是：

(一) 陰謀叛亂首要，組織台灣民主聯盟；(二) 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

令弱點。

宋斐如從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回到台灣一年多的時間裡，先後在《新生報》、《人民導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如何鑷除日本軍權政治》、《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我們要溶化在一起》、《如何推進台灣的生產建設》、《談談台灣農業的改進》、《台灣心理建設問題》等三十多篇文章，為復興中華民族文化教育及生產建設不遺餘力。

宋斐如一生為中國人民抗日鬥爭事業、驅趕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台灣，為台灣人民的自由、民主奔走、吶喊。他既愛台灣更愛祖國，堅持把台灣人民的命運與民族復興及祖國的富強緊緊聯繫起來，把青春與熱血獻給了台灣人民和祖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他是台灣人民的優秀兒子！也是我中華民族堅實的脊梁！

宋斐如罹難後，其夫人區嚴華也因掩護進步人士、「煽動台大學潮」罪名，一九五〇年被當局殺害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宋斐如啓事

本人學經濟而從事文化工作經念餘年、此次返臺、因鑒於漢明文化需要振興、官民感情需要溝通、故創辦「人民導報」以爲文化之雷艇、播種機。創辦以來尙能一本原則、爲民喉舌、基礎漸趨穩固、發展可期、本人創辦初旨經已完成、特辭社長之職、以專力從事別部門之創設、此啓。

本社啓事 本社改聘王

添灯先生爲社長、負責處理社務、此啓。

本社啓事 本社敦聘宋

斐如先生爲顧問、此啓。

1946年5月8日，宋斐如被迫辭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啟事。

本社啓事

本社因干添灯先生辭退社
長職其移職務由宋斐如負
貴自理此啓

本社啓事

本社因干添灯先生辭退社
長職其移職務由宋斐如負
貴自理此啓

1946年9月17日，宋斐如重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啟事。

宋斐如啓事

本人因協辦人民導報，對於工作，或有遺誤矛盾之處，昨接「候任用」之命令，經即辭職。本館學生獻金事宜，亦經儘足金額。統計組及文書組會辦結報手續。友通訊，請寄本報社為荷！

二月廿三日

1947年2月22日，宋斐如被免職（教育處副處長）之啟事。

宋斐如鳴謝啟事

自本人離開教育處消息傳出以來，謬蒙各方親朋來函或登門慰問無任感激。惟官場之人事調動，原屬常事，本人一向淡薄厭煩勾心鬭角，此後儘量讀書（如答中央社採訪記者問）以補一年半來學術之虧損。至事情發生之真相，俟調查已時，當公開表白。此致
；先此誌謝！

宋斐如被免職後對各方慰問之鳴謝啟事。

後記

在宋斐如短暫而光輝的一生中，為我們留下極其豐碩珍貴的著作。但鑒於多種因素，能掌握到的寥寥無幾。為了及時加以搶救整理，二〇〇二年台盟深圳支部決定出版台灣人民抗日愛國志士《宋斐如文集》。翌年九月起，由台盟深圳支部主委宋亮，副主委陳美芬、翁曉波及盟員家屬梁汝雄、喬來麗等組成調研組，先後多次到過重慶、北京、南京、濟南、泰安、桂林、昆明、武漢、廣州等地的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查閱了大量的有關資料，拜訪了宋斐如當年的同事及其家屬。宋斐如的遺孤宋亮、梁如雄伉儷還特地赴台灣調研。歷時二年，在這些有關部門和人士的熱心幫助下，獲取了宋斐如大量著作、資料，並進行初步整理。今年元月，聘請抗日戰爭文化研究專家、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教授楊益群、張雅芳伉儷，對這些著作和資料反覆認真地進行爬梳、勾沉、訂正、篩選，編成《宋斐如文集》。

本書在資料搜集、編選過程中，始終是在台盟中央、台盟廣東省委、台海出版社及深圳市委統戰部、市台辦的大力關心支持下進行的。台海出版社還特地將此書列入「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六十周年」紀念叢書出版規劃。先後得到有關部門和人士的無私幫助，尤其是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大學、重慶、江蘇、桂林、雲南、湖北、武漢等各省市大學圖書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第二檔案館、山東泰安馮玉祥紀念館等單位幫助。熱心人士大陸有談家芳、戴高爾等先生；台灣有秦賢次、藍博洲、嚴秀峰等先生，特別是著名的台灣學者陳映真伉儷，不僅熱情接待安排到台灣的調研，還從百忙中抹暇為本書寫序。曾健民先生則不辭勞苦，親自將其珍藏的當年宋斐如為台灣主編的七大本《人民導報》送到赴台調研組住處。還有台盟深圳支部

的盟員及其家屬，深圳電信局部分同志，為本書的校訂給予熱情協助。值《宋斐如文集》即將問世之際，特此一併致謝！

編者 二〇〇五年七月